

# 雙手編織愛

## 東非難民的生命故事

詹姆士·馬丁 James Martin, S.J. 著 譚壁輝 譯



★紐約時報暢銷書作家 **馬丁神父** 又一精彩著作

其著作《襪子堆裡的聖人》(My Life with the Saints)

榮獲天主教媒體協會圖書獎 (Catholic Press Association Book Award)、

紐約克里斯多佛獎 (Christopher Award)、

出版人周刊 (Publish Weekly) 年度好書獎

**丁松筠** (光啟社副社長) · **杜明翰** (前世界展望會會長) 專文推薦

# 雙手編織愛

東非難民的生命故事

詹姆士·馬丁 著

譚璧輝 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 THIS OUR EXILE

*A Spiritual Journey  
with the Refugees of East Africa*

by James Martin, S.J.

Translated by Cecilia T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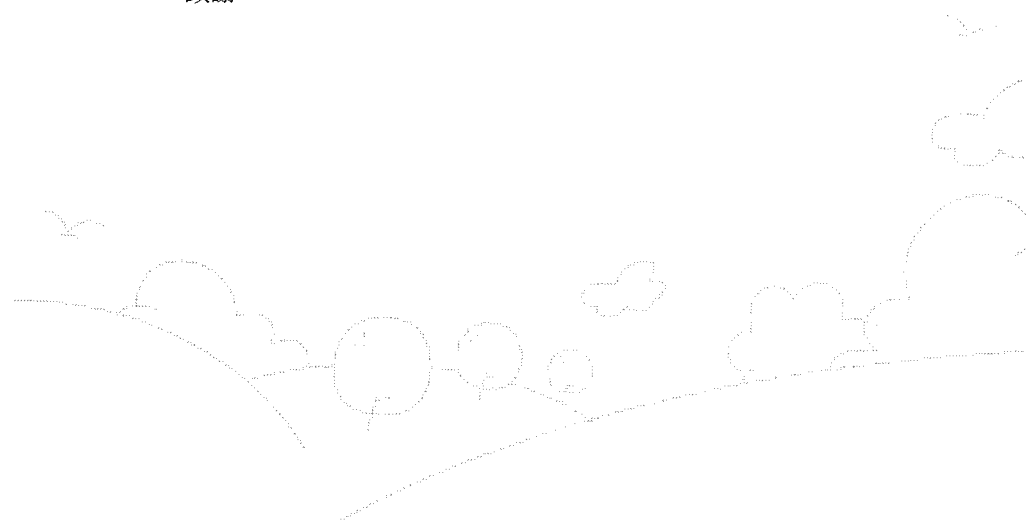
Copyright © 1991, 2011 by The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  
Published by Orbis Books, Maryknoll, NY 10545-0302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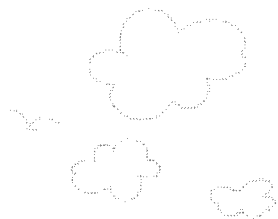


## 目錄

神貧的人，有福！ / 丁松筠	005
與耶穌的愛同行 / 杜明翰	007
一本不像靈修書籍的靈修書籍 / 譚璧輝	009
前言 / 羅伯·可倫	013
序：進入非洲	015
去找路易絲修女	022
通往錫卡的道路	038
垃圾	045
養雞場、241N 縫紉機和拜訪沙飛紡織廠	049
標準	057
非洲人的圍巾	065
「我向你求救！」	071
貧民區「卡王維爾」	075
「我們真高興你沒有死！」	082
雙手	096
來自草地的故事	109
柯蒂雅的儿子	119
馬林地	124
生命之樹	133

安慰	138
莫琳修女買錯了東西	149
一千個綠色塑膠聖誕杯子	153
我們的招牌菜	164
阿朱馬尼	167
快一點，快一點，意思是沒有祝福	187
一點錢	191
我遇到老媽媽	202
雨季	209
若望·穆他伯加和他的牛	212
風之家	217
柯比納·蘇克	222
我的弟兄	226
「修士，你什麼時候回來？」	229
芥菜子	233
嶄新的一頁：二十年後	238
致謝	247





## 神貧的人，有福！

1986年，光啟社拍攝了一部生活在泰緬邊境的柬埔寨難民的紀錄片。他們無家可歸、貧病交迫、終日飢餓、每天處於垂死的邊緣，其中有許多難民還是華人。電視台播出後，對難民的感同身受與悲憫情懷讓台灣人民伸出援手，捐了好幾千萬台幣給這些難民，想要幫助他們改善在難民營的生活。因為在那個時代，很多台灣人仍記得貧困和飢餓的滋味，他們自己也曾經是難民，被迫離開家鄉，在一塊陌生的土地上尋找一處安居之所。

今天，大部分的台灣人住在安全又舒適的環境裡，許多年輕人從不知道什麼是飢餓和無家可歸。沒有這些經驗，或許很難對於貧窮人產生慈悲心。然而，這世界上大部分都是貧窮人，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弟兄和姊妹。耶穌吩咐他的門徒：人若餓了，要給他們吃；人若渴了，要給他們喝；人若作客，要收留他們。若我們對這些窮困和無家可歸的弟兄姊妹少了愛和關心，那我們就不是完全的基督徒。

馬丁神父的《雙手編織愛》是描述當他還是耶穌會讀書修士時，在非洲和難民一起工作兩年的故事。讀了這些美好和動人的故事會引發我們對貧窮人的愛和關懷，甚至激發我們走出去為他們服務，你將會發現馬丁神父所發現的：服事貧窮人並不只是改善了他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們自己。當我們看到他們即便在患難中仍保有勇氣、希望和愛，我們會被激勵；我們



會忘記自己那些微不足道的問題；我們會變成更好、更快樂的人，也會成為實實在在的基督徒。

在拍攝柬埔寨難民的紀錄片時，我常常受到激勵。我看過一位媽媽，由於她太瘦小、太虛弱了，無法在給水車的水被用完前取到水，她和家人已經兩天沒有水喝。她雖然在哭，但仍然繼續嘗試，從不願意放棄。我們也拍到一位十七歲年輕男孩的故事。他在為家人尋找可吃的蔬菜時，腳被地雷炸斷。他的腿被截肢，可是隔天，他就起來和其他同被截肢的年輕人玩著撲克牌。一年之後，他裝上義肢踢足球。

在我聽到這些華裔難民無家可歸、忍飢受餓好幾個月、眼看著心愛的人死於戰爭中的故事後，我的心都碎了，一位年長的神父告訴我：「Jerry，不要哭。這些難民需要你的微笑和歌聲，而不是眼淚啊！」

當我讀著馬丁神父的這本書時，書中所有的故事都和我與柬埔寨難民相處的經驗相類似，這些歷歷在目的景況又再一次感動了我。我一再地重複告訴自己耶穌說的那句話：「神貧的人有福了！」（Blessed are the poor!）再一次的，我非常想要走出去服事貧困的人，與他們一起奮戰，學習如何愛他們、被他們改變。我再一次了解到，耶穌對貧窮人的那份特別的愛，祂也希望我們所有人都能擁有這份愛。

當你讀這本書時，相信也會有相同的感動發生在你身上。

光啟社副社長 丁松筠神父

2013年4月19日寫於羅馬



## 與耶穌的愛同行

生命中最值得珍藏的是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我們沒有白走這一趟珍貴的人生之旅？

生命中最大的懊悔，就是在忙碌、迷惘、混亂的日子中，逐漸失去了對生命的熱情，對愛失去了感覺。

但我們都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如果，我們願意放下自我，走入顛沛者的心路歷程，體驗貧窮者的艱困心酸，人生之路反而豁然開朗。

永恆的價值，必然經過淬煉；真理的體悟，必須勇於真實；全然的喜悅，也需要走過風雨。

閱讀《雙手編織愛》，彷彿濃縮了在肯亞、衣索比亞、盧安達、烏干達，這東部非洲過去幾十年間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但更讓我感動的，卻是作者對每一個相遇者，所投入那深刻的同理，細微的體貼，真誠的反省，和愛的行動。

作者用細膩的筆觸，把我帶入二十年前東非難民的環境，幾乎有摩肩擦踵般的碰觸感；苦難與絕望的眼神，痛苦或喜悅的眼淚，和自己的思路情感緊緊交織在一起。和許多生動的人物相遇之際，雖有難過與心疼，但一股股溫暖的泉水，不時地澆灌在我靈魂的深處。

幾年前聽印度展望會會長分享，他說：「我們以為我們帶著耶穌的愛，踏著英雄般的腳步，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但我





們錯了，因為我們終於發現，我們只不過是跟著耶穌的腳步走，耶穌早就在那裡了！」

耶穌在哪裡？原來，祂不在恢宏富麗的殿堂內，卻在窮困孩子的心中；不在自以為義的施捨者旁，卻是單純謙卑者的夥伴。

的確，當我們願意走入真正的世界，將在那最貧窮的人羣中看見天使，在最險惡的環境中遇見耶穌，也將在刻骨銘心的挑戰中，遇見真實的自己。

前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杜明翰

2013年4月25日



## 一本不像靈修書籍的靈修書籍

隨著 2012 年走入歷史的腳步，我也為本書的譯文劃上了句點。雖然如此，我的心思仍深陷在作者筆下的肯亞和他所服務的難民身上，難以揮去。

這是一本不像一般靈修書籍的靈修書籍，作者耶穌會士詹姆士·馬丁是美國知名作家及教會雜誌的編輯，他以寫小說的風格，描繪在肯亞兩年為來自東非各地難民服務的真實經驗，簡單、平實卻又幽默無比的敘述，及一篇一篇讓人讀來笑中帶淚，淚中帶笑的真實故事。書中描述難民的求生之道和生活智慧，絕不是我們生活在開發或已開發國家中的人所能想像的，有趣極了。

本書感人的另一原因，是作者在兩年難民服務時期心靈上的轉變，和對天主、人性、福音的教導、愛與被愛、貧窮、痛苦、生命中的無奈與挫折等的深刻體驗，他甚至毫無隱瞞地陳述了自己在工作上所暴露的個人弱點，這些真情流露和真誠的敘述令人感動不已。

此外，透過作者細膩的描述，讀者也可以在字裡行間看見東非美麗的景物，和從難民水汪汪的眼睛中傳達的複雜心情。

這是一本以真實生活經驗陳述什麼是靈修的好書，它讓人領悟，所謂基督徒的靈修其實就在每日平凡生活中，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甚至在自己的軟弱中體會天主的陪伴和祂的深情大



愛。當然，這也是一本屬於弱小兄弟姊妹的書。

譚璧輝

2013年1月6日 台北



信靠上主的人，一無所缺。

——史瓦希里 (Swahili) 諺語

獻給每一位難民



## 前言

離開一個我們花了一輩子時間去熟識的世界，來到另一個遙遠、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們不僅有機會發現新地方、新民族，並且能藉著那些在某方面非我族羣者的幫助來觀看自己；誠如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提醒我們進入「事物的核心」。耶穌會年輕會士詹姆士·馬丁在自己前往非洲服務的記載中，曾很恰當的引用了葛林的話。葛林是一名天主教徒，他經常在小說中流露出自己的信仰，而他也是終生的旅行者，他可以由人的通常路線及所熟悉的環境確切得知真正的距離，他可以給人一種心理與道德的距離，一種不是立即就可以獲得的洞察力。

一名年輕、思想細膩、滿腔熱誠的美國人，將在本書中以他小說家的敏銳觀察力向我們敘述他的非洲經驗：細膩的描寫，具有活力的敘述，使書中人物躍然於紙上，描繪各式各樣的人物和複雜的人性。然而，這並不是一本大部分美國人永遠不會見到的非洲大陸的旅行日記。也不是傳統的宗教虔誠操練，如：一些想要提升讀者靈修的昔日福傳故事。馬丁的目的是要我們再次靠近「事物的核心」，即是：無論何處，我們都會受到傷害，人人都知道，我們只是世間的過客，金錢或權勢都不能改變我們的命運。這便是那些到落後地區從事醫療或靈修服務的人所經歷的，極端貧窮使一切每況愈下，但是，他們不久就找到了平衡點；他們注意到受苦者有他們自己基本的尊嚴，探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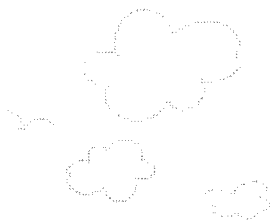


者、醫治者或教師意識到他們能從這些被視為有需要的、赤貧的、未受教育的、只有少許或毫無前途的人身上學到許多。

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它那冷酷、不屈服（帶有革命性）、又強調對事物具有顛覆性的觀點，例如：「最後的要成為最先的，最先的要成為最後的」。這位足跡遍布各地、觀察敏銳、不斷教導和醫治病人的耶穌，喜歡說一些反諷、甚至弔詭的道德寓言。祂一再藉各種故事提醒當時的聽眾（今天的聖經讀者），眼前見到的可能不是真實的，還有更多是眼睛看不見的，凡是經歷過傷害、痛苦和各種風險的人，常常能從這種非我們經歷過的生活中學得教訓；熟知特權並擁有各種特權，便是暴露在更大的道德風險中，即是：在我們中間有許多自命不凡和心胸狹隘的人，認為自己有幸生長在這文明的世界裡，而沒有生長在那落後的地區，度著這樣的生活，而不是那種生活。

葛林深知無論我們是誰，不管我們稱何處為家，所謂「事物的核心」便是我們共同的人性。換言之，有時我們必須離開家才能找到家，離開我們的生活和藉著別人的幫助才能找到生活。詹姆士·馬丁的書詳盡地陳述了這點，透過一個接一個的故事，他仔細而帶著愛來描繪了一切；他的非洲是另一處朝聖之地，不僅在一個特殊的國度旅行，並且是走向天主慈愛的臨在中。

羅伯·可倫（Robert Coles）



## 序：進入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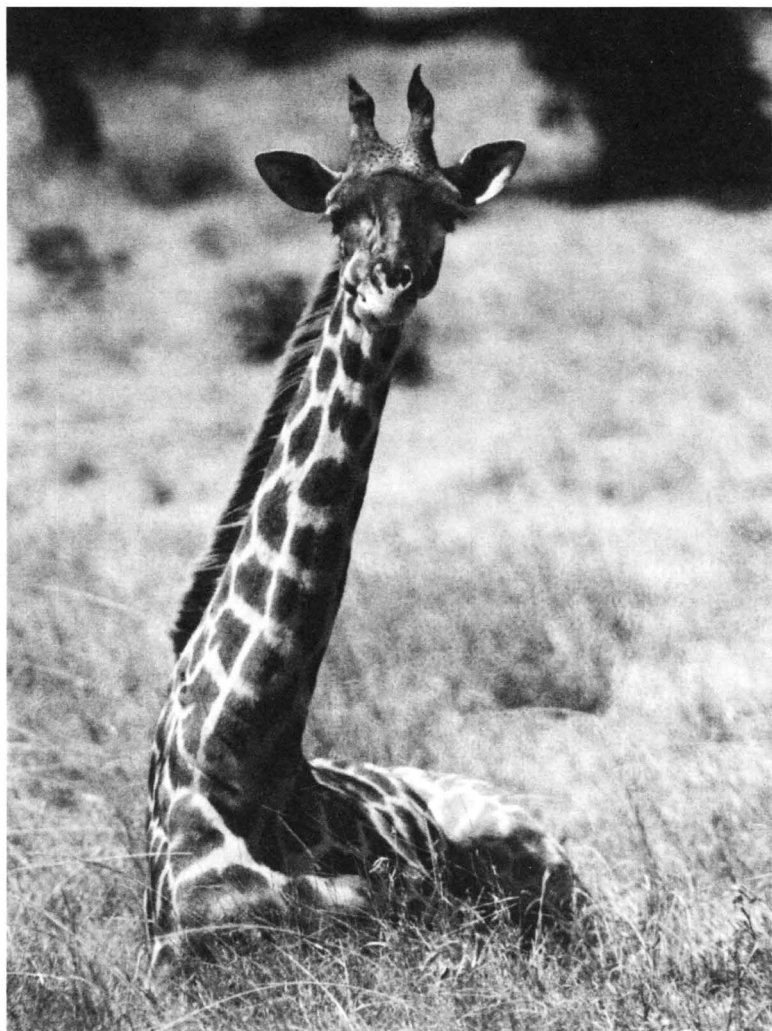
被召喚，即是被派遣。

——史瓦希里諺語

不久前，我在肯亞兩年，為來到東非的難民工作。我在一所天主教福利機構，即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工作。我的任務是幫助來自索馬利亞、盧安達、蒲隆地、烏干達、衣索比亞、厄利垂亞、蘇丹、莫三比克及利比亞的難民，以救濟機構冷僻的術語來說，便是開始一項「增加活力的活動」。從1992年到1994年，當我在東非時正遇到索馬利亞的天災及盧安達的種族殺戮。我不僅親眼見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批難民湧入乾旱的肯亞，而西方世界對東非問題的關懷也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在此，我應該坦白，我從沒有計畫來非洲工作。也不像我的好朋友那樣，當我告訴她我被派往非洲時，她拍手高興地說：「哇！我一直想要去非洲耶！」我從來就沒有想要去非洲。就算我是一個容易被電視上自然景觀節目吸引的人，看過幾次《遠離非洲》（*Out of Africa*）影片，也多少注意那裡的一些情況（其實並不多）；但是，就像大多數的美國人一樣，我並沒有多大興趣想要去那裡。太危險、太骯髒、太遙遠了！假如我隨便做一個兩年離家的計畫，我很快便會選擇西歐的某些地方，巴黎或羅馬就好，啊！太感謝了。





來到肯亞之前，一想到非洲，腦海中出現的便是馬賽馬拉（Maasai Mara）國家公園的這張圖片。很快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對這裡的認識都改變了。

（照片提供 | Don Doll, S. J.）

我從未想像自己會擔任救濟員，為難民工作，如同在電視上看到的，在難民營裡，由貨車上分發食物。無庸置疑的，那是一種善行，但是，總而言之，我覺得很害怕，無法想像自己在如此遙遠的地方從事那一類的工作。

那麼，我怎麼來到非洲的呢？簡單的說，我是被派來的。派到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服務兩年，是我們耶穌會士訓練過程的一部分。

讓我略微說明耶穌會士的訓練過程：耶穌會是天主教會內的一個修會團體，其成員需接受相當長的訓練，總共為十年或十一年。在接受兩年哲學訓練之後及研讀四年神學之前，一名會士先放下書本，實際工作兩年。一些美國耶穌會士，誠如我的許多朋友，在中學或大學任教。有些在堂區或避靜院工作，有些則派往傳教區服務。

因此，在我哲學訓練即將結束時，導師要我考慮自己想要做哪一類的工作。最初，我想要留在美國。在此之前，我曾以耶穌會初學修士的身分在牙買加為當地窮人工作，我覺得十分困難：清晨被蚊子叮咬和它的嗡嗡聲吵醒，巨大的蜥蜴捲臥在浴室及其他各種事物。雖然我喜歡這種為窮人服務的觀念，但是，再回到開發中國家的想法卻漸漸對我失去了吸引力。此外，我認為在美國也有許多窮人，為何要繞過半個地球去服務窮人呢？

大約在這時候，我開始聽到愈來愈多有關耶穌會國際團隊為難民服務的事蹟。

1980年，在耶穌會總會長雅魯培神父（Pedro Arrupe）中風之前，他注意到全球難民人數暴增，便有了為難民服務的想法。



簡言之，雅魯培神父知道耶穌會士遍布世界各地，而難民也散布全球各處，為何不把兩者結合在一起？於是他遵照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的教導——前往「最有需要」的地方，而創立了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Jesuit Refuge Service, JRS）。

看起來我似乎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讀到耶穌會難民服務周報（當然，任何文章都比康德（Kant）或海德格（Heidegger）的文章有趣）。我愈讀這些報導，愈覺得「這」似乎是我下一步該做的事。我愈考慮可能性，那些物質上的困難，例如蟲子、蜥蜴、水、健康等等，似乎愈淡化，剩下的唯有與窮人一起工作的渴望。

我承認，這種誘惑一部分與想要冒險有關，正確的說，可以稱之為驕傲。我認為為難民工作是最困難、最令人難忘、或者是最「酷」的工作，而不是繞半個地球來到非洲的高尚理由。

然而，主要原因還是真正想要幫助窮人。此外，只有兩年而已，會有多困難嗎？

難民服務中心告訴我，有三個最需要幫助的地區：東南亞、中美洲和非洲。我是否有最想去的地方？我說，沒有，哪裡是他們最需要我去的地方呢？

最後的結果是，在肯亞奈洛比需要耶穌會士，即是東非難民服務總部需要人手經營一個小型的難民企業。聽來真令人振奮。在進入耶穌會之前，我畢業於大學的商學院，之後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六年。或許我可以善加利用荒廢多年的財務與會計技術。而且，很幸運的在當地的耶穌會團體裡還有一名年輕的耶穌會士與我一起工作。由於奈洛比是一座大城，我對健康與

其他身體上的擔憂都相對減低許多。

不出所料，當我告訴朋友和家人我的決定時，他們都感到驚訝。對於我的決定，父母親勃然大怒。當我進入耶穌會時，他們擔憂日後不能隨時見到我，回想在他們年輕時代，神父和修女幾乎完全與家庭斷絕關係。但是，在我進入初學院時，我向他們一再保證說：「別擔心。進入修會並不像派往非洲那樣。」另一方面，我的朋友，甚至一些不是虔誠信徒的人，認為前往非洲不失為一種「好工作」，對我的派遣感到高興。

我就這樣去了非洲。一切都不是我所預期的，我的生命卻因而完全改變了。

簡單的說，一些簡單的連續事件改變了我——我看見了，我做了，我遇到了這個人。的確如此。由於我的所見所聞，浮現於腦海的新觀點和聲音，確實創造了一個不同的人。我的期望是：遇到具有不凡背景的人，經歷幾次異國的冒險。但是那些只是部分的故事而已。

故事的另一部分則是我的心如何轉變了。

我僅僅在報紙上讀過東非難民的生活報導，然而其真實情況卻非我能想像的，我也無法想像這些改變了我的心。他們那充滿痛苦與喜悅的生活迫使我面對人類的基本問題：忍受痛苦與體驗快樂的意義為何。眼見難民的生活不斷在失望與希望的兩極間度過，讓我想到，不論遭遇多大困難，究竟是是什麼力量支持人繼續活下去，並且相信一位美善的天主。或者，更誇張的是一名盧安達婦人（你不久就會遇見她）告訴我說：「天主真太棒了！」他們對生命驚人的開放態度，幫助我更誠實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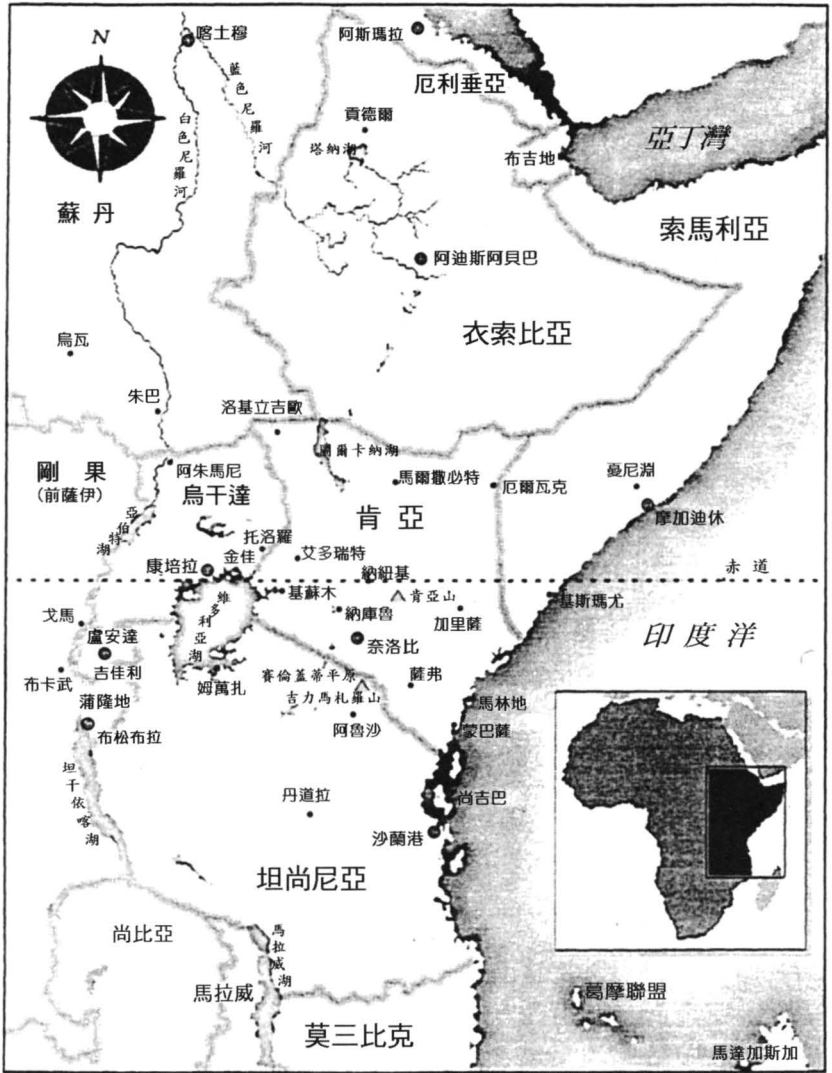
面對我自己的困難，儘管想要離開肯亞的誘惑仍然強烈，但還是留了下來。尤其是，愈來愈認識難民，並且進入他們的生活裡，因而我更了解什麼是愛與被愛了。

這就是本書的內容，一些簡單的故事，以我與難民一起工作、幫助他們謀生為主軸。其實，是一連串的故事，有些滑稽可笑，有些悲傷至極，有些令人難以置信，有些無法歸類。本書的主要內容是難民自己的生活與故事，我把它穿插在每篇的敘述之間。在敘述的過程中，容我有時離題，目的在說明鮮為人知的非洲、肯亞、奈洛比的生活點滴、風俗習慣、歷史、語言、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我試著扮演這陌生地區的導遊角色，但是，我會讓難民自己發言，當他們說話時，我會採用他們的語言和節奏，甚至有時用他們自己的語言。當然，誠如維拉·凱瑟（Willa Cather）所說，這些故事都是來自「無法接觸的過去」，但是，其畫面與聲響卻鑲嵌在我的記憶中，難以忘懷。

因此，這是一本靈修手札，一本旅遊日記，一本人性觀察的紀錄。它也是一本道地的「傳教士」故事，在我來到非洲之前，我極厭惡「傳教士」這名稱，它使我聯想到那些偉大的白衣神父，以頒發獎品的方式，將天主賜給這些順服無知的土人。

最後，我終於對「福傳」（Mission）這個字有新的了解，它出自拉丁文的「missio」，意思是「派遣」。傳教士便是被派遣的人，過去，一名傳教士相信自己被派遣是要將天主帶給別人，如同大多數與我一起在非洲工作的人一樣，我知道我的使命更繁複：在人羣中找尋天主——學到對他們而言，天主是誰。

我完成了那特殊的使命，也向難民致謝。



地圖繪製 | Kim Kowal Ski。



## 去找路易絲修女

雖然在奈洛比才幾天，我發現自己已經愛上了肯亞。除了在愛爾蘭，無處能找到這種特質，就是那股愛與慷慨的溫暖氣息。那並不是一種單純的喜歡，就如一個人喜歡某處樂觀友善的人民以及宜人的氣候，而是一種人的溫柔感覺。

——艾弗林·渥夫（Evelyn Waugh）  
《遠方的人》（*Remote People*）

從波士頓經紐約和阿姆斯特丹到奈洛比，二十七小時沒有間斷的飛行，確實是一趟很長的旅程。這趟旅程的最後十三小時在荷蘭航空的飛機上度過，我閱讀了厚厚的杜魯門（Harry Truman）傳記，看了三部有荷蘭文字幕的無聊電影，偶爾抬頭觀看懸掛在乘客頭頂上方的小型電視。銀幕上播放電腦地圖，顯示飛機飛越的大片陸地，有歐洲（那不是阿爾卑斯山嗎？）、地中海（下面是希臘嗎？）和北非（對了，那一定是撒哈拉沙漠）。銀幕上的小飛機有時看起來似乎向後退，似乎真是一趟漫長無趣的旅程。飛行過程中，如短誦般常盤旋在腦海中的問題是：我到底在做什麼呀？

木訥呆板的我，終於拖著疲憊的步伐走在奈洛比國際機場的柏油碎石路上，朝著海關走去。排隊等了一小時之後，我面

對一名安穩的坐在一張三英尺高大木桌後面的肥胖肯亞人，一盞連接黑色電線的昏暗燈泡照著他。桌子旁站著一個體型較瘦、身穿制服、頭戴法式扁帽的人。

「Karatasi」，這人以肯亞語對我說，我猜想他指的是我的證件，於是我把護照、接種疫苗小冊、機票都遞給他。他把我所有證件交給坐在桌子後面的長官，他查驗我的機票，並且面帶憂鬱的表情搖頭說：「這不是回程機票，我要你的回程機票。」他有很重的口音。

戴扁帽的人彈指向我示意說：「回程機票。」他做了兩次，第二次聲音更大。

我低聲的問：「回程機票？我沒有回程機票，我要**留在這裡**。」我希望這種對他的國家的關懷，能影響這名官員。你來與我們**人民**並肩工作，他會表達感謝之意。

但是他說：「假如你沒有回程機票，你就不能留下。」

一想到那乏味的雲端飛行，我心中害怕無比，使出全身氣力說明我的情形。我不是觀光客，我要住在這裡兩年，以傳教士的身分，與天主教會一起。我聽見自己以高八度的尖聲說出最後的幾句話。

「此外，」我低聲的補一句說：「我有貴國的簽證。」

他瞄了瞄我的護照說：「這簽證在這裡無效。」

我再度尖聲說：「我在肯亞大使館得到這簽證的。」我聽見排在我後面的人發出嘀咕的聲音，他們擔心這樣的等待會延誤抵達他們的打獵小屋。

「先生<sup>1</sup>，」他平靜的說：「假如你沒有回程機票，你就不





能入境。」他轉身面對他的助理，把我的證件交給他，並且說：「原機遣回。」

我感到面頰發熱，腦海在想這可能是個不重要的國際事件，或另一趟返回波士頓的二十七小時飛行。我告訴他我身上只有五十元美金，或許這可以帶給我入境的可能性。

然後我想起口袋裡一張奇怪的文件。幾週前，奈洛比的耶穌會院長以修會的信紙寄給我一份莫名其妙的公文，上面寫道：「詹姆士·馬丁先生是耶穌會士，在奈洛比的耶穌會院知道他的來到。」公文下方蓋了「東非耶穌會」的火紅色印章。帶著這張看起來無用的文件，一個念頭提示我假如有任何困難，要握住這份文件不放。

雖然我已經告訴坐在桌子後面的那位官員有關我所有的資料，但結果仍是失望。當那名身穿制服的人緊抓住我的手臂，要把我送回荷蘭航空班機時，我想起了那份公文。我衝口而出說道：「等一下，我有這個，」並朝著桌子後面的官員揮動我的文件。

他向我招手，我把文件遞給他。他看了一眼，並沒有仔細閱讀內容，就說道：「啊，這印章很好。」他要回我的護照，在上面用力蓋了「奈洛比，1992年7月28日」，我入境了。

兩位美國耶穌會士在候機室等我，他們是奈洛比耶穌會難

---

1. 史瓦希里語念作「bwana」。這個字雖然受到動畫《泰山》中，對白人殖民者輕蔑稱呼的刻板印象影響，但實際上，這個字在非洲是對男性的尊稱，相似於「先生」、「閣下」之意。「Jambo Bwana!」是一般的肯亞稱呼語。

民服務中心主任麥克·艾文（Mike Evans），另一位是我將與他同住的年輕耶穌會士吉姆·柯瑞根（Jim Corrigan）。沒有空調的狹小機場擠滿了觀光客和舉著牌子的肯亞計程車司機，歡迎第一次參加打獵的歐洲及美國旅客。當時是凌晨兩點鐘，我問麥克，機場總是這樣擁擠嗎？

他解釋說，航空公司依照歐洲時間，而不是肯亞時間，安排他們的起降時刻，因此往返奈洛比的主要航班都是在非洲的深夜抵達及起飛。

我們穿過停車場，來到麥克的藍色小轎車前。高大的棕櫚樹在清涼的微風中搖曳。我習慣性地走到車子右邊。柯瑞根笑著說：「你要開車嗎？」我從車窗望進去，看見方向盤在右邊，啊！這是英國車。

我們把行李放進行李箱，繞了幾個彎之後，便開上了蒙巴薩公路（Mombasa Rd.），一條平坦的公路，其反方向直接通往印度洋，而我們則要前往奈洛比。四周一片漆黑；路燈下的公路顯得很平坦。麥克指出一些在黑暗中看不見的地標，如：運動場保留地、工業區、城鎮中心、當地醫院。

一小時後，我們到達羅耀拉會院，這是耶穌會在奈洛比的總會院。一名裹著毛毯的瘦小馬賽族（Maasai）人聽見車子的聲音就出來打開鐵門。我們進入院子時，他微笑著向我們揮手。我很快看了看羅耀拉會院，這是一座約可容納十五位會士的會院，寬敞的起居室、飯廳和小聖堂，全都面對一個美麗的庭院。我找到自己的房間，這是經過一天多的旅程後，第一次躺在床上，我已經累癱了。



在奈洛比的第一天，麥克把我介紹給兩位日後的工作夥伴，一位是來自德國道明會的路易絲修女（Sister Luise Radlmeier），她在這裡推行一個難民兒童的教育計畫；另一位是瑞士籍的白冷會貝瑞爾神父（Father Eugene Birrer），藉著他對難民工作的豐富經驗，他負責聯合國難民機構在奈洛比的各項事務，基本上他就是一名聯合國官員。雖然我認為對一名司鐸而言，這是一種不恰當的職務，但是貝瑞爾神父卻是最佳人選並且效率驚人。他代表聯合國為每一名來到奈洛比的難民簽發官方證件。他也為在奈洛比的耶穌會難民機構籌募經費。雖然我是在路易絲修女的辦公室工作——設於距離耶穌會會院幾條街之外的兩層樓裡，但是，我的時間卻要分配給貝瑞爾神父和路易絲修女。

路易絲修女身材高大，永遠帶著一副歪歪斜斜的厚片眼鏡。她每日的會服便是一件白襯衫、藍裙子和框住臉部的藍色頭巾。我很喜歡與她一起工作。在奈洛比成千上萬的蘇丹難民中，路易絲修女是一位相當具傳奇性的人物。

過去幾年，以首都喀土穆（Khartoum）北部為基地的蘇丹政府，以對抗蘇丹南部其他種族之名，發動戰爭，執行有計畫地消滅努巴族（Nuba）政策。伊斯蘭政府按照嚴格的教規（什葉派）向信奉基督教和傳統宗教的南方發動戰爭。為對付種種迫害（不僅砲轟村莊，還有奴役、酷刑和釘十字架等），蘇丹人民解放軍因應而生。日後，蘇丹人民解放軍分裂為兩個小集團，並且彼此攻堅，使得南部的情况更加淒慘。（在我來到奈

洛比之前的幾年，三名住在蘇丹南部、在教區修院教書的耶穌會士，遭到人民解放軍的綁架，走過數百公里的光禿平原，最後才獲得釋放。）

其結果便是數以千計的蘇丹人民逃亡到烏干達北方。許多人繼續逃到肯亞北部邊界的難民營去。政府軍和南方的叛軍強迫年輕男孩參與軍事行動，其中一個很有名的男孩分隊從蘇丹南部跋涉千里，來到肯亞避難，但由於飢餓、疾病和野獸的攻擊，在行程中人數逐漸減少。倖存的一些男孩最後來到了奈洛比，許多孩子都在上路易絲修女的教育課程。

路易絲修女便是為這些人，尤其是兒童服務。她除了得到德國修女的援助外，還有來自其他人的些微幫助。她在奈洛比以北數公里，靠近她的住處朱佳鎮（Juja）不遠的地方，為蘇丹難民建造了一個小鎮。因而她的名聲在蘇丹南部極為響亮，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有一次，一名蘇丹小男孩向我描述他來到奈洛比的旅程時說：「弟兄，當我離開蘇丹時，我知道我必須來找路易絲修女。」

一天中午，路易絲修女在辦公室一邊吃扁豆米飯，一邊說：「你一定要到朱佳鎮來看我。」因此，當天下午我們就去了，我們把自己塞進她白色的豐田小車裡。她坐在駕駛座上，彷彿自己在開一輛豪華轎車。

約一小時，我們到達朱佳鎮。一棟三層樓的公寓矗立在灰塵滿天的狹窄小鎮上，居民都是蘇丹人。一羣由公寓衝出，笑容滿面的孩子很快將我們的車子包圍，大聲呼喊著：「修女！修女！」



她領我穿過一片平地，來到一處寬大、空曠的水泥庭院。在一個房間裡有三名婦女操作著縫紉機，這是耶穌會難民中心所負責的小型產業計畫。另一個房間裡有一名母親，安靜地給一名幼小的孩子餵奶，其他三名赤裸的孩子則睡在一張硬的床墊上，當她看見路易絲修女時，微笑地向她打招呼。大廳的一邊，有三名穿著破舊圓領衫和棉質緊身內褲的蘇丹男孩，低頭在一張路易絲修女早晨給他們的大紙上，用短又硬的蠟筆作畫，所畫的都是他們記憶中的蘇丹：士兵、槍枝、難民、以及躺在地上垂死的人，鮮血從他們頭上的傷口流出。在院子裡，有的婦女給嬰兒餵奶，有的晾衣服，有的在炭爐上用滿是凹痕的鍋子煮飯。

路易絲修女邊擦前額的汗，邊對我說：「弟兄，你看這些人，他們怎麼會找到我呢？」

我每週兩天在路易絲修女的辦公室工作，為奈洛比城中無數的難民兒童準備上課所需的物品。但是，慷慨的路易絲修女雇用了五、六名蘇丹難民協助她，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很少。她說：「弟兄，我們很高興你在這裡，但是沒有很多工作給你做。」因此，我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聯合國難民辦公室，幫助貝瑞爾神父的籌款計畫。

奈洛比的教育課程是在一棟狹小的平房中進行，而聯合國難民機構的辦公室卻設在寬敞的空間裡，包括三棟隱藏在圍籬後面的房屋，人們毫不困難地便可以看到。每天無數的難民在機構外排隊，長長的隊伍延伸到鄰居的門口，大多數難民是索馬利亞人，婦女裹著顏色鮮豔的絲質長衫，男人上半身穿著骯



路易絲修女是德國道明會修女，為住在奈洛比的難民兒童提供獎學金。許多難民告訴我，在他們來肯亞的漫長路途上，有人告訴他們：「去找路易絲修女。」



髒的白色襯衫，以破舊的布<sup>2</sup>圍住腰部。

有一天早晨，貝瑞爾神父一邊清理他凌亂的桌子，一邊向我說明他最近開始的一項計畫。內容很簡單：來到奈洛比的難民都非常貧窮，但是卻在他們自己國家學過行銷技術。為了要使他們自給自足，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為個人和團體提供資金（每人大約美金一千元，在肯亞地區，這是極為慷慨的數額。）幫助他們創業。

找到對這計畫有興趣的難民毫無困難；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當時在肯亞的難民約有三百萬人。



肯亞位居東非的中心地帶，自 1960 年代起，其周邊國家便不斷發生令人難以置信的暴亂。相比之下，肯亞穩定的社會就成為吸引難民的地方。1960 年代，盧安達境內發生圖西-胡圖族（Tutsi-Hutu）暴亂之後，盧安達難民開始進入肯亞，並陸續常有零星的難民來到，1994 年中期發生種族屠殺後，更有大批難民湧入。盧安達難民都是經過坦尚尼亞或烏干達進入肯亞。1970 年代後期和 1980 年代初期，由於烏干達強人阿敏（Idi Amin Dada）

---

2. 這種以毛料編織成的布，用來圍在腰間（代替褲子），史瓦希里語念作「kikoi」，是索馬利亞、肯亞北部和西部男子的傳統服飾。這些布是由住在肯亞沿海地區拉穆鎮（Lamu）的藝術家所編織的。kikoi 質料很輕，傳統上是紅色或紫色條紋。小塊一點的布用來圍住脖子保暖，以抵擋奈洛比冷颼颼的空氣。

和歐博特（Milton Obote）的高壓政策，使得烏干達難民也逃到鄰國肯亞來，在乾燥的西北部設立難民營。

路易絲修女的南蘇丹朋友們比我早幾年來到這裡。1974年衣索比亞的社會主義獨裁者孟吉斯杜（Haile Mariam Mengistu）推翻並處決了國王塞拉西（Haile Selassie），奪取政權，此時，大批衣索比亞難民湧入肯亞。近幾年來，傲慢的索馬利亞領導人巴瑞（Mohammed Siad Barre）煽動殘暴的部落戰爭，導致全國性的飢荒，迫使成千上萬的該國人民逃到肯亞的東北部。

難民待在肯亞邊境、骯髒擁擠的難民營中有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時間。聯合國常常將難民遣返回國。有時，將他們安置在肯亞國內。有時，由於醫藥的需要或渴望與家人團聚，他們獲得許可來到奈洛比。或者，經常發生的，便是從難民營逃走，漂泊流浪，設法來到奈洛比。

根據聯合國的估計，當時僅僅在奈洛比地區就有五萬到十萬的難民。他們幾乎都處在極度貧窮的狀況下。大多數的難民都知道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許多難民也渴望能有機會創辦自己的事業。

因此，貝瑞爾神父能在短短幾個月內規畫二十個計畫，包括裁縫店、木工店、理髮店、養雞場、印刷店、小型餐館、烘焙屋。其間，一位活力充沛，名叫烏塔·法格爾（Uta Fager）的奧地利友人幫助他。

烏塔與她土木工程師丈夫尤爾根（Jürgen）住在奈洛比多年。她曾在印度及南亞地區工作，對開辦及經營小型企業經驗豐富。他們兩人在奈洛比高雅的住宅裡，放滿了來自世界各地、他們





幫助過的朋友所製作的手工藝品及藝術作品。更重要的是，烏塔對難民的生活和他們個人狀況極有興趣。她非常慷慨，常常以自己的資金幫助有急需的難民，例如：付房租、為新生嬰兒買衣服、處理葬禮。從烏塔不以跋扈或掌控姿態進入難民生活的方式中，我學到很多。

貝瑞爾神父肩負聯合國難民機構的沉重責任，使他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處理無止境的文件事務。因此，當貝瑞爾神父在辦公室督導小型計畫的財務狀況時，烏塔便與難民見面，並且探訪他們在奈洛比貧民區的開業情形。

我主要的任務是與烏塔一起工作，難民總是稱她為「烏塔太太」。名字和稱呼在東非是極為重要的。當初肯亞人和難民稱我吉姆神父（編註：James 暱稱 Jim）時，我反對這稱呼，並向他們解釋說：「我還沒有晉鐸。你們叫我吉姆就好了。」

但是，對難民而言，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吉姆」是一個太通俗的名字，雖然我以他們的姓氏來稱呼，像穆先生或賴太太，但是，立刻有人告訴我要以他們的名字稱呼他們。這只是對宗教人士的尊敬吧！無論我如何表示我與難民是平等的，我多少還是一個權威人士。當我見到一位名叫莎拉（Sarah Nakate）的烏干達難民時，她以烏干達表示尊敬的方式對待我——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跪在我面前，這種禮貌真讓我大吃一驚，動搖了我這個敏感的美國平等主義者。當我問她，假如坐在椅子上，她是否會覺得比較舒服些，她臉上的表情告訴我，答案是否定的。反對是徒勞無用的，最後，我就接受事實，那是一種表達尊敬的方式。

年長難民尊敬我的方式更讓我感到不自在。我很快學到，在東非，一個人的年齡不能等閒視之。例如有些鄉村裡，同一年出生的孩童都集中在一處，共同撫養，一起長大，他們以年齡維繫彼此的關係，如同親生的兄弟姐妹一樣。不止一次，當一名難民發現我三十二歲時，就稱我為他的「同年夥伴」。

再者，高齡在肯亞是一種崇高尊嚴的標記。史瓦希里語的 *mzee* 就是指「老」<sup>3</sup>，是一個表示極大尊榮的名詞。肯亞常見的稱呼「Jambo, Mzee!」<sup>4</sup> 是一種最恭敬的稱呼，與西方文化中恭敬地稱某人：「哈囉，前輩！」不同。有一天，一名年輕的盧安達難民瑪麗（Marie Bugwiza）將她白髮蒼蒼的八十歲高齡母親介紹給我，瑪麗以極恭敬的態度對待她的母親。當母親說話時，瑪麗轉向母親，安靜地洗耳恭聽。她的態度提醒我，要以同樣的恭敬態度對待她的母親和與她母親同年齡的長輩。

為表示對這些傳統的回應，我慢慢學到如何表達對他們文化的尊敬。例如：在難民中，打招呼是一種表達友誼的方式。對好朋友就用擁抱和親面禮，先親左面頰，再親右面頰（非常親密的朋友則親三次面頰，依序是：左、右、左三次）。與一名衣索比亞的男士或女士握手時，一方先以左手拖住自己的右手肘，然後向對方鞠躬。事實上，在東非，人人都與每一個人

---

3. *mzee* 是史瓦希里語的「老」之意，換句話說是「非常尊榮」的意思。在肯亞，*mzee* 是對老先生或老太太的一種尊稱。

4. *Jambo* 是一般的問候語，意思是「哈囉」，但照字面翻譯也有「有困難嗎？」「有問題嗎？」的意思。

握手。習慣上，當人們走進房間時，就要與屋內的每一個人握手，如果漏掉某人，這會被視為極端粗魯的行為。當我返回美國後，這習慣已經深植於我心中，我發現自己竟然忘記當一個美國人面對一屋子的人時，他該怎麼作，這讓我非常尷尬。

我也學著用難民們不同的母語來表達問候：對盧安達人要用盧安達語（Kinyarwanda），問候衣索比亞人要用阿姆哈拉語（Amharic），對烏干達人則用盧干達語（Luganda），大部分蘇丹人是說阿拉伯語（Arabic），其他非洲民族則多以史瓦希里語為母語。這真是使這些難民感到輕鬆自在的簡單方法，因為他們的文化常受到其他民族的詬病或忽略。

至於稱呼，如同烏塔勉強地回應了「烏塔太太」這個稱呼（雖然「法格爾太太」更準確），難民和我最後達成的決議是叫我「吉姆修士」（Brother Jim）。按照天主教傳統的說法，我是一名日後要晉鐸的「讀書修士」，而非終身修士，但是我們很高興地這樣決定了。我很高興沒有被稱為「神父」，而他們也很滿意能給我一種恭敬的稱呼。我喜歡這種被視為難民弟兄的觀念。但是為了一種我不是很明瞭的語句用法的理由，這些難民和肯亞老百姓和我說話時，幾乎每一句話都帶有頭銜，例如：「我病了，吉姆修士。」「你一定要給我一點錢，吉姆修士。」「是，修士。」「不，修士。」

有一次，一名難民遞給我一封正式的信，上面寫著給「神父吉姆修士」，我問她為何這樣稱呼我。

她滿臉疑惑地望著我解釋說：「因為你是神父呀，而你的名字是吉姆修士。」下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在奈洛比的頭幾週，我在一所設在狹窄平房裡的語言學校學史瓦希里語。以耶穌會所付的最低學費，金格日語言學校（Kiongozi Language School）在下午提供五小時、一對一的個別課程。我們的教室很狹小，只在煤渣磚牆的高處開了一扇窗。有一塊漆成黑色的木板當作黑板，然而幾乎沒有看見粉筆。

傑弗瑞是一位瘦小結實、和藹可親的肯亞男士，他就是我的老師。

下午一點，我穿過通往學校的寬廣田地，此時正是許多肯亞人的午睡時間。在通往學校泥土小徑旁的草地上，許多人正在享受午睡。他們仰臥在乾黃的草地上，面對炎熱的太陽，看起來彷彿他們是由天上掉下來的。每天傑弗瑞走進教室時，他的短髮上總有幾根乾草。

除了史瓦希里語外，傑弗瑞也教我一點奈洛比青少年愛用的方言。我從他那裡也學到所謂基礎的東非英語：字彙、成語、迴旋式文法等，例如：「甚至到現在」（Even now）和「不知怎樣的」（Somehow）至少都用在句子的中間，「而現在……」（And now…）常常用在句子的開始，尤其是某人要敘述一件哀傷的故事時更是如此，「而現在，修士，你看，我求求你給我一點錢。」

在對話中使用現在進行式而不用現在式或過去式，能增加談話時的特有感覺。在東非的語言裡，所有事情都是**正在發生**，而不是已經發生過了。我無法找出這種語法是否來自史瓦希里語、班圖語（Bantu）或受殖民的影響，但是，我注意到難民都使用這種語法，例如：「修士，我現在正需要一台新的縫紉



機。」「我知道我必須正在找路易絲修女。」

這種使用混合語言的特性常常造成混亂。一名婦女這樣描述她的家庭成員，她說：「修士，即使現在，我正有三個嬰兒。」

我剛開始的語言課無意中成為肯亞鄰居的歡笑來源。傑弗瑞的教學法是完全融入生活的；四小時的課，他完全用史瓦希里語教我。第一天，當我在小教室等他時，我聽見有人敲門。

「Hodi？」當傑弗瑞面帶笑容探頭進來時說。

我啞口無言地坐著，一頭霧水。

他抱著希望的又說一次：「Hodi？」這次他提供了答案。他朝我揮動著手，說道：「Karibu！」<sup>5</sup>

啊！我想這意思一定是「你好嗎？」以及「我很好。」我們用一分多鐘重複這短劇，他同時糾正我的發音。之前我不知道，在東非這兩個字僅僅是指某人請問是否可以進入他的房間，Hodi 是「我可以進來嗎？」Karibu 是一種普遍的用語，意思是「歡迎」。

下課後，我決定要練習這兩句新學的史瓦希里語。我知道在路上向人問候是很恰當的，因此當我漫步在街上時，我愉快地對路人說：「Hodi？」這句問候引來了不安的注視，並帶著疑惑的微笑，甚至放聲大笑，因為他們想像我請求他們為我開啟一扇無形的門。當我回到耶穌會會院，走進大門時，我滿懷自

---

5. 一般來說，Hodi 是「我可以進來嗎？」Karibu 是「請進」或「不客氣」。這兩個史瓦希里用語是用在請求進屋子或房間時的對應語詞。

信地對肯亞籍的接待員多瑪提拉女士說：「Hodi？」

多瑪提拉大笑著說：「修士，你已經進來了！」

雖然我錯用一些基本用語，但是，不可否認的，傑弗瑞真是一位傑出的老師，幾週後，我可以很自在地用史瓦希里語和別人交談。甚至四個月後，我已經能說一些肯亞的俚語。我想，我可以擔任全職工作了。





## 通往錫卡的道路

如今存在的有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格林多前書》十三 13

有一天與烏塔一起在聯合國辦公室吃午餐時，她說：「你應該去探訪一個難民營。與難民談話，你可以學到很多。」她又解釋道：「但是你要知道他們來自何處。」她告訴我，靠近路易絲修女住的朱佳鎮有一個難民營，設在奈洛比以北約三十分鐘車程的錫卡鎮（Thika）上，路易絲修女一定能帶我進去，她認識鎮上的每一個人。

幾天後，路易絲修女和我一起開車到朱佳鎮。她把我放在營裡，晚上，我自己搭小巴士<sup>6</sup>回奈洛比。手持半自動來福槍的肯亞警察，一看見路易絲修女的車，便立刻打開營區大門。修女以德國口音的英文親切地與守門警察交談，取得我的證明文件，預祝我好運，向我揮揮手，便快速開車離去，捲起車後的

---

6. 迷你巴士或大型的計程車念作「matatu」，費用從三先令起跳。這種交通工具在奈洛比處處都有，比市公車便宜一先令，所以比較受歡迎。司機的薪水是以能擠下多少乘客而定，所以他們會在擁擠的市中心追趕、超越別的車，以搶先到下一站載客。有一種小型的貨車定期往返於肯亞和坦尚尼亞的邊境，也稱作 matatu。

一片紅色塵土。



錫卡接待中心距離奈洛比僅僅幾公里而已，是一個位置特殊的難民收容所；肯亞難民營大多設在邊境，靠近大批難民湧入的地方。在我探訪錫卡難民營之前，我在奈洛比訪問過一位名叫阿里的索馬利亞男士，他曾在錫卡難民營住過。我錄下他的故事，好幫助我了解錫卡難民營中難民的困苦。以下便是阿里的故事：

我叫阿里，現年五十三歲。我的父親在索馬利亞醫院擔任縫紉工作三十年，1974年逝世。我年幼時，母親便去世了。我家以前住在摩加迪休（Mogadishu），現在這地方已經被摧毀了，但是在巴瑞獨裁統治之前，那是一個平靜的城市。我十七歲時離開那裡，前往義大利求學，那是在索馬利亞獨立之前。我在佛羅倫斯，我所喜愛的城市求學。對於這座美麗又充滿文化氣息的城市，我有許多美好的記憶。我在佛羅倫斯大學攻讀哲學博士，通過口試後，便前往德國求學兩年。

錫卡是暫時的難民收容所，大約收容三百到五百名難民，但是，在我探訪他們的那週，那裡卻有五千多人，大部分是索馬利亞、烏干達、衣索比亞和蘇丹的難民。他們大多數在那裡住了三或四年，等候遣返本國或前往美國、加拿大。營房相似





日後我所熟識、散布在奈洛比城裡的貧民區、一棟棟用木頭與泥土建造的房子，他們在小炭爐上烤玉米，露天式的陰溝，滿地的垃圾。廁所嚴重不足（原有的設備是供五百人使用的），使得營區處處臭氣撲鼻。

令人驚訝的是，我竟然看到有幾家販賣飲料和其他商品的商店和攤販。甚至在營區中間，有一家隱藏在鐵皮屋頂下的小店，販售小椅子和小凳子。與奈洛比貧民區不同的是，錫卡營區被有刺的鐵絲網圍住，並有肯亞警察定時巡邏。

畢業後，我返回摩加迪休並在一所規模很小的大學任教。起初，我是專任，後來是兼任。我教法律哲學大約有二十五年之久。許多年來我都等著結婚，因為我的父親有兩個妻子，每個生了五名子女。我等了很久，因為我必須為我的兄弟姐妹賺錢。1981年，我娶了我的妻子阿夏，我們有六名子女。第一個孩子兩歲時夭折。

錫卡營區的房子很小。有些難民帶了一點錢，因而可以買木頭蓋一間小屋。但是，大多數的難民都住在泥土與樹枝混合建造的屋子裡。

營養不良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尤其是兒童。由於營區內有一個很大的死水池塘，因而導致瘧疾流行。營區每天提供兩餐米飯和肉，根據與我談話的難民表示，肉是很罕見的。一名衣索比亞青年告訴我說：「你看，我們吃些什麼。」他捧著一大碗米飯，我問他一天吃幾餐：

「一天兩餐，修士。」

「夠嗎？」

「不夠。這便是我們所有的食物。只有米，或是一些玉米。我總是很餓。他也很餓呀！」他指著他的兒子說。

我與家人安定地住在摩加迪休。但是，在我們國家內有許多種族之間的問題，我們這一族人數眾多。我住在摩加迪休直到1991年12月。

戰爭真是一場悲劇。殘酷的景象極為普遍，街道上處處可見垂死者。有許多坦克車和手持機關槍的士兵，他們也使用迫擊砲。情況真的很糟糕，非常危險。

整個營區只有一位社工，她要處理上千件的個案，都是很困難的個案子，如飢餓、疾病、家庭困境、安置問題、恐懼等。她覺得無法處理這毫無止境的個案及每一名難民相同的需求。她心疼地對我解釋：「他們都想要多一些食物。但是，我必須告訴他們，假如我給了他們的孩子多一點食物，我就必須對每一個人如此。我能怎麼辦呢？」

在錫卡除了等候食物外，沒有什麼事可做。偶爾，讓孩子們在一片寬闊的荒蕪田地上踢足球，對他們而言，這是極少有的。如同其他難民營一樣，這裡大多數的男女難民幾乎整天都蹲在他們狹小的房屋門前，等待著。總之，這裡的貧窮、臭氣和難民的暫時停留，好似一股悲傷的潮水，從我身邊洶湧流過。



1991年12月11日，我花錢請一名帶槍的男子幫助我、我的妻子和四名子女離開摩加迪休，我的妻子懷有五個月的身孕。我們都很害怕。幸好，我們勇氣十足。這是生死攸關的時刻。留在摩加迪休是不可能的事。每天都有一、兩百人被殺。

在營裡有大批東非人圍繞在我四周，例如：頭上頂著水罐的黑皮膚蘇丹婦女；留著鬍鬚的衣索比亞男人，在太陽下站在小小的衣索比亞教堂外談話；一羣橄欖色皮膚的索馬利亞年輕男孩，用長長棉布圍住腰部，手牽手走來走去；還有穿著顏色鮮豔衣衫的索馬利亞婦女。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有如此多不同種族的人住在一起，卻很少發生打鬥。我問一名衣索比亞男子，為何他認為很少有暴力事件，他說：「我們必須相依為命，所以我們不能打鬥。」

尤其是孩子們，他們很自然地混在一起，說英語、史瓦希里語、盧安達語、衣索比亞官方語、肯亞語、阿拉伯語和其他語言，不同的語言似乎沒有造成他們之間的隔閡。在營中，大部分的孩子很自在。有一名難民告訴我，在過去五年中，確實有許多男孩和女孩在營中一起長大成人。

我們先到距離摩加迪休九十公里的一個小農村憂尼淵（Uanle Uen）去，我以為那裡會是個很安靜的地方，但是四個月後，巴瑞的軍隊來了，於是又有新的戰亂。我和我的家人徒步由憂尼淵走到肯亞。

我們帶著所有的家當走了二十九天。每走五小時，我們就得停下來為孩子準備食物和水。有些游牧民族給我們水。我們很擔憂，尤其為孩子擔憂。二十九天來我們都睡在地上。這二十九天裡，我們都是病懨懨的。

1992年5月8日，我的妻子在肯亞厄爾瓦克（El Wak）難民營的醫院裡順利生產，感謝善心人士及當地官方對我們伸出援手。

我的探訪引起難民極大的好奇，許多難民喜歡和我談話。很多次我得停下來，因為有人跑過來問一些問題，諸如：「你來自美國嗎？」「假如我到了奈洛比，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修士，你有錢嗎？」「你願意帶我回奈洛比嗎？」等等。

有一名衣索比亞的小男孩和我打招呼，問我：我是誰、我為什麼來到錫卡。我告訴他，我是一名為難民工作的耶穌會士。他笑著說：「哦！你知道聖神的恩賜是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說完便消失在錯綜複雜的簡陋木屋羣中，留下我納悶地想著是什麼因素使他發出這驚人之語呢？

最後，我們拿到聯合國的保護文件而來到奈洛比，住在錫卡難民營裡。現在我們什麼都沒有，沒有錢也沒有工作。我的家人非常擔憂。

在奈洛比，警察從不放過我們。有一天，他們要把我帶到另一個難民營去。我告訴他們，我不能去，因為我病了。最後，我必須給他們每人五十先令，這才放過



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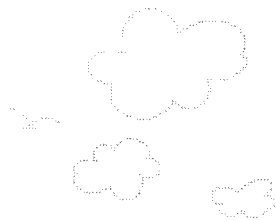
我和家人常常關在屋子裡，但是警察知道我們在哪裡。他們不進到屋子裡而在街上等。當他們在街上看見你時，他們便如同抓魚一樣地把你抓住。我有五名年幼的孩子，我的健康情況不佳。我現在想要到別處去，因為我的家人很焦慮。我們只想要過平靜的生活。

當我要離開時，一名身穿寬鬆圓領衫和褪色藍短褲的蘇丹小男孩走近我。他把原是鐵線做的衣架拆開，做成一個玩具，再接上一對從玩具車上拆下來的小輪子，他就在泥土地上推著這玩具不停地繞著圈圈玩起來了。他抬頭用史瓦希里語輕輕地問我：「你到哪裡去？」

我告訴他我要回奈洛比。

他雙眼凝視地面說：「哦，我留在這裡。」





## 垃圾

生存的方法之一便是不浪費；非洲人萬物皆可用。

——大衛·蘭巴 (David Lamb)

《非洲人》(The African)

大部分的肯亞人在戶外燒垃圾。我開始工作的第一個月就問路易絲修女，收垃圾的人何時來我們這裡。她笑著說：「修士，我們就是收垃圾的人啊！」

每一個肯亞人的房子或平房的附近——上自總統官邸，下至最破爛的貧民區茅屋——都有一堆垃圾。高級住宅區的住家用高高的木籬笆圍住他們的垃圾堆；貧民區則有一個供大家丟垃圾的坑，這裡長年都在悶燒著，因而使城裡處處都可聞到燒垃圾的辛辣味。他們點火時常常加上桉樹的葉子，如此就使城裡的空氣中飄著一股奇特的香氣。此外，老舊卡車噴出的柴油味、潮濕的紅土味，以及街角烤玉米的香味，都混合在一起，這便是奈洛比的氣味。

我們自己的垃圾堆就隱藏在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辦公室的後面，裡面堆滿了垃圾、桉樹樹葉、舊文件夾、信件和五花八門的紙類製品。上午十點鐘和下午四點鐘的茶點時間，我們的員工用一個有凹痕的大茶壺煮一壺甜奶茶。一片厚麵包塗滿當地出產、很油膩的「藍標」合成奶油，便是配茶的點心。這種



奈洛比的窮人不浪費任何東西。照片中這名貧民區裡的孩子在玩一輛用舊輪胎、棍子、廢棄電池、鐵罐子和短樹枝做成的「汽車」。(照片提供 | Don Doll, S.J.)

為「藍標」的合成奶油裝在黃色的鐵罐子裡，罐子外面果然有鮮明的藍色商標。用完的鐵罐子與垃圾和樹葉一起焚燒，因此，這些燒焦的藍標罐子就愈堆愈高。

你要很小心自己丟出去的東西。大部分我們視為無用的東西，肯亞人及難民卻不認為那是廢物。我丟到垃圾堆裡用過的信封和文件夾，總有人撿去弄乾淨並且弄平，後來，我發現這些東西出現在某人的桌子上。我丟出一些舊雜誌後，一名在我們中心工作的肯亞婦女立刻跑出去，向著火堆走去，很小心地把雜誌由大火中救出來，我看到她把它們藏在外套裡；之後，當我看完雜誌，我就會記得問她是否也想看。我丟掉的垃圾被這些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撿回去，這是一件令我感到悲傷無比的事。

有一天在我們會院裡，我把一份過期的耶穌會通訊、一些舊信件和一個月前一位美國訪客帶來的舊報紙丟進會院的垃圾桶裡，我放進一些桉樹樹葉，點火燃燒。當我走開時，我注意到我們的馬賽族警衛<sup>7</sup>若瑟在冒煙的垃圾中找東西。

不久久的某一天，當我在前門警衛室與若瑟閒聊時，我看見他從我丟掉的《時代》雜誌中撕下幾張圖片釘在牆上，圖片的邊緣已焦黑捲曲，有柯林頓總統的照片，還有男人香水的廣告。這些圖片的旁邊貼了一張從我們耶穌會通訊上剪下來的照

---

7. 警衛的史瓦希里語念作「askari」，特別是指夜巡者。這個字也用於肯亞的軍隊成員。在奈洛比，很多夜巡者是年輕的馬賽人。





片，是十幾位耶穌會士站在一所耶穌會中學門前所拍的照片。若瑟注意到我瞪著這照片看。我告訴他，我認識這些他釘在牆上的人。

他說：「修士，我很高興在我家裡有你的朋友。」



## 養雞場、241N 縫紉機和 拜訪沙飛紡織廠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是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  
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徒的喜樂與  
期望、愁苦和焦慮。

——梵二大公會議

《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一名難民為了要獲得耶穌會難民中心的創業補助款，他要經過很長的手續，包括填寫許多表格（不識字的常常要花錢請朋友代勞），還要到我們辦公室面談兩、三次。在他們計畫開創的事業上，他們必須提出自己的專業技能，例如：婦女要拿出她的縫紉作品，或裁縫班的課程證明。在發放補助款之前，烏塔和我要先訪視難民的家庭。他們領到補助款之後，我們便要監督他們計畫的執行情形，提供建議，並幫助他們排除面臨的困難。

我們明確向他們說明，這些事業是他們自己的事業，雖然開辦費來自我們。他們不是我們雇用的員工；他們有完全的自我決定權。為了維護他們的尊嚴和顧及他們自己創業的滿足感，我們覺得這種聲明是極為重要的。



由於烏塔已有一年多與難民一起工作的經驗，對不同的事業團體、難民居住的貧民區及各式各樣的工作計畫，她真是瞭若指掌。她的敏銳及與難民建立的良好關係，令我印象深刻；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她一樣，成為難民信任的人。

當我來到這裡工作時，烏塔和貝瑞爾已經指導了二十多個單獨的計畫。其多元性令人嘆為觀止。

例如，我們負責一個設在我們辦公室附近貧民區中的養雞場。烏塔已經決定我應該盡快去探訪那裡的難民。因為那養雞場正面臨一些困難，烏塔認為現在去探訪他們是最好的時刻。

我們兩人看起來一定是很奇怪的一對。烏塔是一位非常優雅的女子，她戴著在印度時就習慣戴的手鐲和臂鐲，以及肯亞難民做的項鍊，再配上明亮的花襯衫和花布裙。而我呢，花了一些時間才想出該穿什麼衣服比較適合。戴神職人員的白領太熱，所以不列入考慮，而牛仔褲也太熱了。最後，我發現卡其短褲和短袖棉質襯衫很恰當。舊運動鞋也很適合，因為無論我穿什麼鞋子，一沾上奈洛比的黏性泥土，總是會變得硬硬的。背包很方便，可以放一件毛衣——以防突然變冷，還有紙和筆，供我記事之用。勿庸置疑的，當我們兩人走過滿地垃圾的泥地，走向貧民區的難民家庭時，一定是引人注目的。

「哈囉！」烏塔進入某人的家或某個工作場所時，總是愉快地大聲向大家打招呼，以這種方式，我們進入一間低矮的簡陋木屋，幾百隻小雞在骯髒的地上跑來跑去。養雞場（日後我

們負責三處)總是令經營它們的難民頭痛不已。經營養雞場的難民告訴我,這裡容易發生雞瘟,尤其是在東非。雞隻連續不斷地死亡引起難民與供給小雞的孵卵所之間激烈的爭鬥。當我彎著腰站在一名烏干達難民山姆昏暗的雞舍中時,他對我說:「哈,修士,你看看這些小雞,牠們都在生病呀!」

根據我對雞隻疾病有限的知識,我承認,我看不出來牠們在生病,但是我還是相信他的話。果然,幾天後,山姆手裡提著一隻黃色死雞走進我的辦公室,要我查驗。他哀傷地說:「修士,牠們都死了。」接下來的三週,山姆和我輪流以憤怒的口吻打電話給納庫魯孵卵所(Nakuru Hatcheries)要求賠償,後來他終於拿到了。

下一批小雞品質好多了,幾個月後,山姆面帶微笑走進我的辦公室。這次不是拎著一隻死雞,而是手裡握著一個黃褐色雞蛋,他興高采烈地說:「我們已經恢復原狀了。」

我們也負責一間小型麵包店,裡面有八名盧安達婦女一起工作,她們似乎永遠爭吵不休。她們以盧安達語的「禮物」一字為這家麵包店命名。每天她們烘焙可口的白麵包和褐色麵包,但是,售價卻比一般市面上的麵包貴。這是她們面臨的考驗。我們輔導的其他計畫包括:兩家衣索比亞餐廳、由三名烏干達難民經營的木工場、兩家普通商店、牛奶及奶製品農場、一名盧安達婦女製作珠子項鍊、兩名婦女製作蠟染和紮染織布、兩家理髮店、一名烏干達男士製作金屬拐杖及義肢,賣給索馬利亞戰爭中的受傷者。

我們的裁縫業計畫從一名婦女的家庭工作室到十名婦女合



作的公司都有，是目前這種小型企業中數目最多的。似乎所有來自盧安達、衣索比亞、烏干達、蘇丹的女性難民都會縫紉，在完成申請的過程中，我們很容易證明她們的技術。裁縫業計畫也容易實施，我們只需要提供縫紉機、線以及一些布料就夠了。在第一年，我們就買了十五台縫紉機供給她們使用，後來，我向設在奈洛比、一間小型的勝家公司購買縫紉機，無論何時我向他們訂購兩台或三台機器時，他們總是很興奮地說：「修士，你是我們最大的客戶。」

經過一段時間後，在挑選合適的縫紉機上，我成為一名專家。開始接辦這裁縫業計畫，在對它了解不深時，基於貴的機器是用途最多的理論，我都買最貴的縫紉機，後來我發現，許多婦女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機器。此後，我便改買簡單又經久耐用的縫紉機；它們容易操作，也不需要常修理。勝家 241N 型便是我們的選擇，它能車直線、縫扣子，和車出「之」字型的線條。

關於材料，我們讓這些婦女付給鎮上的布料商支票。然而，這又造成了一些問題。

在奈洛比，大部分的布店都是由被肯亞人以嘲笑口吻所稱的「亞洲人」所經營。席瓦·奈波爾（Shiva Naipaul）在他具有獨到見解的著作《北南》（*North of South*）中這樣寫道：

我不喜歡這名詞，它是為了要把次大陸的民族混為一談而杜撰的簡易又方便的表達方式。然而，因為這種用法已經極為普遍又根深柢固，我就不便苛責它了。無

論如何，它已經得到了它的情感訴求。我把它視為東非特有的政治性劃分，而不把它當成普遍認同的象徵。

這些印度和巴基斯坦人的祖先，是在殖民擴展時期與英國人一起來到肯亞的（或被迫參加修建東非鐵路工程），之後他們就成了這些國家裡商人階級中的一份子。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常引起當地人民的厭惡。例如，阿敏為了滿足該國人民要從非烏干達人手中奪取商業控制權，便在 1972 年將所有「亞洲人」及非烏干達人驅逐出境。不幸的是，他這項輕率的決定使國家陷入經濟停頓狀況，至少在小型企業上是如此，這種情況目前仍在復甦中。現在的烏干達政府已經邀請這些「亞洲人」回來工作。

雖然如此，肯亞政府似乎還不太了解這些「亞洲」商人的重要性。但是在奈洛比市中心，「亞洲」商品卻極為流行，尤其是布料、線和小型機器。然而，這種經濟上的成就卻是以高價換取的。

賈桂玲是一名患有癲瘋病的烏干達難民。她的右手只有三根手指，左手有兩根手指和一根拇指。賈桂玲只能說幾句簡單的英文，因此我們要透過一位朋友的翻譯，才能與她溝通。她用毛巾布和泡棉做成老鼠偶，以十先令賣給鄰近的孩子們。她的身體狀況使她做縫紉工作非常困難。因此，與她面談幾次後，烏塔和我決定為她提供一台機器和一些材料。

她的企畫案獲准的那天，我開了一張五百先令的支票給「紗飛紡織廠」，這是鎮上的一家布店。當我把支票給她時，她滿



臉笑容地以盧安達語對她的翻譯人員說，她要用這張支票製作許多老鼠偶。

幾小時後，賈桂玲和她的朋友回來，她把折起來的支票還給我。翻譯人員說，布店拒絕收支票。我說，或許他們不知道我們機構的名稱吧？然後寫了一張便條紙讓賈桂玲下次帶去。我給了她們車資，隨後她們便出發了。幾小時後她們又回來了，我和她們談過後發現，那些商人不僅拒收支票，甚至不願意與她們交談。於是我決定陪賈桂玲一同前往紗飛紡織廠。

第二天早晨，我們三人擠進我的吉普車裡，前往奈洛比。她們告訴我通往紗飛紡織廠的路，工廠設在旅館後方一條狹窄的主幹道上，街道兩旁各式各樣的商店林立，有種子批發店、旅行社、招牌店及其他商店。紗飛紡織廠便夾在兩家大型的布店中。我把車子停在遠處、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我向她們建議：「妳們不妨再試試吧！」她們很懷疑地看著我。

幾分鐘後，她們從店裡出來，對我說：「修士，他們又把我們趕出來了。」

我拿著支票，義憤填膺地走進店裡，賈桂玲和她的朋友則在烈日下倚靠著吉普車聊天。陰暗的店裡有一排一排的深色木頭架子，上面放滿了大捲的彩色布料，一長條玻璃櫃台後面有許多雇用的肯亞人安靜地站著。在店的最裡面有一名坐在高凳子上、身材高大的印度老兄，我猜想他應該是店主。他跳下凳子，衝到櫃台前。

「先生，我能為你效勞嗎？」他說。

為使事情更有效率，我決定直接說明事實，而不對他提出

抗議。我認為幫助難民比發洩我的怒火更緊急。我向他說明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準備將所有難民集中到這裡，因而要與紗飛紡織廠作大筆交易，請問他對此有興趣嗎？他答說：「絕對有。」他是否能向我保證，他將善待難民並尊重他們呢？「絕對會，」他回答。

我走出商店，在耀眼的陽光下，叫賈桂玲和她的朋友進來。店主愉快地笑著。在幾分鐘內，賈桂玲買了幾碼粉紅色的毛巾布，我發現還打了折扣。

這種偏見並不只限於鎮上的少數店主。從難民的立場來看，更嚴重的是；肯亞當地老百姓常常對他們懷有偏見。貧窮的肯亞人憎恨任何搶去他們就業機會的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在肯亞北部的難民營不斷地增加，傳說難民的生活比當地人民優渥的流言，處處都可聽到，這還要感謝提供難民房屋的聯合國，以及提供各樣物品的各種救濟機構。不過，這也造成當地居民與難民營中的難民之間，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和偶爾發生的暴力衝突。

當有人意識到住在奈洛比的難民過著小康的生活，或至少過得比肯亞人民要好時，他們便會因忌妒而採取報復行動。有一名婦女，我們為她提供了一台大型縫紉機（回想起來，那是一台太大又太貴的機器），有一天當她回家時，發現自己的家被別人燒毀。另一名婦女的房東看到她的裁縫事業蒸蒸日上，便立刻提高房租，吸取她微薄的利潤。

一名盧安達婦女荷西，想要與朋友合夥開一家賣炸魚和薯條的小店，她多次邀請我去探訪她。有一天下午，我答應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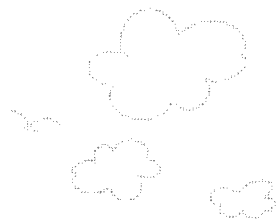




和她一起回家，那是位在丹道拉城（Damdora）一個範圍很大的貧民區裡。我以為她會高興我的來到，並且也省了一趟公車車資。但是，從荷西臉上的表情，我知道並非如此。她低下頭說：「抱歉，修士，今天你不能來。我的房東在家，假如她看見你來探訪我，她肯定會漲房租的。」她對我說，當這些房東看到白人臉孔時，他們也看到了錢。一直等到這名房東去拜訪自己的親戚時，我才有機會到荷西的家裡去。

之後，我聽說，當房東從荷西的鄰居那裡得知我的祕密探訪後，就立刻提高了她的房租。





## 標準

在肯亞開車真是險象環生……外來的駕駛者應遵守交通規則，但是，當地那些不怕死的人卻不如此。

——《福多旅遊指南：肯亞與坦尚尼亞》  
(*Fodor's Guide to Kenya & Tanzania*)

老實說，在我來到奈洛比之前，我最大的恐懼便是開車。之前，我從未開過手排檔的汽車，我知道，我必須學習如何在靠左行走的道路上開車。

對一名習慣使用手排檔的高手而言，在奈洛比開車也是一件困難的事。市區裡主要道路通常都如同狹窄的巷弄。因此，假如有人要穿過馬路，你就得轉到另一條路上去，如此就常常有與另一輛車頭對頭的機會。行人隨意停留在路上，無視於行駛中車輛的存在。黛芙拉（Dervla Murphy）在她的大作《烏奇姆維之路》（*The Ukimui Road*）中描寫她由肯亞到辛巴威的過程，書中生動描述了在東非最大城市乘車的情形：

我沒有計畫在奈洛比逗留，第一天的經驗也沒有改變我的心意。天亮時分，這些精神恍惚的駕駛員已經在街上相互賽車。看見他們彼此協調如何穿越肯亞大道，讓我冷汗直冒。



城市道路狀況很差。幾條柏油路面布滿了足以讓車軸斷裂的大坑洞。一些居民告訴我，像減速丘的隆起路面是馬路最平整的部分。柏油道路常常只有一半是柏油，其餘的便是泥土；車輪會把這些柏油與泥土的混合物捲起來，在地上拖一英尺長。一年之中大部分時間，灰塵與壓平的泥土所形成的高低不平路面，使行駛的車輛顛簸不已。在奈洛比起伏路面上開車，如同騎在一匹難以駕馭的馬上。當車子上下搖晃不停時，為確保自身安全，乘客就得緊緊抓住儀表板、座椅或車頂。雨季時，這些道路就變成一條紅色的淤泥河流。

在奈洛比缺少照明的路燈，因此，駕駛員在晚上會任意使用遠光燈，而使得對面來車看不清楚路況。無所不在的迷你巴士在滿地坑洞的道路上瘋狂飛駛而過。迷你巴士的車費是每人三先令，司機的收入就是以能擠進多少乘客而定，他們在擁擠的城市街道上追趕對方的車，為要搶先到達下一站。我曾看見一輛迷你巴士急速轉彎，因而翻倒，把乘客拋出車外，跌倒在路上。這些憤怒的乘客對著司機揮舞拳頭，但是，幾分鐘後，大家就把翻倒的車子扶正，車子很快就開走了。另一個標準的景象便是一輛大型柴油卡車慢慢爬上奈洛比的陡峭山丘，因而造成一條長長的車陣尾隨其後，等待超車的機會，著急地想要駛入右邊對面來車的車道上。

然而，這些崎嶇不平的道路不僅對旅行者和駕駛者造成危險，從整個非洲大陸的觀點來看，這些道路阻礙了貨物應有的順暢運輸。誠如坦尚尼亞第一位總統朱利葉斯·尼雷爾（Julius



隨著時間的腳步，我與這名烏干達難民艾麗絲·納維爾（Alice Nabwire）成為好朋友。艾麗絲為自己在奈洛比恩甘多區（Ngando）開創的小型裁縫事業引以為榮，並取名為「愛拉納裁縫店」，她與其他兩名女性難民合夥經營。



Nyerere) 所說的名言，當強權大國已經在嘗試如何登陸月球時，「在非洲的我們還在設法如何到達鄰近的村莊」。

最後，為提醒人民駕駛的危險性，奈洛比最大的報紙《國家日報》在第三版以顯著的專區，每天刊登在肯亞因車禍死亡的人數。而數字旁邊則是去年的車禍死亡人數。

因此，在我來到肯亞幾個月之後，懷著極大的恐懼開始學習駕駛。我們團體中的一位耶穌會士慷慨地教我使用手排車，之後兩週，我安靜地坐在我們修會一輛進出附近地區的車上，開車的弟兄告訴我有關進氣岐管、汽化器、襯墊等種種事情，我還學到如何換輪胎。最後，我學到如何換排檔、左邊開車以及用迂迴的方式與肯亞人交涉。

不久，我便自己開車外出。耶穌會難民中心以美金一千元買了一輛車齡十五年的土黃色鈴木吉普車，我很高興有這輛車，如此，我就可以更方便去探訪難民。然而，讓人覺得痛苦的是，四個排檔每次只能使用一個，也沒有減震器，後車門隨時都可能自己打開，引擎還會發出嘈雜聲。雖然如此，它卻能讓我開到任何地方去，包括奈洛比的貧民區或肯亞野生動物保護區。

我剛來這裡的頭幾個月，屬於自己的時間比較多，可以開車外出，四處逛逛，而長時間的開車常常令人注意力分散。另一位派來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工作的年輕耶穌會士柯瑞根，在我抵達不久便前往坦尚尼亞的維多利亞湖區，參加一個為期四個月的語言課程。柯瑞根認為他可能在東非停留較長的時間，因此有必要多學一些史瓦希里語。我選擇在奈洛比學習語言，因為我想要多學一些「肯亞的」史瓦希里語，另一方面，我很

難在一處容易感染瘧疾的地方學習語言。柯瑞根離開後，除了難民和修會團體中友善但年齡在六十到六十九歲之間的會士之外，我認識的人就很少了。最主要的是，我非常想念遠在家鄉的朋友和家人。簡而言之，我很寂寞。

因此，我決定找時間開著我的新車去探索這座城市。下班後，我便鑽進我的吉普車，穿過市中心擁擠的街道，堵塞在公車與越野車中間，設法認識奈洛比；我開進占有肯亞首都三分之二面積的貧民區；我開在少數富人住宅區的林蔭大道上，有一些國外移民和肯亞白人的房子都隱藏在白色九重葛小山岡的後面。有時，我帶著冒險的心情把車開出了奈洛比，那塞滿車輛的街道緊接著一條穿過寬廣大草原的長長柏油碎石路，使我能偶爾看到斑馬、長頸鹿或瞪眼羚羊。

這輛生鏽的吉普車不是一輛搶眼的車子，但是當它搖搖晃晃地駛在街上時，難民立刻認出它來。當他們看見我，他們便伸出右臂，手掌朝下，上下擺動跟我打招呼，要求搭便車。傍晚我下班開車回修院，很少是獨自一人。有一天，三名難民擠在後座。當我們搖搖晃晃駛在高低不平的泥土路上時，他們在車上有說有笑。他們的聲音蓋過隆隆的引擎聲，大聲說道：「我們就像運往市場的雞隻！」這句話引起更多的笑聲。

令人好奇的是，肯亞人和難民似乎不要我在車上做任何事，假如我要洗我弄髒了的衣服，他們便抗議說：「修士，你不應該做這件事！」我想，這可能是他們考慮到我身為「司鐸」的尊嚴，或因為我是一名白人的身分吧！或者他們就是想要替我洗，賺一點錢。有一天，我駛在一條寬廣的公路上，車子突然



爆胎，我把車子推到路肩，開始動手換輪胎。當我正在換輪胎時，一輛等待開上公路的中巴停在我身旁，我轉過身來，看見車上的每一個人都在窺視我。

「神父，讓我來吧！」有一個人提高聲音，從窗口對我說：「我來換。」

我轉過頭來，笑著問他，是否他認為白人不能換輪胎。他回答說，這正是他所想的。車上其他乘客也都笑了，此時，車子也開走了。

白人駕駛常引起窮困的肯亞警察注意，通常他們要白人停車，向他勒索，理由是「你違反了交通規則」。例如：你開到對面車道超車（其實，人人都如此），超速（交通法上沒有明文規定），你開在單行道上（也沒有明文規定）。現在你必須付罰款，並且立刻就付。常常是一位司鐸、修士或修女勸阻警察不要強取這類罰款。但是並非每次如此。

有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名警察要我把車開過來，說車子的大燈不亮。我本想道歉了事，但是我非常懷疑在中午時刻，他怎麼知道我的大燈不亮呢？

「我看得出來。」他說：「五百先令。」

我打開大燈，從吉普車出來。

我彎下身，查看我的大燈，指著燈說：「你看，燈是亮的。」而他卻說燈不亮。

爭辯一些時間後，我跪在地上，用手罩在一盞燈的四周，想要指出他的錯誤。最後，他對這樣的爭辯感到無趣，揮揮手要我走了。

許多的證據證明警官的貪婪行為。一名肯亞警官與一名坦尚尼亞的耶穌會士搭訕，並且說他的車是教區的財產。警官想要搭車去拜訪樞機主教並向他收錢。當警察站在路邊要你停車時，你不要理會就好了。事實上，警察沒有車可以追趕違規的駕駛者。



艾麗絲·納維爾是一名烏干達難民，我很喜歡她，我們是很好的朋友。她開了一家小型裁縫店，取名為「愛拉納裁縫店」，她雇用了另外兩名烏干達難民，瑪麗和瓊絲。艾麗絲是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常常帶著燦爛的笑容，她不時取笑我這容易受騙的個性（她認為，假如我不提高警覺，其他難民會利用我的這種弱點），例如我不標準的史瓦希里語和我這輛小型吉普車。在面對艱苦的生活時，艾麗絲總是懷著希望，對我而言，她活出了聖保祿的名言：「我們處處受到磨難，但是沒有被打倒；感到困惑，卻不失望……被打倒，但未被消滅。」

在我認識的難民中，艾麗絲是最懂得如何堅持到底的一位。早先，當我發現我可以將她縫製的衣服賣給奈洛比的朋友時，假如我挑選兩件，她就會要我買三件，假如我請她縫製三件衣服，她又說縫製四件會便宜得多。通常我就讓步了。

交易談妥後，我同意開車送艾麗絲回家，她家是在距離我的辦公室幾公里外的貧民區內。當她正問我為何不多買幾件她縫製的衣服時，一名警察揮旗要我們靠路邊停車，我便服從地把車開到路邊。當車要停止時，艾麗絲把身體縮到座位裡。肯





亞警察對待難民的殘酷態度早已惡名昭彰，他們污辱他們，打他們，撕毀他們的聯合國難民身分證。

「你好！」我很高興地對這名警官打招呼。

「證件，」他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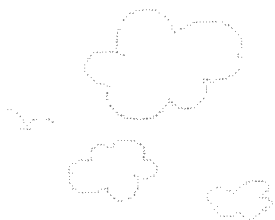
我把證件給艾麗絲，由她遞給這名警官。他冷酷地瞪著艾麗絲，然後又察看我的證件。我已經忘記，我們耶穌會團體的院長曾建議我要申請一張上面寫著：「詹姆士·馬丁神父」證件的這件事了。

「哦，沒事！」他抱歉地<sup>8</sup>說著。警察揮揮手叫我走，我便開車走了。

艾麗絲非常地驚訝。這和警察在面對難民時的處理方式是多麼明顯的不同啊！這件事不會就這樣過了。我們再度駛回公路上時，艾麗絲說：「修士，成為白人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啊！」

---

8. pole 是史瓦希里語的「抱歉」之意，可用在任何場合，小至踩到腳趾頭或丟掉一支鉛筆，大至失去親愛的家人。pole sana 是「非常抱歉」的意思。有趣的是，pole pole 是「慢慢的，慢慢來」的意思。



## 非洲人的圍巾

窮人被視為是好消息的基本接受者，他們有與生俱來的能力，因此比任何人「更」了解這好消息。

——索布里諾神父 (Jon Sobrino, S. J.)

《真教會和窮人》

(*The True Church and the Poor*)

長久以來難民興辦的事業，尤其是裁縫業，所面臨的挑戰便是如何找到客戶。有三個主要的困難使得難民無法銷售他們的產品。首先是市場，最近的市場就是在貧民區內，而他們的鄰居卻無能力購買他們的商品。其次，是奈洛比觀光客聚集地點的市場，但是觀光客所要求的品質遠遠超過他們這種小型工廠所能達到的。最後，有能力購買難民產品的人，像觀光客、富有的肯亞人以及國外移民者，他們遊走於奈洛比附近的貧民區之間，尋找殺價的可能性。

稍早，我曾想過，打入司鐸和修會團體這一個相當大的市場，應該是很好的主意。我想這可能是我能幫助烏塔和其他難民的實際方法。奈洛比是修會團體在東非的非官方總院所在地，大部分的修會都在這裡設有一個會院。在凱倫鎮 (Karen，《遠離非洲》一書的作者艾塞克·丹妮笙 (Isak Dinesen)，原名為凱倫·白烈森 (Karen Blixen)，就是取名自該城市之名。) 外的邊



緣地區被尊稱為「小梵蒂岡」，說明許多修會團體在那裡設有自己的會院。無數的天主教司鐸、修士和修女進出我的辦公室，拜訪路易絲修女和我。他們之中有許多人對那些堆積在我們辦公室中的難民手工藝製品表達無比的讚嘆。我想，或許我可以請難民縫紉團體為神父縫製舉行彌撒時所穿的領帶。一條非洲式樣的領帶可能是最適合的，愈實用就愈有市場。

但是我並不確定什麼是「非洲」風格。幾週前，我第一次拜訪耶穌會在奈洛比設立的西克瑪（Hekima）神學院（「西克瑪」是史瓦希里語，意思是「智慧」）。神學院聖堂祭台後方的牆壁上有一幅巨大、極為耀眼的壁畫，在最近一期《時代》雜誌報導非洲藝術的專輯中也刊登了這件作品。這件畫作長二十英尺，寬十英尺，四周圍繞著紅、橘、黃三色鋸齒形的雕飾，鮮豔的色彩反映在聖堂的牆壁上。作品中心有一個巨大的十字架圖形。被釘的耶穌的臉好似一個非洲的面具。瑪利亞和若望宗徒站在十字架兩側，都穿著非洲的衣服，前者的衣服是橘色與深褐色，後者的衣服是鮮紅色與白色。畫作的底部是奈洛比的天際，包括城中幾棟高樓和貧民區的木造房屋。在十字架的兩旁是兩幅福音的圖畫，一幅是增餅奇蹟，畫中有身穿藍綠條紋、背著裝滿麵包籃子的非洲婦女，另一幅是加納婚宴，畫中有頭上頂著紅色陶土水罐的婦女。

幾週後，我向一位耶穌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Jesus）的安斯卡修女提到這幅畫，她是衣索比亞人。我說：「我真的喜歡那個小聖堂。」

「西克瑪聖堂嗎？」安斯卡修女皺著眉頭說。

「妳不喜歡嗎？」我問。

她以極藐視的態度說：「啊！西克瑪神學院的聖堂太醜了。耶穌的臉像什麼？不是像一個面具嗎？耶穌臉上戴一個面具？真可笑！」

「難道那不是……非洲藝術嗎？」

「修士，那不是我的非洲。在衣索比亞我們不會這樣畫的。這名藝術家來自喀麥隆。」她說。

安斯卡修女直率的評語幫助我了解過去一些朋友常常對我說的話：沒有所謂「非洲的」文化。衣索比亞嗎？肯亞嗎？「非洲的」這個語詞就如同「歐洲的」那樣空洞。

因此，我不再提製作代表難民自己國家的禮儀用的領帶了，而與一名經營裁縫事業的婦女討論非洲文化的問題。

三十五歲的高蒂（Gaudiosa Ruzage），當她還是孩童時便在1960年代與家人由盧安達移民到肯亞，他們都是本國內長期種族衝突的受害者。高蒂身材修長，舉止優雅，有一對杏眼，且具有令人愉悅的幽默感。如同許多在奈洛比的盧安達人，高蒂是按照自己祖國的傳統在肯亞長大。許多盧安達難民都擠在距離我們耶穌會團體不遠的貧民區內。在這區內，處處都是滿地坑洞的泥巴路，每逢雨季，這些道路就變成無法通行的泥河，在這裡，你可以聽見肯亞口音的盧安達語、史瓦希里語或英語。

如同艾麗絲一樣，高蒂的堅持常常使我感到驚訝無比。一年前，她由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獲得一台縫紉機，從此，便開始了她所謂的小型「輝煌裁縫」企業。她的裁縫店設在貧民區內一棟沾滿泥巴的水泥建築的三樓裡。靠近這棟建築的道路入



口處是一家屠宰店，長串的牛肉吊在天花板上的金屬掛勾上，蒼蠅在帶腥味的肉塊四周飛來飛去。

高蒂是一名傑出的裁縫師，縫製中非風格的衣服和襯衫，有精美的繡花領，採用粗的棉線，配上流線型的袖子。在幾個月內，高蒂賺到足夠的錢，就買了兩台新縫紉機，並將她的朋友組成了一家婦女公司。幾個月後，她詢問由路易絲修女負責的耶穌會獎學金計畫，是否可以考慮送幾個學生到她店裡來學習。現在，高蒂也經營起「輝煌裁縫班」了。

我向她提出為司鐸縫製禮儀用的領帶想法。她坦誠地說：「修士，我從未看過禮儀用的領帶。或許你可以拿一條來讓我研究一下，然後看看我是否能做。」

第二天，我發現高蒂耐性地研究我從會院借來的一條舊領帶。當她用手摸那綠色的棉質布料時說：「哦，這很容易做。」

「我們就開始做，你想要什麼圖案？」她自信滿滿地問。

「我覺得別人想要買這些領帶，是因為他們想要代表非洲或盧安達的圖案吧。」

她熱誠地點點頭說：「是的，他們會！他們會買這些的。」幾天後，高蒂拎著一個黑色塑膠袋走進我的辦公室。她問候我、和我握手，嘆通一聲坐在一張木頭椅子裡，擦一擦額上的汗說：「這些公車！」顯然的，她搭了一趟擁擠的車。她從袋子裡拿出了許多新縫製的領帶，說道：「修士，我把你要的圍巾帶來了。」

很不幸的是，我一眼便看出她所謂的「圍巾」，就是我從耶穌會會院借來的領帶的複製品：綠底繡上白色十字架。她說：「我完全按照你給我的樣子來縫製。」

我努力地再一次說明我想要的式樣。

「高蒂，妳知道嗎，我想別人真正喜歡的是一些帶有盧安達風格的領帶，我說的對嗎？」

她瞪著我，顯然的，對她而言，我的話是無意義的。我勇敢地又解釋了一遍我想要的。我問她，在盧安達司鐸所用的領帶是什麼樣子的？或許她可以用那些當作式樣來縫製這些領帶。

幾天後，高蒂又來了，背了另一個黑色的塑膠袋。她拿出更多的領帶，把它們放在桌子上，說道：「修士，我問過一些盧安達婦女我要做的領帶。她們說，這就是盧安達司鐸們用的圍巾。」

無疑的，這些領帶與前幾天我看到的很相似。顯而易見的是，在盧安達的司鐸採用西方傳教士的式樣。我從一堆領帶中抽出一條，她立刻伸過手來把那條抽回。

她說：「哦，修士，那一條還沒有完工。你看，我們只能把剩下的布料用在反面。」

高蒂翻到反面那些由色彩鮮豔的布料構成的圖案，是大片紅色與綠色葉子交織在深藍色的底布上。我說：「好漂亮！這是什麼？」

高蒂笑著說：「哦，修士，這是一些剩下的布料，我們把它用在圍巾的反面。」她解釋說，這些是盧安達和中非婦女用

---

9. kitenge 是一種顏色鮮豔亮麗的布料，產自剛果，外銷到奈洛比。這些厚重的棉質布料是做成女人裙子和男人襯衫的最好材質，他們通常會在布上面繡些水果、鳥和幾何圖形的圖案。



來縫製自己較好衣服用的「kitenge」<sup>9</sup>，「你要用這種布料縫製你們的領帶嗎？啊，這些美國人不會戴這種圍巾的呀！」

令人高興的是高蒂錯了。她用鮮豔的紅綠布料所縫製的領帶，立刻被一位前來訪問的非洲裔美籍司鐸買去，他買了十條。高蒂和她的夥伴利用手邊的布料，以最簡單的圖案，縫製出極為暢銷的美麗領帶，使得店裡幾乎沒有存貨。

「啊！天主真好。」幾天後，當我把一張十條領帶的訂單給她時，她平靜的說道。

是的，天主真好，我說，但是，她為何這樣認為呢？

「為什麼？」高蒂拍拍手，笑著說：「修士，祂幫助我們用掉這些剩下的布料。祂給我錢縫製這些容易做的領帶。祂讓我們的店有生意，幫助我的夥伴賺錢。真的，修士，你一定看到天主真的很好呀！」





## 「我向你求救！」

只因為你可能受騙而對所有人抱持偏見，這是不公平的。向一些不值得如此對待的窮人行善，總好過拒絕一位值得如此對待的人。

——聖克勞迪·泰弗內 (St. Claudine Thévenet)

雖然我很快發現自己把全部時間都投入小型企業的計畫中，但是，我還是繼續在距離耶穌會會院不遠的路易絲修女辦公室裡工作。與路易絲修女和她的蘇丹助理一起工作的是兩名受過高等教育、泰然自若並且極為高貴的肯亞婦女，兩人的名字都是珍 (Jane)。我的辦公室在樓上，空間寬敞，有一張書桌，兩張由難民木工場製造的木頭椅子，一支偶爾能通的電話。當我開始去認識難民時，我發覺自己對他們的祖國認識極少。

「所以，你是從蘇丹上來的哦？」有一天，我對一名蘇丹難民說。

「不對，修士，蘇丹在北方，我從南方上來。」他禮貌地回答。

因此，我買了一幅巨大的塑膠非洲地圖掛在牆上，和另一幅大的奈洛比地圖。現在，我可以請難民指出他們來自何處，以及他們目前居住的地點了。





大約在十月，奈洛比的難民發現有一個新來的人正在推動賺錢計畫。無數的人來到路易絲修女辦公室來找我，請求協助某一個企業計畫，或者，最多的就是申請小額金錢援助，例如：某人因為沒有付房租而被鎖在門外；一名婦女需要幾個先令為孩子買奶粉。我很高興從急難救助基金中支付這些緊急需要。

不幸的是，最困難的便是要知道誰說真話、誰在撒謊，我曾經很有效率的對許多難民做了篩選。

我幫助的第一批難民中的一名烏干達男子，他有個悲慘遭遇。

他說，他來奈洛比的目的是要找尋自己的兄弟。1970 年代阿敏當政時，他們便走散了，此後再也沒有見過面（到目前為止，他的故事還可以相信）。不幸的是，他不知道他的兄弟住在哪裡，他希望能在這裡找到他。但是，他根本無法找到他。讓我感到疑惑的是，在對自己兄弟毫無音訊的情況下，為何由烏干達來到肯亞，而彼此都沒有電話，他又如何來奈洛比找自己的兄弟呢？

他坦承地說：「我現在已經無依無靠了。」他說明自己沒有錢返回家鄉，在奈洛比也沒有朋友。我對他的處境深感同情，真是不幸，不僅沒有找到自己的兄弟，而且又窮又孤單。

「修士，我現在向你求救！」他高舉著雙手說道：「請因耶穌基督之名給我錢，讓我回家吧！」

當然，我會給他錢。當他拿到五百元先令時，面帶笑容地走了。

這件事立刻在難民中傳開了。第二天，另一名年輕的烏干達男子來找我。

他滿臉哀傷地說：「我剛從烏干達來這裡找我的兄弟，但是，我發現他不在這裡。我現在無依無靠，修士，我向你求救，你一定要幫助我。」

我向路易絲修女提到這些巧合的故事，她只是笑笑地說：「你太容易相信別人了。」

修女勸告我說：「下次你開車送他到車站，替他買一張車票。你就明白他是否想要回家。」

因此，幾天後，當又有一名烏干達男子來找我，並且說：「修士，我現在無依無靠」時，我會質疑他的故事。

他強調地說：「但是，修士，我不會編造故事，我不會對你撒謊的。」

我提出開車送他到車站的主意。他看了我幾秒鐘之後，臉上帶著淡淡的笑容。然後靠在椅背上說：「啊，修士，你已經在肯亞很久了，是嗎？」





奈洛比的貧民區之一，許多難民居住在這裡。



## 貧民區「卡王維爾」

我們兄弟姐妹的能力必須視為我們自己的能力，當他們瀕臨危險時的痛苦，也是我們自己的痛苦，因為，我們確實是一個身體。

——聖西彼廉（St. Cyprian of Alexandria）

《第 59 號書信》（*Letter 59*）

奈洛比地區的貧民區都有一個超過實際狀況的可愛名字。這些名字都是不同的地方語言，像 Dondora, Ngando, Mukuru, Riruta, Ngong, Kawangware, Kibera。有些名字源自於馬賽語或奇庫尤語（Kikuyu），像 Mathare, Uthiru, Kangemi。例如「Ngong」是馬賽語，有「關節」的意思。有一座從奈洛比任何角度都可以看見的藍色恩貢山（Ngong Hills），就很像一個朝向自己的拳頭上的關節。一位馬賽友人向我解釋說：天主完成了東非大裂谷（Great Rift Valley）的創造工程後，又用手將它抹去，卻把祂的關節留了下來。另外，奈洛比（Nairobi）這字有「冷水」的意思。許多鄰近地區的名字則是史瓦希里語，像我們耶穌會會院所在地 Kilimani 的意思便是「在山丘中」。

幾個月以來，每當難民說他們的家在「南海」（South Sea）時，我就對這帶有異國風味的鄰近地區感到好奇。或許是一些逗留在熱帶的退休英國探險家，在沈思中為英屬東非的這些地



區所命的名吧！令人失望的是，當我要去拜訪這些地區時，在我的大地圖上所找到的只是緊鄰「南B區」的「南C區」，這些名稱都出於這座陰暗城市設計者的想像。

有些貧民區的名字是英國殖民時代留下來的地名，例如位於奈洛比以北的Kariokor是一個大型的戶外市場，曾經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航空母艦官兵居住的地方。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另一處較遠的貧民區原是修車廠，砰砰的敲打聲不絕於耳，那個地方叫Kariobangi。

許多難民都是按照不同的國籍各自羣居在一起，例如：盧安達難民住在 Riruta 和 Dandora、烏干達難民住在 Ngando、索馬利亞難民住在 Eastleigh、衣索比亞難民住在南 C 區、Kibera 和瑪他山谷（Mathare Valley）。難民雖然各有自己的區域，但是距離卻很近。居民雖不同，但貧民區的外觀卻極為相似：骯髒泥濘的道路，令人窒息的垃圾腐爛味道瀰漫在擁擠破舊的水泥建築物，與有著生鏽凹凸鐵皮為屋頂的小木屋之間。處處都有人在活動著：婦女在自己家門口的炭爐上煮飯；赤裸的孩子在母親身旁玩耍；提著大水壺及頭頂水罐的婦女穿梭於垃圾之間；男人以聊天、呆坐、吸煙來打發時間；少數幾名穿著整齊的肯亞人路過這裡到他們工作的城裡去。有趣的是，附近的鄰居竟然稱那裡為「貧民區」，這是我最初不敢用的稱呼，因為怕冒犯這些難民。

我在貧民區裡逛來逛去從不會覺得害怕，即使我常常在那迷宮似的木造小屋之間迷了路。當然，我的膚色立刻顯示出我是一名「司鐸」，或至少是一名救濟工作者。一位美國大使館

官員在一次晚宴上告訴我：「只有兩種白人會在貧民區裡逛來逛去，就是司鐸和中央情報局幹員。」（我沒有問為何中央情報局的幹員要探聽奈洛比貧民區的情況）事實上，我知道有些史瓦希里人會幫助我穿過垃圾滿地的狹窄通道去尋找難民開的店或他們的家。無論在任何情況中，令人情緒激動的不是害怕，而是憐憫。婦女排著長長的隊伍等候取水，衣衫襤褸的男人在垃圾堆中找尋可用之物，這些景象令人深感悲傷。當我勇敢地走進貧民區時，腦海中不斷出現的都是這令人難以忍受的貧窮。我想，所謂令人難以忍受的貧窮便是，在這裡的人都如同被人踩在腳下的碎石一般。

人人皆知奈洛比是一個充滿暴力的地方。當我在那裡服務的期間，一位美國友人寄給我一篇從《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摘錄的文章，它的標題使用了國外移民對這個首都的外號「Nairobi」（編註：robbery 有搶劫之意）。每一天都有暴力事件發生，例如：武力劫奪公車、持刀行兇、謀殺。更令人困擾的便是「暴民公義」，即是肯亞人自己掌控法律，而法律制度也缺少信任度，這些都不足為奇。法院和法官惡名昭彰，不可信賴，警察也是滿口謊言。因此，人民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正義及執行法律了。

如此下來，其後果真令人驚訝。一個人只要大喊一聲「有賊」，就能引來一大羣人在擁擠的街道上追捕可疑的人，待捉到他後，就是一頓毒打，常常把對方打死才住手。最近一位耶穌會士懇求羣眾想想耶穌寬恕人的教導，如此才阻止某個人被他們殺害。奈洛比《國家日報》經常刊登橫臥在市中心或偏遠



鄉鎮的屍體圖片，以及被圍觀的眾人所嘲笑、吊死在塵土飛揚的市鎮廣場中央的小偷屍體真實照片。



耶穌會會院附近的一個貧民區卡王維爾（Kawangware），有個天主教堂區，即是一個較小的教堂和一座較有規模的大教堂。這座稱為聖心堂的教堂由一位活力充沛的愛爾蘭傳教士諾厄爾神父（Father Noel）及方濟會修女共同管理。這羣方濟會修女由一位身高五英尺，面帶燦爛笑容又令人敬畏三分，但是卻缺了兩顆門牙的伯爾納多修女（Sister Bernadette）領導。在聖心堂周邊住了許多難民，因此，我常常要與伯爾納多修女談話。難民告訴我，這位修女很可怕，其實，這意思是修女要求他們對她說實話。

有一天，伯爾納多修女在電話中告訴我發生在聖心堂的一件事：一名來自卡王維爾的男子偷了小教堂百葉窗上的幾條玻璃。修女說：「他真傻，他偷了教堂的東西。」真傻，他在黃昏時來偷教堂的東西，許多人在夕陽餘暉中親眼目睹他的偷竊行為。鄰居追趕他，把他推下山谷。一大夥人捉住這名小偷，殺了他，並用大刀砍下他的手臂和腿，把他留在血泊中，玻璃碎片則散布在他殘缺不全的屍體四周。

當聖心堂的主任神父在主日彌撒講道時，這殺人消息傳來。神父要求會眾說出兇手是誰，但是無人回答他的問題，當伯爾納多修女提到這事件時，甚至會眾中還有人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於是諾厄爾神父說：「好，我停止教堂中的彌撒，我將到

死者家中繼續做完這台彌撒。誰想要去的，可以跟我去。」講完後，他走出教堂。一半會眾跟他去，另一半則沒有。

聽完這故事後，當難民再敘述他們的困難時，我不會感到驚訝，他們的遭遇不外乎是被警察打和關進監獄，在來我們辦公室途中，物品被偷，看見自己的房屋被肯亞鄰居縱火燒毀。雖然如此，我還是不覺得害怕。此外，在貧民區裡，我被視為是一位「司鐸」，我的鄰居都認識我，我覺得我知道的史瓦希里語足以讓我脫離任何困境。

然而，有人勸告我晚上要小心，特別提防搶劫車輛者。晚上搶劫車輛者的方法是這樣的：一個人俯臥在街上，汽車駕駛很自然地警覺到並停車幫助這人。當你下車時，兩名手持來福槍的歹徒由草叢中一躍而出，搶你的車，或開槍殺你。所以，當看見有人躺在路上時，該怎麼辦呢？就繞過去吧！或者，誠如一位面無表情的朋友告訴我的，從他身上開過去。我被告誡，晚上千萬不可以讓路人搭便車。某一個黑夜，在我前往凱倫鎮的路上，我看見有人對我揮旗要我停車，但是，我不顧那痛苦的呼喊聲，一直向前駛過去，把他留給善心的撒瑪黎雅人吧！

我漸漸意識到，暴力事件完全是一種任意的行為，不限於窮困的肯亞人或難民。



當柯瑞根完成語文課程，由坦尚尼亞回到肯亞時，我們一起與一羣年輕志工並肩工作，我對他們的工作及奉獻精神印象深刻。





凱文與格瑞是來自美國瑪利諾會（Maryknoll）的「平信徒傳教士」，他們住在奈洛比西面的貧窮鄉間。凱文在一個靠近工業區、範圍廣大的貧民區中，一所由愛爾蘭修女開辦的學校教書。人人都知道他是「凱文老師」，他的學生和同事都這樣稱呼他，就如同難民稱呼我「吉姆修士」一樣。

格瑞與一個小型和平行動組織一起工作。在蘇丹發生戰爭期間，這些和平工作者將敵對雙方聚集在設於奈洛比的狹小總部裡。格瑞的足跡遍及全國，尤其是肯亞西部發生衝突的地區，在這裡，魯歐族（Luo）和巴枯蘇族（Bakusu）被政府軍以武力強制驅離自己的家園。格瑞協助雙方受害者舉行會談，促成彼此的和好。和平工作者只有六人，卻很具有影響力。

愛爾蘭志工吉米·卡羅在奈洛比靠近耶穌會堂區的一處廣大貧民區工作，他曾經在位於世界各地的托爾泰（Trócaire）愛爾蘭志工機構中工作多年，身為一名木匠，他便在堂區的木工場裡訓練當地的肯亞人。

瑪利·羅杜絲是一名年輕的美國女子，與聖母修女會的成員一起住在奈洛比北部的難民區內，那裡的居民大多數是索馬利亞難民。她在瑪他山谷中一個名叫「瑪利亞之家」的女性自助團體裡工作。

瑪他山谷可能是奈洛比城市裡最貧窮的地區，雖然，長久以來這是在我的朋友之間用來開玩笑的主題。我們彼此比賽，看誰在奈洛比最貧窮的地區工作。在我穿過那堆滿垃圾及遍地糞便的道路，去拜訪凱文在馬克（Mukuru）任教的學校之後，我承認他贏得了比賽。

和耶穌會弟兄柯瑞根及活力充沛的聖母升天會馬克修士一起工作，我找到了一個可以信靠的海外工作團隊，我們一起歡笑，分享故事，藉此，我不再感到寂寞，不再覺得離家如此遙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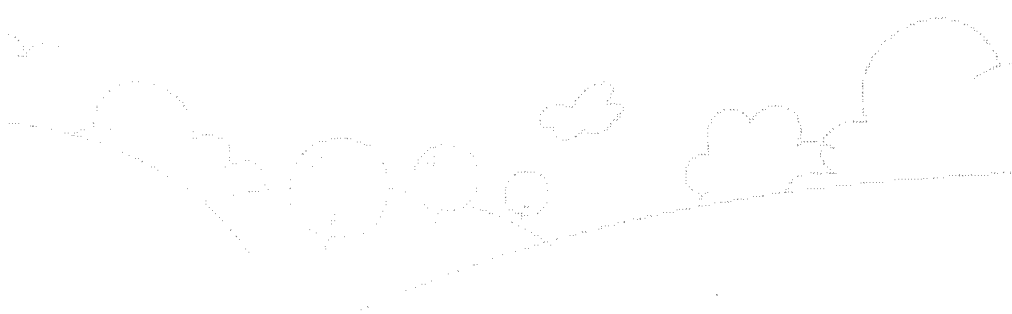
瑪利·羅杜絲曾在坦尚尼亞瑪利諾會的語言學校學習史瓦希里語，當她在語言學校時，認識了一位人際關係極佳的愛爾蘭人奈歐，雖然我對他認識不多，但是卻非常景仰他。奈歐在一個馬賽神父牧養的小堂區所經營、稱為「灌木」的地方工作，我曾在一些社交場合中看過他，也常在城裡遇到他。

有一天，我在城裡一家銀行遇到他，我為耶穌會難民中心存一筆錢，他則是為他們的福傳工作提款。我們寒暄幾句後，他便對我揮揮手，騎上機車飛馳而去。

幾天後，我得知奈歐遭人殺害。在奈洛比最古老的天主教堂所舉行的追悼儀式，座無虛席，瑪利·羅杜絲在儀式上哀傷的說：「我沒有什麼可說的。」

那天，奈歐辦完公事，就騎著機車回教堂。當他快到教堂時，看見遠處的牆角邊有幾個當地人和主任神父說話。他們之間似乎有些爭執。當奈歐靠近時，一名在附近遊蕩的肯亞人拔槍射殺了他。這名搶匪逃跑了，奈歐則在幾分鐘之後死在神父的懷抱裡，年僅二十五歲而已。

這事件之後，我有點害怕，也更加注意自身的安全了。





## 「我們真高興你沒有死！」

客人來訪時，主人獲得治癒。

——史瓦希里諺語

由於申請創業經費的活動不斷增加，烏塔和我很快察覺我們需要一個較大的地方。我們希望在附近租一棟小房子，一個能讓拜訪我們的難民覺得舒適的地方，同時也能吸引顧客注意難民的生產物品。與許多房屋仲介商討之後，我們在拉維頓（Lavington），這漂亮的鄰近地區找到我們認為理想的地方，那是一棟有拼花地板、紅屋頂、大又採光良好的陽台的大房子。寬敞的幾間正房可放置展示櫃、桌子，當作展覽室用。我們想像著難民在陽台上聚會，以及訪客在庭院裡走來走去的情形。

在尋找新地方、開車進出貧民區、與許多難民會談的過程之中，我覺得自己很疲累。難民開始告訴我，我看起來很「糟糕」，他們說：「修士，你很累嗎？」

有一天早晨，當我醒來時喉嚨很痛。耶穌會的醫生弟兄認為這可能是一種病毒，這是合理的判斷，因為難民總是得到這種病，無疑的，我一定是在工作時被傳染上的。

難民的生活條件使他們持續處於健康不佳的狀況中。首先，許多難民是愛滋病毒帶原者，他們與愛滋病患者同住或是嫁給帶有愛滋病毒的人。《國家日報》每天都刊登許多長期與病魔

搏鬥後而死亡的青年男女照片和他們的訃聞。這種疾病幾乎出現在每一個肯亞人的生活中，他們將它解讀為「沒有受到保護的身體」<sup>10</sup>。凱文告訴我，他的年輕學生堅決主張所謂 AIDS 是已經進入世界的危險東西。

然而，無論這種疾病的流行程度如何，在肯亞公開討論的情形遠不如鄰國的烏干達。造成不願意公開討論的理由有很多。首先，這裡不像美國，很少能自由地談論這種疾病，肯亞人認為這類資訊是極為私人性的。另一個主要原因便是恐懼。估計當時在肯亞一些地區，約有百分之三十的國民是愛滋病毒的帶原者，雖然這數據很難證實（肯亞政府害怕影響觀光事業，而不願意公開提及愛滋病的實際情況）。因而，處理這種疾病的方法之一便是否認它的存在；愈少提醒肯亞人民，他們就愈不在乎，最後，愛滋病常常被認為是一種「骯髒」的疾病，類似淋病或梅毒，或者，更糟的是，有時在農村及都市貧民區，愛滋病被視為是來自靈界的詛咒。基督徒、穆斯林及信奉傳統宗教的人的確這樣認為。

除了削弱人體力的愛滋病毒之外，貧民區的衛生條件，例如沒有自來水、也常常沒有清潔的用水、污濁發臭的垃圾坑和糞便等，這一切都是細菌滋生的溫床。缺少清潔的用水，便意味著腹瀉在奈洛比是極為危險的疾病，尤其是兒童。貧民區中

---

10. 史瓦希里語的「ukimwi」就是愛滋病，也是 ukosefu kinga mwili 的縮寫，意思是「沒有受到保護的身體」。



常見的疾病有痢疾、肺結核、流行性感冒、瘧疾、腮腺炎和肝炎。我來到這裡不久，在肯亞東部便有兩百人死於腦膜炎，這是一種只要接種疫苗就可以預防的疾病。當我讀了這種流行病的報告時，我想起自己接種過的腦膜炎預防疫苗只花了幾塊錢而已。事實上，我沒有花錢，是由醫療保險給付的。這似乎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在美國伸手可得到的疫苗，在這急需要它的地方卻無法獲得，而只要有它，就可以挽救數百人的性命。

在任何難民居住的區域內，很少見到廁所。貧民區的房屋都沒有暖氣設備，雨季裡，當氣溫下降時，他們很難得到保暖的衣服。窮困使得難民無法為自己和子女買一些促進健康的食物。他們的生活充滿了壓力，例如：擔憂未來、回憶過去、充滿了勞累的生活——背著孩子走遙遠的路去打水、去市場以及到救濟站尋求協助。難民常常遭到肯亞警察的鞭打，被任性的房東鎖在屋外，被趕下公車，被鄰居騷擾。看到這些人經常處在受苦和病痛的狀況裡，真是令人心碎。不斷在耳邊響起的一句話總是：「修士，我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因此，我盡可能不去注意自己身體上的小小不適。

但是，這樣忽略自己的身體狀況，幾天之後，我的喉嚨愈來愈痛，甚至很難工作。柯瑞根開車送我到奈洛比醫院，這所被稱為當地最好的醫院，實在徒有虛名。（當地有一則笑話是：東非最好的醫院是哪一家？答案是：英國航空。）

柯瑞根和我在一間門口掛著「急診室」的狹小候診室裡等了一小時。日後，我在理查·普雷斯頓（Richard Preston）所寫令人毛骨悚然的醫學驚悚小說《伊波拉浩劫》（*The Hot Zone*）中

讀到，1980 年第一名伊波拉病患便是送到這小房間裡，並死在這裡（就是我們現在坐的位置）。作者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境：

小房間裡放了一張一張有墊子的長板凳。清澈明亮的古老東非陽光透過一排窗戶，照在桌上布滿灰塵的幾堆雜誌上，在長方形灰色鵝卵石地面的中央有一條水溝。房間裡瀰漫煙燻木頭和汗水的氣味，屋子裡擠滿了一些睡眠惺忪的人，這些非洲人和歐洲人肩並肩的坐著。

我們與幾名咳嗽和擤鼻涕的肯亞病人同坐在一張長板凳上，一名男士向我們描述他在馬賽馬拉國家公園保護區的墜機經過。由於前額被割傷，血流不停，他勇敢地以他妻子的手帕來止血。「倒楣，倒楣！」他不斷地喃喃自語，好似在念咒一般。

幾分鐘後，一位肯亞醫師領我進入繁忙急診室內的一個小房間裡，我爬上一張搖搖晃晃的木頭桌子上，又等一會兒，他與一名稱為「姊妹」的護士一起進來（乍聽之下，我還以為她是修女）。醫生拉上有污點的棉布簾子，當我向他說明我的病情時。

他看著我說：「啊，我要給你打一針，假如情況惡化，你再回來找我。」

我扮了一個鬼臉。根據最樂觀的疾病防制勸導，在東非接受任何注射，都是冒著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但是我的選擇不多。無論如何，打針是無濟於事的；我的喉嚨愈來愈痛，體溫不斷上升。第二天，我回到診所，一位印度籍的醫生察看我的喉嚨



說：「啊，我開給你一些藥丸，」他一面說，一面伸手到牆上的小櫃子裡取藥。我看著那瓶紅黴素。他說：「你服用這瓶藥，看看情況如何。假如病情惡化，你再回來找我。」（我懷疑最後這句話是否是醫療機構教給奈洛比醫生的說詞。）

在非洲生病是我最大的恐懼。肯亞的文化，如語言、食物、新風俗習慣等都不會讓我擔憂。簡單的生活、遠離家鄉、缺乏溝通都不會使我憂心忡忡。但是，生病卻是一件讓人憂心的事。在我來這裡之前幾個月，我和一位耶穌會朋友談到生病的事，他說：「記住，生病是海外工作經驗的一部分。」傳教士遵照當地醫生的指示，是一種具有價值的行為，也是以另一種方式完全參與你同工們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認識一些在美國大使館工作的美國人，他們逃避疾病如同逃避瘟疫一般。他們或是等到回國，或是在大使館裡找美國醫生看病。而我同意我的傳教士朋友們的觀點：一方面宣稱要過簡單的生活，另一方面卻在生病時立刻去找昂貴的西方醫生看病，這是不對的事。

但是，若要人不擔心，卻是有點困難。

第二天早晨，我感到呼吸困難，因此我去找另一位醫生。他輕蔑地說：「紅黴素？沒有效的。改吃這種藥丸吧！」是抗生素中的合成青黴素。當晚，我在劇烈的胃痛和胸部疼痛中醒來，並且嘔吐。第二天早晨我們開車去醫院時，柯瑞根面帶恐懼地看著我說：「我想，你心臟有問題。」

第四位醫生要我爬上檢查台。

「嗯！」他說：「你喉嚨很紅。假如它愈來愈腫，我必須把它割掉。」「割掉？」我問道。

「是啊，否則你就不能呼吸呀！」他平靜地說。

雖然這樣的告知讓我覺得非常困惑，但是我深信我不要我的喉嚨被割掉。因此，我不管是不是合乎本地化的問題了，我問我的院長神父是否認識任何一位美國醫生。他讓我與設在奈洛比和平工作團的主任醫師聯絡。和平工作團辦公室靠近青年旅館，面對一座花園。一名面頰紅潤的年輕美國人坐在候診室裡，我猜他是和平工作團的志工。在祕書桌上有一個裝滿保險套的大玻璃缸。

我曾見過這位年輕的醫生。

「說啊——你得了鏈球菌性喉炎。」他一面說一面丟掉鴨舌板，「你也可能有單核球增加的問題。你需要做檢驗。這是我讓每一名病人去做檢查的地方。」他開了一張盤尼西林的處方給我。

這是我在一週內要打的第二針。當我按照他給我的地址開車前往時，心中不免擔憂針頭是否有消毒。這名肯亞護士察覺我的不安，便說：「我知道你們美國人非常注意針頭。所以，我在你面前打開，你看……」她在我面前拆開新針盒的塑膠包裝。她並沒有安慰我，反而嚇我說：我是否在醫院看過他們拆開清潔的針頭？我不記得了。

幾天後，我的喉嚨痛好轉了，但是在3月15日我接到檢驗報告，我得的是單核細胞增多的病毒感染或在東非所稱的「淋巴腺熱」。和平工作團的醫生說，除了臥床休息外就沒有其他方法了。

我在床上躺了兩個月。在我們小小的會院裡沒有電視。我





讀一些舊書，也讀手邊有的每種讀物。我知道有許多難民和肯亞人的病情比我更嚴重。我也知道我終究會痊癒的。然而，我還是痛苦萬分。

法國聖衣會（The French Carmelite）修女聖女小德蘭（St. Thérèse of Lisieux）的自傳《聖女小德蘭回憶錄》（*The Story of a Soul*），是我在養病時閱讀的書，她在書中提到她對痛苦的價值的看法。她相信，只要在痛苦中全心信靠天主，我們就能愈來愈堅強和有智慧：

一個要接受手術的孩子會大聲喊叫，會說醫療過程比生病還痛苦；但是，幾天後，當他痊癒了，他很高興自己能跑、能玩耍。靈魂也是如此；他們很快明白，有時少許的痛苦比糖果還可口。

很好的觀點，但是很難做得到，我需要將它內化。

毫無疑問的，這是在奈洛比的低潮時期。雖然我喜歡我的工作，但是我不確定我是否還能有這麼多的貢獻。我必須承認，即使我在這裡已經六個月了，我仍然非常想念家鄉的親人和朋友，我知道，我身在異地，為我父母親是很難接受的。他們曾經很難過地說，要與我分開兩年，實在是一件大事。在我來奈洛比之前，我對一位曾在海外工作多年的耶穌會神父表達我的憂慮，就是我的父母親可能會極度想念我。他笑著說：「不要擔心，天主會特別照顧傳教士的父母親。」這句話聽起來頗有道理。總之，我懂了，當我努力要追隨「天主的旨意」，並

做些我認為不重要的犧牲時，這是天主至少能做的事呀！

就在同一星期，我得知我父親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即是所謂的「小中風」，因而使他暫時癱瘓。我感到極度的無助。打電話給家人對他們和我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當我掛上電話後，我常常泣不成聲。透過夾雜連續不斷爆裂聲的越洋電話，我可以聽見父親含糊不清的說話，以及母親為減少我的擔憂而堅強的對話。我開始對天主生氣，並在祈禱中大大發洩我的怒氣。為何天主不如我期望和我祈求的那樣，去照顧我的家人呢？

這時，在祈禱中常常出現的圖像便是《創世紀》中被丟在枯井裡的若瑟。那正是我的感覺：坐在枯井底下，對未來充滿茫然和懷疑。

我想，或許回家是最好的選擇。我懷疑，假如我在一羣有病的人中工作，我自己又如何能完全恢復呢？或許我的父母親比這些難民更需要我，或許我的首要責任是照顧他們吧？

我的耶穌會上司向我提出可以考慮選擇回國，我甚至想回家小住，或許住幾個月吧！但是，我很確定，假如我這樣離開肯亞，我便沒有回來的可能了。最後，在面對離開這裡的誘惑下，我覺得對難民有虧欠而決定留下。雖然我覺得我對他們的幫助有限，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似乎很依靠我，並且信任我。而我也發現，在我休養期間，已漸漸喜愛上這些難民，我每天都想著他們。

對我而言，很清楚的一點是，即使在這時候，這種經驗也幫助我更珍惜與難民相處的經驗。將我這小小病痛與他們得到的嚴重疾病相比，似乎是很可笑的。淋巴腺熱與愛滋病、霍亂



或傷寒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想念平安生活在故鄉的雙親，能與懷念死在難民營中的孩子，或悼念一位永別的親戚相等嗎？我兩年遠離家園是否就是永遠離開故鄉呢？然而，我發現自己小小的掙扎使得我更想要幫助難民。奇怪的是——或許也不是很奇怪，我覺得自己對他們的憐愛突然增加，我不能離開，所以我留下不走了。



幸運的是，有兩位親切年長的瑪利諾會修女住在街對面，這對我的心靈和身體都有益處。瑪利諾修女會由天性開朗的瑪利·羅傑絲（Mary Rogers）創立，其成員各個都具有冒險精神，羅傑絲女士畢業於史密斯學院，二十世紀初曾在中國工作。樂培霓（Penny Lernous）所寫有關瑪利諾修女們的故事《心火熊熊——瑪利諾修女的故事》（*Hearts on Fire*）的封面，有一張引人注目的羅傑絲姆姆的相片。相片中的人物是一位身材高大、穿著黑色寬鬆會服、戴著長頭巾的女士。她的嘴巴張開；相機清晰地捕捉到她開懷的笑容。一隻略微模糊的手擺出掃地的姿勢，或許對一名看不見的朋友招手；另一隻手握著一本聖經。這是一張令人愉悅的照片，讓人立刻捕捉到這個修會慷慨助人的精神。

克萊兒·墨菲（Claire Murphy）和愛蓮·凱利（Eileen Kelly）兩位修女管理一個接待在肯亞、南蘇丹和北坦尚尼亞工作的瑪利諾會修女的招待所，她們把它稱為羅傑絲別墅（也有許多瑪利諾會神父在東非工作）。這兩位修女已經在坦尚尼亞工作了幾十年，她們自願承擔起照顧柯瑞根和我的責任。我們兩人常

受邀到她們那裡參加彌撒，一起享受一頓自己烹飪的晚餐，並聽取一些母親般的勸導。當我因淋巴腺熱被隔離養病時，曾經在非洲得過更嚴重疾病的愛蓮修女，她是位有經驗的護士，常來探望我，並且給我極大的鼓勵說：「啊，你會好的。」

另外常來探望我的客人是來自一個輕鬆愉快的團體，她們是住在一百公尺外的耶穌小姊妹會的修女。這個團體在二十世紀初由一位在北非沙漠度隱居生活的法國人查理·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所創立。小姊妹會（也有小兄弟會）的靈修是以天主教傳統中耶穌「隱居生活」為核心，即是從耶穌十二歲在聖殿講道後到三十歲公開傳道時，這一段在福音書中沒有記載的時期的生活。在那十多年裡，基本上，耶穌過的生活與第一世紀巴勒斯坦地區一般民眾的生活相同，與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跟父親學習木工和交易的方法。耶穌隱居的生活真是再平凡不過了。因此，小兄弟和小姊妹會的成員都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與一般平民百姓一樣從事普通的行業，例如：家庭女傭、工廠工人、裁縫師傅、守門警衛。

我第一次接觸耶穌小姊妹會的修女，是因為一位來訪的衣索比亞籍耶穌會士，要我帶一本阿姆哈拉語（衣索比亞的官方語言）的聖經給他們的衣索比亞修女。

我按了門鈴後，一位非洲籍的修女打開了高高的鐵門。如同其他的修女一樣，她穿著一條藍色的裙子，淺灰藍色的襯衫，頭上繫著簡單的頭巾。她熱情洋溢地和我——這名陌生人——打招呼。

「啊，我們很高興你來了！」



當我隨著她走進去時，看見她們那棟座落在花叢中白綠相間的矮小平房。淡藍色的蝴蝶花，一叢叢的品紅花和白色九重葛，鮮綠色的木槿與鮮紅花朵，以及野西波爾麻，高高的諾福克松矗立一旁，芳香撲鼻的赤素蓉花和梔子花叢，橙色百合在豔陽下頻頻點頭，所有的鮮花樹木都得到修女細心的照顧。

當天，她們團體的九位修女都在家。她們的院長是一位笑容滿面的法國修女，此外，有一位馬爾他修女、一位奈及利亞修女、兩位坦尚尼亞修女、兩位肯亞修女和兩位衣索比亞修女。九位修女衝到門口歡迎我。當我把聖經遞給兩位衣索比亞修女時，她們為我的善行大大讚美我（即是帶著聖經走了兩條街而已）。

艾卡拉瑪利安修女（Sister Askalemariam，意思是「瑪利亞的禮物」）是兩位衣索比亞修女中的一位，她帶我由聖堂開始參觀她們的會院，聖堂是一間有鐵皮屋頂的小屋，位於會院的後面。聖堂屋頂被一株高大的樹木遮蓋著，果實由高處落下，打在鐵皮屋頂上有如槍彈一般。聖堂內的祭台四周放置著矮矮的松木板凳，一塊繡花布蓋在樸實的祭台上。祭台前放了一尊沒有上釉彩的陶器嬰孩耶穌像。艾卡拉瑪利安修女向祭台深深一鞠躬。

她們請求我小坐一會兒，並且很開心地為我擺上茶和餅乾。全體修女都放下工作，一起坐下來聊天。這種景象使我想起《路加福音》中的記載，當耶穌來到祂的朋友瑪爾大和瑪利亞的家裡時，瑪爾大忙著準備餐點，而她的妹妹瑪利亞則輕鬆的與耶穌談話。瑪爾大向耶穌抱怨她的妹妹，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是，耶穌卻回答說：「瑪爾大，瑪爾大，妳擔憂太多的事了，

其實，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部分。」小姊妹會的修女知道如何像瑪爾大一樣勤奮工作，也知道如何像瑪利亞一樣在耶穌面前放鬆自己。

她們的喜樂具有感染力。任何事都能使小姊妹會的修女放聲大笑，例如相互逗趣——拿她們的團體、她們的學習、她們的院長開玩笑。當她們取笑莫妮佳修女的法式烹調時（東非修女卻認為那是人間美食），她的笑聲大過其他的人。而當我敘述我在難民中的工作時，她們則全神貫注地聆聽。然後，莫妮佳修女高聲說：「修士，你要**常來**看我們喔！」

是的，我常常去。我必須承認的是，她們親手烹煮的食物是吸引我的主要因素。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在她們團體中所體驗到的深度喜悅。儉樸的生活、沒有電話、沒有電、用炭爐或煤油爐煮飯，她們如同其他奈洛比的居民一樣，只有少量的用水，她們似乎並不介意，而且真的很喜歡這樣的生活。

幾個月後，兩位來自美國的朋友到這裡訪問。我們開著我的吉普車經過小姊妹會的修院。她們剛參加了主日彌撒，由教堂回來，都聚集在家門外。她們向我揮手，要我停車。當我把車停妥後，她們如同蜜蜂圍繞花朵一般，把我們團團圍住。

「修士，修士，你的朋友是誰呀？」她們大聲喊著問道。

因為在東非遇見別人時總是握手，所以，就有十幾隻小手從我這小小吉普車的車窗伸進來等著要握手。

「哈囉！哈囉！我們是耶穌小姊妹會的修女。」她們在一陣笑聲中說道。

我這兩位極為驚訝的朋友，面對九位身穿藍色會服，發出



咯咯笑聲的修女和一堆揮動的手，當我們開車離去時，其中一位說：「啊，我的天呀！」

我和這些修女成了好朋友，因此，當艾卡拉瑪利安修女和瑪利安修女來探望我時，我並不感到驚奇。基督信仰傳統中的慈善工作之一就是探望病人，在東非是一件極受重視的行為。在美國，我們可能會讓一位生病的朋友獨自休養，或者打電話問候他，但是，在這裡，如果不去探望一位生病的朋友及偶爾幫助他做些家務，是被認為極不禮貌的事。此外，假如沒有電話，你又如何打電話問候呢？

瑪利安修女和艾卡拉瑪利安修女來陪我，她們一面喝著飲料，一面告訴我有關莫妮佳修女的趣事以及其他修女的事，「你什麼時候再來和我們一起吃飯呢？」

難民也時常來探望我。有時候，我覺得很累，寧願無人打擾、好好休息。然而對他們的探訪，我心存感謝，至於難民如何找到我住的地方，我並不感到訝異。我知道難民服務中心不會公布我的地址。（過去，曾有一些難民找到難民服務中心工作人員住的地方，因而日夜甚至週末都到他們家裡去。）我的難民朋友知道我住的地方，他們來探望我，和我聊天，並且按照東非的習慣，清掃我的住處。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午休，兩名烏干達難民經過我的住處。

「吉姆修士！吉姆修士！」他們敲打我臥室的窗戶喊道，我頭昏眼花，迷迷糊糊地由床上跳起來。

「起來！我們在這裡。」

接下來的時間，我坐在廚房的凳子上，聽他們一邊談論其

他難民的事，一邊掃地並清洗我早餐用過的杯盤等，而我勉強自己不要打瞌睡。

其他時間我則臥床休息和看書。漸漸的，我覺得自己有體力可以在房子裡走動，或走一條街到耶穌會會院去，偶爾也開車到鎮上去拿藥。

我生病後第一天開吉普車到當地的藥房去買維他命時，路邊有兩名婦女向我揮手，喊道：「修士！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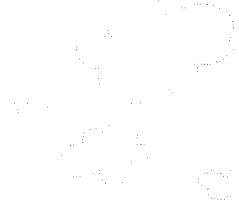
我完全不認識她們，但是，這例子使我已經習慣全奈洛比城的難民都認識我。記得，當我初到這裡時，路易絲修女曾說過：「在奈洛比有十萬難民，很快的，他們都會認識你的。」

我把車靠邊停下，搖下車窗。這兩名盧安達婦女把頭探入車內，滿臉笑容。

其中一位大聲說：「啊！修士，你復原了！我們真高興你沒有死！」







## 雙手<sup>11</sup>

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樂，沙漠必要欣喜，如花盛開，盛開得有如百合，高興得歡樂歌唱。

——《依撒意亞》三十五 1-2

我返回工作崗位後，烏塔和我又開始積極尋找適合的房屋。這件事比我們兩人預期的困難得多。假如我們在安全的住宅區找到房屋，左右鄰居便不准許我們在這裡開「商店」（就像幾個月前我們曾經在拉維頓看到很喜歡的房子）。假如我們聽說有一棟房屋可以用來當成商店，卻發現它的交通極不方便，使觀光客沒有意願前來。幾個月以來，精力充沛的烏塔開車帶著無精打采的我在城裡轉來轉去、四處找房子。每次已經接近簽約的時候，總會有複雜的事情出現。

在尋找適合房屋的同時，我們很幸運地找到了出售我們商品的地方，就是設在奈洛比的美國大使館。一位我在某次餐會上遇見的女士建議我去找「社區聯絡官」雷妮（Lynn），她的職責便是讓使館人員和當地居民建立關係。雷妮告訴我，每隔幾週她便在大使館內舉辦一次小型園遊會，展示當地的手工藝品。

---

11. 史瓦希里語的「mikono」，有「雙手」之意。



經過幾個月的尋找，我們很高興在耶穌會教堂的土地上找到一棟小平房。烏塔和我把它命名為「雙手中心」，它日後成為難民聚集的地方。



她問我是否有意願也辦一次？我當然願意呀！

烏塔和我與難民聯絡，讓他們知道我們想要收集的商品。我們把重點放在來到我們辦公室的觀光客最喜歡的東西上，像是：有粗線條幾何圖形的盧安達西波爾麻籃子、填充動物玩偶、用黑檀木雕刻的動物、衣索比亞的畫作、繡花圓領衫、盧安達玻璃燈罩、木製珠寶盒、以乾燥香蕉葉拼成圖案的便條紙。慕卡瓦滋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盧安達女士，她曾在比利時得到護理碩士，現在以做珠子項鍊謀生。為要準備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園遊會，我們買了五十種手工藝品。珍是一名年輕的烏干達婦女，她將一條條的無花果樹皮用力捶打，直到樹皮表面變粗糙並呈現紅色，然後用樹皮縫製成枕頭套和手提包。另一名烏干達婦女瑪麗，在奈洛比市場買到廉價的皮製包後，再用粉蠟筆亮麗的色彩畫上迴紋圖案、動物、花朵以及人的臉孔。園遊會的前一週，我們的辦公室好像一個小型倉庫，圓領衫和洋裝高高的堆在書架上，雕刻的動物在我桌子後面一字排開，一疊疊的籃子塞在搖搖晃晃、生鏽的櫃子裡。

園遊會當天早晨，烏塔和我把所有物品塞進她的車子裡，然後出發前往目的地。烏塔和我都認為，假如她決定要擴展事業，那麼這次與美國人的交易是極有價值的。我們經過大使館的高大鐵門後，兩名身材高大的海軍陸戰隊士兵前來檢查我們的車子，首先，打開引擎蓋仔細檢查，然後，將一個長型的鏡子伸進車子底部。

「他們在檢查我們是否藏了炸彈，」烏塔輕聲的說。由於美軍駐防在索馬利亞，因此，在奈洛比的美國人受到許多恐嚇。

我們所有的物品也要接受使館的安全檢查；他們用一個會發出嗡嗡聲和卡搭聲的小型金屬探測器，檢查每一個布娃娃、雕刻的動物、每一條項鍊和每一個燈罩，如果發出上述兩種聲音，便表示情況不妙了。

雷妮在樓上一間大會議室裡準備了兩張長桌子。經過一小時的布置，這間會議室看起來真像商店。中午時分，來了許多美國人。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如此多的白人面孔了，我的第一個思想就是，我真的那麼白嗎？

烏塔和我都希望這些美國人至少能買一點我們的手工藝品；按照雷妮的看法，還有幾週便是復活節，現在是銷售商品的好時機。

商品一件一件從桌上消失了。我們帶來了一條由三名烏干達婦女共同完成的拼布被子。這三人小組又叫「阿嘎里·阿塢姆團體」，由一位開朗又勤勞的海利瑪女士所領導，她們曾經拜訪在奈洛比的布店，請求店主將剩餘的布塊賣給她們。她們利用這些廉價的布塊縫製成美麗耀眼的拼布被，這種手工拼布被在美國的售價值數百元美金。

第一名進來的美國婦女朝著手工拼布被子走去，並且問我售價是多少。烏塔瞄我一眼。對於難民手工藝品的價格，我們兩人的看法不同，我想要把售價定得很低。烏塔基於她在印度的經驗，要求把售價定高一些。她的解釋是，假如價格太低，別人會認為你們的手工藝品都是廉價貨品。我深呼吸一下，接受烏塔的建議：「單人的五十元，雙人的一百元。」

「我都要。」她說，並且買了一堆如山一般的被子。烏塔



愉快地笑著，我們的助理高蒂睜著大眼睛望著我。

我們賣了所有的籃子、所有的雕刻動物。美國人買了所有的繡花圓領衫、首飾盒、雕刻的燈台、草編的燈罩。一名烏干達難民莎拉製作了六打白色棉質餐巾，她在白色棉布上繡著綠色大象、紅色獅子、紫色太陽鳥和黑白條紋的斑馬。園遊會開始後的十五分鐘，這些餐巾就銷售一空，我們還接下六打的訂單。珍的樹皮圖案和瑪麗的皮製包也是搶手貨。唯一沒有賣出的只是幾張卡片和幾條奇形怪狀的項鍊。

由於我們不需要支付管理費，因此我們的售價是別人無法抗衡的，精明的美國大使館人員都知道。我們的商品比奈洛比市場上的商品多樣化，在那裡看到的手工藝品全都是肯亞的產品。與那些商店不同的是，我們出售的手工藝品來自東非各地，包括衣索比亞、盧安達、莫三比克、烏干達、蘇丹以及索馬利亞。我們這些新的美國顧客和我們一樣都非常興奮。難民的欣喜更不在話下。其中一位難民滿懷希望地說：「我們應該每天來美國大使館報到。」這一切都讓我們相信，開一家店，會很有商機的。



一位耶穌會士若望·顧倪（John Guiney）在附近貧民區的康格米（Kangemi）區負責管理一個堂區，他曾提到，距離堂區僅僅幾公尺之處有一間屬於教堂的空屋。我記得曾經看過這地方，那是一間很好的房子，但是，我擔心這房子的地點。康格米是一個暴力事件頻傳的地方，搶劫和謀殺在奈洛比是遠近馳名的。

烏塔和我不顧這一切，決定去看一看這房子。

康格米位於奈洛比的西部，順著路到納庫魯（Nakuru）。在那裡，城市與農村的窮人混雜在一起，構成奇怪的景觀：鐵皮屋頂的小木屋、破舊且沾滿泥巴的水泥建築；一小塊一小塊的耕地<sup>12</sup>、有著玉米和牧草的小農莊。十年前，耶穌會士接管了一個當地的小教堂，它是為這小村莊所建立的，與鄰近的大教堂關係密切。而這個小堂區卻一點點地成長發展起來了。

在康格米工作的耶穌會士看見堂區的成長，根據解放神學的理論，他們領悟到，天主不僅藉著神職人員，同樣也藉著平信徒在教會內工作。他們將堂區分為各個「小型基督徒團體」，而這些小團體是由鄰近的家庭組成的。以往，一位堂區的主任神父常常獨自決定教堂的事務，然而，在康格米的天主教徒幾乎參與堂區每一件事務的籌畫。

堂區的信友在短短三年裡，在一塊能俯看廣大康格米山谷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紅磚教堂，按照傳統，他們以耶穌的養父：聖若瑟工人（St. Joseph the Workers），為這座教堂命名。這名字也是向所有為建造這座教堂而勞心勞力的人致敬。

教堂寬大的水泥地面漆上深紅色氧化鐵的油漆，與鄉間許多公共建築相互輝映。灰色的花崗岩採自當地的一處露天礦場。巨大的十字架和烏黑發亮的耶穌雕像豎立在教堂前方，十字架

---

12. shamba 是指一小塊一小塊拼組而成的耕地。shamba 位在農家後面或自給自足的農場後面，可以小到只有幾平方英尺。有些奈洛比居民說到他們在鄉村的家，就是指他們的耕地。



側面是以非洲風格呈現的瑪利亞和若瑟的聖像。教堂牆壁上環繞著代表十五處苦路的簡單木條，上面的耶穌畫像也都是以非洲風格呈現。建築本身是由一位比利時的耶穌會士設計，但是當顧倪神父為參觀者導覽這座教堂時，他一定提到每一塊磚、每一片瓦、每一根樑都是由教堂的信友親手製作的。

康格米教堂的信友以他們的教堂為傲。主日的感恩祭成為一個上午的活動。教堂的後門敞開，以便坐在教堂外、圓形露天劇場的數百名參觀者能看見教堂內的設計。康格米內有一個稱為聖若瑟工人的小村莊，它從小規模的教堂工程發展為木工工廠、電腦研習中心、製瓦工廠、印刷廠，最後還創辦了一所學校。這些都是由肯亞的當地人經營。一個稱為非洲之后傳教修女會（Missionary Sisters of Our Lady of Africa）的本地女修會在這堂區開設一個診所。修女們也開了一間商店，由附近的婦女經營，專門製作穿著傳統肯亞服飾的布娃娃，小巧玲瓏，可愛至極。這間店就稱為「娃娃手工藝店」。

雖然耶穌會士在康格米服務，但由於烏塔多次拜訪過這裡的難民，因此比我更了解這地區的狀況。有一天，我們坐著烏塔的車前往康格米去看那棟房子。顧倪建議我們先與修女會的院長談一談，因為之前一位曾在她們診所服務過的平信徒護士在這裡住過。

幾個月前我到康格米時，曾經遇到一位修女。我和顧倪走在泥巴小徑上，遇見一位笑容滿面的女子，她有一頭金色短髮，戴著眼鏡，一看便知道不是歐洲人就是美國人。「嗨！我是貝尼絲修女，也是白衣修女。」她爽朗地自我介紹。（譯註：White

Sister 是指白衣修女會的修女，該修會的會服為白色。）

文字把我弄糊塗了。我以為她說她是「白人修女」而不是指「白衣修女會」的修女。我尷尬的表情說明了我的混淆，貝尼絲修女大笑。

一直以來大家都稱貝尼絲修女的修會為「白衣修女」，這綽號是指她們的會服，而不是指她們的皮膚。但是，當愈來愈多的非洲女性加入她們的修會後，她們認為要小心謹慎地提醒別人有關她們修會原有的名稱：非洲之后傳教修女會。白衣神父（White Fathers）面臨相同的問題。然而他們的情況更為複雜，因為他們修會裡不僅有非洲人，也有許多不晉鐸的男士。誠如一位白衣神父向我說明的：「你可以是一位黑人修士，但是仍屬於白衣神父會的成員！」1984年起，他們便不再使用這名稱，而回到修會原有的名稱：非洲傳教會（The Missionaries of Africa）。然而，為了要幫助別人了解，一提到非洲之后傳教修女會時總會加上一句：「你知道的，就是白衣修女啊！」

修女的房子完全符合我們的需要，這是一棟瓦頂的平房，有寬敞的陽台、寬大的房間、寬闊的後院。它的租金合理，烏塔和我發現，堂區也可以使用它為未婚媽媽籌募資金，這捐款讓耶穌會難民服務的機構能獲得雙倍的祝福：先讓難民使用，再給單親媽媽使用。

簽完租賃契約後，我們立刻開始裝修的工作，我們很高興地發現許多工作可以由難民的商店來承包，例如：烏塔和我想要將前陽台改裝為難民的等待區和集合區，於是我們就請在康格米開家具店的烏干達難民若瑟，製作堅固的木頭板凳。他用



香松木為原有的起居室製作了一張大的展示台和四個高書架，這間屋子日後將作為商店。後面的臥室將改為烏塔和我的辦公室，他用松木製作了兩張小辦公桌。

另一件讓我們掛心的事便是有關我們的搬遷，難民如何能找到我們呢？他們既沒有電話也沒有信箱，而且他們經常搬家。或許我們應該發出通知，但是，要如何發呢？或許路易絲修女會告訴他們吧！

我們其實忘記了難民之間極為有效的傳播方式。在我們搬家後的三天之中，就有二十名難民出現在我們的新家前，並且已經聽說我們的商店需要手工藝品。在往後的幾週內，許多難民紛紛來到我們的新商店，帶來具有韌性的西波爾麻編織的籃子、珠子首飾、草席、拼布被子、繡花圍領衫、木頭雕刻燈台、畫作、填充動物玩偶，蠟染布料以及用西波爾麻編織的手提包。兩週內，我們的貨品都已上架，並且準備開業了。之後，每天有二、三十名難民上門，是很正常的。



我們的新居要叫什麼名字呢？我已經從行銷觀點來想它的名字了：我們需要一個吸引人又容易記得的名字，重要的是要用一個難民喜歡的名字。從一開始，我就想用耶穌會士的名字為新居命名，以示紀念。著名的耶穌會士雅魯培神父的名字便立刻浮現在腦海中，這位具有特恩的神父於1965年至1983年擔任耶穌會總會長，也是耶穌會難民服務的創始者。

「雅魯培中心如何？」我向東非耶穌會難民服務的督導麥

克·艾文斯建議。

麥克以低沈的音調告訴我一則故事。幾年前，他的前任督導也以雅魯培神父的名字為設在奈洛比的難民中心命名。這個中心發出傳單為窮困的難民提供幾百元先令的補助金。不久，就有幾百名難民來到這中心，中心因此被迫關閉。我的督導認為，如果我們的新中心也以雅魯培神父的名字命名，他們可能會認為我們這裡也是可以領取補助金的地方。所以，不能再有第二個雅魯培中心了。

那麼，以一位耶穌會的聖人名字為這新中心命名可以嗎？例如：耶穌會的會祖聖依納爵羅耀拉。我喜歡這想法，雖然我不確定身為路德派信友的烏塔感覺如何。然而，耶穌會在這裡的總會院已經稱為羅耀拉會院了，依據修會傳統，在同一地區不要有兩個相似名稱的會院，以免造成會士的混淆。在康培拉（Kampala，烏干達首都）已有一個以偉大的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為名的中心，在奈洛比也有一個以英國殉道者聖艾蒙·坎庇恩（St. Edmund Campion）為名的會院。我已經想不出耶穌會聖人的名字了。

拜若瑟製作的松木板凳之賜，每天早晨九點鐘，難民便開始聚集在陽台等候烏塔和我的到來。有一天早晨我問他們關於命名的建議。以非洲聖人的名字為這裡命名好不好？

他們表示，這是好主意。

東非最出名的聖人是烏干達的殉道者（Ugandan Martyrs），他們是十九世紀末被巴干達族（Baganda）國王卡巴卡（Kabaka）所殺害的一羣男童，約十二人左右。這羣男童是國王的侍從，



在被殺前幾個月領洗成為基督徒。許多堂區團體都以他們的名字命名。

「季齊多（Kizito）這個名字如何？」我問道，這是最小的一名男童的名字。我喜歡這名字，容易記住。

三名製作拼布被子的烏干達婦女用力地點頭，並且說：「太棒了，修士！」

就在同時，我注意到坐在另一張板凳上的蘇丹婦女繃著臉說：「修士，巴希塔（Bakhita）這個名字好不好？」這是一位最近由梵蒂岡封為聖人的蘇丹婦女，是嘉諾撒會的修女（Canossian Sisters）。

現在輪到烏干達婦女皺眉頭了。在難民的眼中，任何「非洲」聖人只對一個國家有意義。因此，我害怕造成他們彼此的分裂，就不再提非洲聖人的名字了。

我想，或許一個簡單的史瓦希里語詞可能更好，例如我在字典中查到的「希望」或「信心」這類的字。

「光（Mwangaza）這個字可以嗎？」「那是耶穌會設在奈洛比的避靜院名字。」一名同會的弟兄提醒我。

「希望？」（Tumaini），這個字已經被附近一個女修會所採用。

「智慧？」（Hekima），這是耶穌會奈洛比神學院的名字。

那麼「信心（Imani）這個字可以嗎？」現在卻是烏塔表示不贊成了。她解釋說，肯亞的執政黨經常使用這個字為公共建築物命名。我們陷入困難中，不知如何找出適當的名字，一位難民建議可以用更簡單的字，例如「雙手」這類的字。聽起來真

不錯，簡單又容易記，尤其對美國人和歐洲人來說，聽起來滿順耳的。第二天，我把這建議告訴難民。

「你為何稱這裡是『雙手』呢？」我向他們解釋說，這個商店將展示他們的手工藝品，而且大家都是手牽手一起努力呀！高蒂聽了我的說明後表示：「這真是太好了！」

但並非人人都滿意。一位烏干達難民說：「烏干達殉道聖人的名字比較好。」

我們雇用了三名員工與我們一起工作，他們分別是：一名年輕的肯亞婦人維奇妮（Virginia Gatonye）負責清潔工作，一名盧安達女性難民瑪麗（Marie Bugwiza）擔任行銷業務，一名年長的衣索比亞男子比瑞（Berehe）管理院子。

漸漸的，我們吸引了許多顧客。路過的神父、修女會進來看看，還有一些來自美國大使館的朋友也如此。最初的幾週，我們每天有二、三名顧客上門，之後，「雙手中心」的顧客便擴大到旅居國外的人士、外交官、長期居住的英國移民、富裕的肯亞人、傳教士、和平工作者，還有討價還價的美國和歐洲觀光客。

8月28日那天，身材高大的肯亞樞機主教莫里斯（Maurice Cardinal Otunga），他也是奈洛比的總主教，在院子裡主持戶外彌撒，我們的商店就正式開張了。在準備的過程中，我在《禮儀經本》（*the Sacramentary*）裡發現為「難民和流亡者」的特殊彌撒經文，而樞機主教也同意，這為當天的場合是很適當的選擇。

高蒂和她那已經知道如何縫製宗教衣物的裁縫小組為樞機主教縫製了一條綠色繡花領帶。難民以蠟染方式製作了綠黑兩



色的祭台布；莫三比克難民用木頭雕刻了一個聖爵；聖盤便是盧安達婦女以西波爾麻編織的籃子。彌撒時，我坐在後院一棵酪梨樹的樹蔭下，被許多難民包圍著，他們以史瓦希里語、肯亞方言、法語和英語唱著歌。此時，我感受到留在奈洛比是多麼快樂的一件事呀！

樞機主教的講道是以《出谷紀》和《瑪竇福音》中，聖家逃亡埃及的故事為主題。他提醒我們，耶穌、瑪利亞和若瑟為了要逃避黑落德王的殺害而逃亡到埃及，他們本身也是難民。樞機主教結束三十五分鐘的講道後，一名難民靠過來對我說：「修士，這位主教一定非常喜歡我們，因為他對我們講這麼久的話。」彌撒後，樞機主教對著陽台灑聖水並為「雙手中心」祝福祈禱。



總之，房屋找在康格米區是一個完美的安排。難民可以有地方集會，並銷售他們的產品。雖然它座落在奈洛比最貧窮的地區，但是顧客可以乘車抵達，難民也可以搭乘便宜的小巴士來到。房子的安排使顧客與難民可以在戶外的陽台見面。烏塔和我也有了自己的辦公室，使我們能有更多的時間幫助難民解決他們的困難，更重要的是，聆聽他們的故事。



## 來自草地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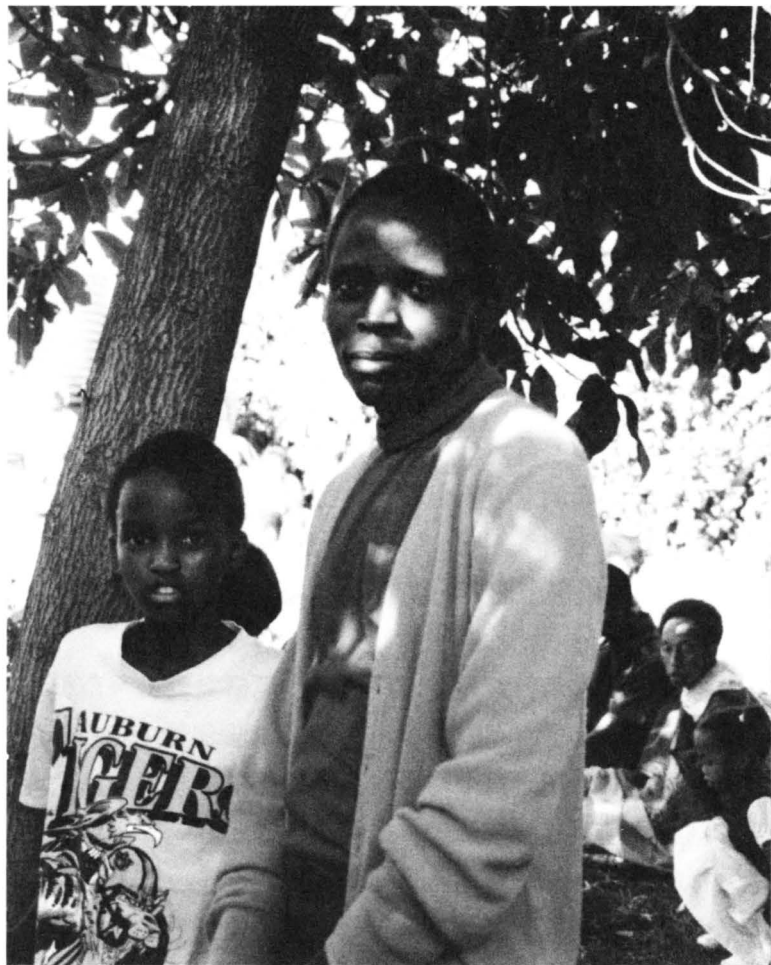
大象打鬥，殃及草地。

——史瓦希里諺語

有一天早晨，一名烏干達難民卡札（Kiiza）出現在雙手中心，穿著一件骯髒的圓領衫和藍綠色的毛衣，一隻袖子被撕裂了。他身體瘦小，有一張平靜的臉及柔和的聲音。第一次聽到卡札的故事時真的令人難以相信，雖然其他烏干達難民都證實了故事的真實性。其中一名難民對我耳語說：「卡札命真苦啊！」卡札兩眼凝視前方，從容不迫地敘述他的故事。

當獨裁者阿敏統治烏干達時，卡札還是一名青年，住在烏干達東部的一個小村莊裡。1979年，當阿敏發動戰爭對抗坦尚尼亞支持的烏干達民族解放陣營（Ugand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時，卡札被徵召加入烏干達軍隊，他的部隊被派去坦尚尼亞境內攻打烏干達民族解放陣營。那時他才十七歲，拋下年輕的妻子，打仗去了。

他說，他在坦尚尼亞英勇奮戰，但是卻被敵軍俘虜。敵軍命令他和他的夥伴一起爬進一條長長的淺溝裡，依序趴下，臉孔貼在冷冷的紅色泥土地上。當這些烏干達士兵在淺溝裡扭動身體並發出尖叫聲時，解放陣營軍的軍官就用手槍一一射殺他們。在屠殺進行時，這名軍官的手槍子彈用完了。



卡札和他的一個孩子，攝於雙手中心後院。他的故事聽起來令人毛骨悚然，幾乎難以置信，但是日後由其他難民證明，確實如此。

「天主教了我。」卡札說。

卡札被關進坦尚尼亞首都沙蘭港（Dar es Salaam）的監獄裡，並遭到刑求。獄卒將樹薯泥<sup>13</sup> 摻上沙土煮成食物給他吃，因而引起嚴重胃腸病變，疼痛不已，甚至還有血便。卡札說：「紅十字會的人員來探訪我，也拍了許多照片，」但是這次的探訪毫無結果。最後，卡札不再吃樹薯泥了。

1980 年戰爭結束後，卡札和他的夥伴被遣返回國。然而，阿敏的前任統治者，即是流亡在外九年的歐博特此時重獲政權，而使得卡札和之前阿敏的部隊都被視為國家的敵人，他又再度入獄，關在自己的家鄉，就是靠近尼羅河發源地，維多利亞湖（Lake Victoria）附近的金佳鎮（Jinja）上。一年後，卡札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人，因此決定逃跑。一天晚上，他用舊衣服綁著自己的身體，從一扇破舊窗戶墜到地面。他買通一名漁夫，將他渡到湖對面，他在湖邊草叢裡躲了兩天。

最後，他終於回到距離肯亞邊境幾公里的家鄉村莊，也得知烏干達軍隊在他之前來到他的家鄉，以機關槍殺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村裡的婦女告訴他，他的妻子被殺前還遭到士兵強姦。卡札害怕軍隊發現他，因此又躲回草叢。他在肯亞邊境馬拉八鎮（Malaba）越過邊境，這裡是東非鐵路由印度洋岸開來的列車必經之地。卡札逃到那裡的小型天主教收容所裡。從那裡步行一百五十英里，來到位於東南方的奈洛比。

---

13. 指煮熟的玉米泥或木薯泥，史瓦希里語念作「posho」，常見於肯亞西部和烏干達的人民食用。





卡札在奈洛比開了一間小型雜貨店，販售廉價物品。日後他娶了一名烏干達女子，並且為他生了三名子女，他們勉強可以維持生活。但他仍然擔心烏干達的當政者。有一天，當他走在奈洛比的市中心時，一輛肯亞政府的警車向他開過來。三名警察跳下車，抓住他、毆打他，並把他丟進後車廂裡（卡札推測，這是烏干達政府與肯亞警察勾結，設法綁架他）。

關在後車廂裡真是令人窒息，唯一的空氣來源是生鏽的金屬車蓋。每隔半小時左右，警察便停車，打開後車廂，用拳頭毆打他。他們脫去他的衣服，並丟到路上。

幾小時後，他從顛簸的道路和泥土的氣味判斷，他們已經離開了奈洛比。他知道現在唯一的機會便是設法打開車廂蓋，於是他試著不斷地用腳去踢車蓋的鎖。車蓋終於打開，他跳出後車廂，摔在泥土路上。他發現自己是在位於奈洛比以北十五公里的納庫魯湖國家動物保護區（National Game Reserve at Lake Nakuru）內，原來警察打算將他處決後丟在這裡餵動物呀！卡札聽見警察停車並勸他出來的聲音。在極度恐懼之下，他跑進草叢，尖銳的刺，刺傷了他的皮膚。在哀傷絕望中，全身赤裸的他跪在地上大聲呼喊道：「救救我，天主啊，我一無所有了！」

經過幾小時躲避逮捕他的警察之後，卡札走出了保護區，來到一處加油站，他搭了一輛便車回到奈洛比，發現自己的家人躲藏在他的店裡。他從其他烏干達難民口中得知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或許可以協助他的生意。

當我見到卡札時，他已經決定要為自己和家人找到謀生的方法。我們辦公室幫助他開了家小商店，出售衛生紙、瘧疾藥

丸、火柴、糖果、肥皂和芬達汽水。他努力經營，頗有業績。



在幫助難民創業上，我抱著極大的希望。我總是想像這些難民努力勤奮地創業，辛苦賺進的每一分錢足以用來購買食物及付房租。但是我這西方人的期盼常常是毫無意義的。在非洲，生活常有阻礙，即使那些最謹慎正直的人也無法例外，這使得「尋常的事業」變得不尋常。然而，這些難民頑強的堅持使我大為驚訝。若被問到生意如何時，他們總有各種各樣的回答，或者說：「我們繼續慢慢地做啊！<sup>14</sup>」

無疑的，所發生的事會使一些美國人裹足不前，但這在非洲是意料中並且可被接受的。一名將動物圖案繡在樹皮上的烏干達婦女珍坦承說：「修士，生意不好。房東把我趕出家門，現在，我和孩子露宿街頭。」

一名衣索比亞男子邊咳嗽邊說：「今天我身體有些不舒服。我得了肺結核。」

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難民有一種存在性的世界觀，是合情合理的，那是一種混合勤奮與利欲心的奇特想法。他們在自己祖國學到這種社會精神的第一部分：無論在家、務農或經商，勤奮工作便是成功。

---

14. 史瓦希里語 tunaendelea 有「我們繼續前進」之意，整句「Tunaendelea, pole pole」意即「我們繼續慢慢地做」。



第二部分則是他們長期留在難民營中所學到的：當有好東西可拿時，就要去拿。因為你無法知道你是否能再次得到這些食物、衣服或任何有用的東西。

當一名叫羅絲的烏干達婦女向我們說明，她如何能在自己的工作上使用縫紉機時，我們便給了她一台新的電動縫紉機，是可信賴的勝家 241 型縫紉機。她曾經用來縫製衣服的那台中國製縫紉機總是出問題，所支出的修理費已超出她的能力。

羅絲得到那台新縫紉機之後的幾週，有一天，我們開車到奈洛比城外的加希（Gachie），那是她住的農村。羅絲是三名孩子的母親，她屬於眾多基督新教中的一派，為表示她的宗教派別，她在頭上戴一條白色棉質頭巾。羅絲領我走進她的小木屋，請我坐下，在我面前擺上了烤花生和燉牛肉。我對於難民烹煮的食物仍然保持警覺性，理由是害怕肯亞極普遍的兩種疾病：食物中毒及肝炎。但是，我已經決定要接受由難民、朋友或工作夥伴烹煮的食物，因為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知道我不想要吃太多；這一鍋燉牛肉可能花掉羅絲好幾天的收入。假如我少吃一點，仍可以表示我喜歡這道菜，另一方面也可以留一些給她和她的孩子。

在我們用餐時，我注意到那台新勝家電動縫紉機卻原封未動地放在幽暗的小木屋裡。而放在屋子中間的仍然是那台廉價的中國製縫紉機，周圍堆滿了不同的碎布。

我問她：「羅絲，妳為何不用那台新縫紉機呢？」「但是，沒有電呀，修士。」

乍聽之下，我驚訝得無言以對，最後，我盡可能地禮貌性

問了一個合理的問題，「那麼，為何妳要一台電動縫紉機呢？」

羅絲耐心地說明理由，雖然目前她家裡沒有電，或許有一天會有電，此外，日後她是否還有機會得到一台電動縫紉機呢？我很難反對她的思考方式。

總之，我希望能提防過多這種只求取眼前利益的想法，這其中最不幸的例子是一名難民為了急用，出售一件由耶穌會難民中心捐贈的裝備。這當然很誘惑人，但是，我覺得必須盡力避免這事的發生。因此，當一名盧安達母親史佩西坦承她把自己的縫紉機賣了時，我非常生氣。難道她沒有發現這是多麼的短視嗎？她不知道自己已經放棄未來的謀生機會嗎？

「這是非常愚蠢的行為，」我說。

史佩西耐心地聽完我慷慨激昂的陳詞後，說明為何她要賣掉她的縫紉機。

史佩西是一名沈默寡言的婦人，她最顯著的特徵便是兩顆分得很開的門牙。她來到我的辦公室時，用一條紅、橘相間的布<sup>15</sup>包著她的孩子，背在身上，在頸部及腰間打了個結，她靈巧地鬆開這兩個結，很快地把孩子由背後轉到前面，然後坐下，解開衣服，開始餵奶。她口齒不清地告訴我如何念她的名字。去年，她和她的姊妹拿到了一項計畫，她們一起設計了中非的

---

15.這是一種樸實、廉價的長型布，希瓦希里語念作「khanga」，上面通常以幾何圖形作為裝飾。常被用來纏繞成裙子或當作圍裙，有時也會做成特別的印花布，用來慶賀國家節日或某些特別的狀況，如教宗來訪等。



服裝，採用色彩分明的布料，並在頸部配上刺繡圖案。

正如許多其他盧安達難民一樣，史佩西和她的父母在 1970 年代中期移民到肯亞。1973 年，盧安達政府提出一項計畫，徹底限制圖西族（Tutsi）在國內的行動；同時，胡圖族（Hutu）便開始襲擊盧安達的學校，目的在驅趕圖西族的學生。其結果便造成上千的圖西族，包括史佩西和她的家人，都逃離家園。如同其他難民一樣，這些盧安達人無法湊足返鄉的旅費（許多人由於懼怕而不願意回國，這並不令人驚訝），因而留在奈洛比，但卻常常處於流動狀況中。無論他們在肯亞居住多久，肯亞政府仍將他們及他們的子女視為難民。

由於最近盧安達境內的種族殺戮而造成新一波的難民湧進肯亞。按照傳統，在奈洛比的盧安達人開放自己的家接納他們的同胞。雖然史佩西已經與自己的姊妹及姊妹的子女同住，但她仍然在自己狹窄的一層樓房中接納了五名新來的親戚。

住在史佩西貧民區周圍的鄰居也有許多貧窮的肯亞人。有一名鄰居雇用了一名馬賽族男子擔任那裡的守衛。史佩西說那名男子非常兇狠。有一天，史佩西的外甥女手上拿了一杯水去爬樹，不小心杯子掉落，正打在這名守衛的頭上。人人都在笑他。他被眾人的笑聲激怒，就把這女孩從樹上拉下來，開始打她。

鄰居跑去告訴史佩西的姊妹說：「妳的女兒被打了。」史佩西一邊哭泣，一邊重複這部分。史佩西的姊妹跑過去，用力拉開守衛和她的女兒。此時，這名守衛從外套裡拔出一把廚房用的刀，對著她的喉嚨刺去，她因失血過多，就在女兒面前倒地而死。

此後，史佩西要照顧這名失去母親的外甥女，而她自己卻毫無分文為這名女孩買食物。

我立刻知道我對史佩西的判斷是錯誤的。誠如我在奈洛比期間不斷發生的事件一樣，我意識到為了要面對她的情況，我得要做同樣的選擇：是否為了要養活孩子，賣掉縫紉機，而勇敢地去打擾那位吉姆修士呢？或留著縫紉機，讓吉姆修士高興，但是卻讓自己的外甥女餓著肚子呢？這並不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史佩西講完自己的故事後抬起頭來望著我，平靜地說：「修士，這就是為什麼我賣了我的縫紉機。我可以有一台新機器，好能重新開始我的工作嗎？」



擁有聯合國難民機構的文件（證明難民在某國有合法身分的文件），竟然無法阻止警察對難民的性騷擾、監禁、鞭打以及最常見的勒索。肯亞政府在這方面僅僅敷衍一下罷了。我來到肯亞後幾個月，丹尼爾·莫伊總統（Daniel arap Moi）發表公開聲明，嘲諷在奈洛比的難民，尤其是烏干達難民，譏笑他們是偷車賊。事實上，大部分的偷竊案都是肯亞警察幹的。我的丹麥朋友有一次從奈洛比的一家商店出來，看見她的車子被開走。她跑著追自己的車直到政府機關前，車子停了，兩名警察由車裡下來，滿臉笑容。

一天下午，一名來自蘇丹邊境洛基立吉歐（Lokichoggio）難民營的男子若望·克利斯丁來到我的辦公室。二十五歲的他身材高大，兩眼充滿血絲。他的表親已經註冊進入路易絲修女的



獎助計畫中。若望以細膩的線條和絢麗的水彩顏料畫出蘇丹男人和女人的畫像。我們後來為他購買顏料、畫筆和紙張，協助他的人像繪畫事業。若望第一次來拜訪我們時，帶了一位朋友當他的翻譯，他描述自己被肯亞警察逮捕的情形。

若望透過翻譯娓娓道出自己的故事。警察拿了他的聯合國難民身分證，並且撕毀。他低頭哭泣，眼淚流在他乾燥的皮膚上，形成兩行黑色線條。這是在奈洛比難民最悲慘的命運——遲早他們就會被逮捕入獄。

他在警察局遭到刑求，一名警官對著他頭旁邊的大木桶開槍。

這名翻譯者突然停止，他舉起雙手說：「但是，現在他……啊……那個字怎麼翻譯？」我立刻叫我們肯亞籍的清潔工維奇妮進來協助。

這名翻譯者用史瓦希里語說了那個字「Kiziwi」。

「鬻子」清潔工說：「這個字的意思是鬻子。」





## 柯蒂雅的儿子

天主，祢的聖神在創世之初已運行在大水之上，使大水含有聖化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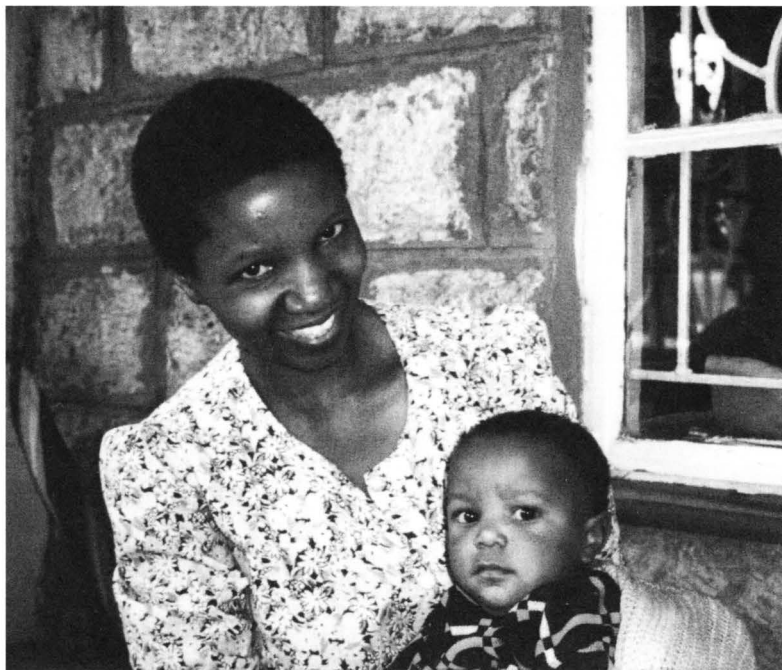
——復活節前夕祝福水祈禱文

柯蒂雅（Khadija Nakyobe）可以用乾草編織出色彩鮮豔的各種墊子，尺寸由寬大房間的地板墊到小桌墊，風格及樣式各不相同。幾乎每週，柯蒂雅都會背著那用一塊舊布包著的沈重草墊子來到雙手中心探望我們。當她解開那塊布時，草墊像一條彩色河流般在磨損的拼花地板上展開來：粉紅、翠綠和嫩黃。她是一名才華洋溢的女子，她製作的草墊頗受肯亞人和外來顧客的喜愛。

柯蒂雅有三名子女，是一位具有親和力的年輕烏干達女性。她第一次來見我們時拿著一封信。如同許多難民一樣，她向一位識字的朋友口述她的意思，由這人代筆寫出。這類介紹信都是以動人的問候語開始，讓人想起聖保祿書信的問候語。

信是這樣寫的：「親愛的吉姆修士，我以主耶穌基督之名問候你……」有關難民的介紹則是千篇一律。有變化的部分是：「……因祂的名，將這人派來，我因此而蒙祝福。我們常常因你而感謝天主，因為你極仁慈地對待了我們。」結尾是：「修士，你和你的家人都好嗎？請代為問候。」等等類似的問候語





我幾乎忘記柯蒂雅的承諾，直到有一天她抱著自己的新生兒來到雙手中心。

寫滿一頁。

與這相反的，則是各種不同的請求，例如：事業計畫、醫療補助、購買食物、嬰兒衣服、修理縫紉機的費用、子女學費以及房租等的補助。

柯蒂雅的請求是一項能使她和其他兩名烏干達婦女製作更多草墊的計畫。烏塔和我欣然批准這項請求。

有一天，柯蒂雅宣布她懷孕了。這真是令人驚訝，因為我不知道她結婚了。那時，我知道最好不要問太多問題。

她微笑著說：「修士，假如是個男孩，我要給他取名詹姆士·馬丁，假如是個女孩，我要給她取名烏塔。」

我說，我感到很榮幸，雖然叫這種名字的非洲小孩生活在其他同胞中會有超乎想像的困難的。「詹姆士·馬丁」這個名字很糟，而「烏塔」呢……

之後好幾個月都不見柯蒂雅的出現，誠如其他難民所說的，她「失蹤」了。有一天，她抱著一名嬰兒出現在我的辦公室，雖然我已經忘記她的承諾。

「這是詹姆士·馬丁！」她笑著說，並把孩子遞給我。我用手臂環抱著他，輕輕搖著，並且盯著他那沒有表情的棕色眼睛。

「你認為我應該讓吉姆受洗嗎？」柯蒂雅問道。

我確實不是那種到處強迫別人接受洗禮的傳教士。多年前，有些天主教傳教士已經放棄過度勉強要人受洗的作法。另一方面，我也不會禁止某人接受洗禮。總之，身為一名基督徒，就是要邀請新成員加入我們的信仰團體。因此，我同意吉姆接受洗禮。



「但是，我們是穆斯林，」柯蒂雅說。

啊？

「是的，我是穆斯林。我可以讓吉姆受洗嗎？」

這是一個更棘手的問題，至少在神學上是如此，對這類的事我沒有經驗。是否只因為我的推薦而強迫柯蒂雅放棄她原有的信仰呢？這是很糟糕的建議，因此，我決定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便是提醒她，孩子的洗禮是一件重大的決定。雖然我很高興她想要吉姆成為基督徒，但是她不要以孩子的洗禮來取悅我。假如她有讓吉姆受洗的計畫，那麼她自己對基督信仰也應該略知一二。我建議她或許可以到當地的天主教堂去，在那裡她可以參加慕道班。

幾週後，她再度出現在我的辦公室，她說：「我很高興。」她滿臉笑容地說詹姆士·馬丁將在主日受洗，詢問我願意做他的代父嗎？

我當然願意，但是，我說：「妳呢？妳自己有什麼決定呢？」

「我已經受洗了呀！」她回答道：「我的聖名是依撒伯爾。在聖經裡，這是瑪利亞表姊的名字。」

她滔滔不絕地說著，真正的意思是小吉姆需要幾件受洗穿的衣服，我便給了她五百先令。主日，我再次抱著小吉姆來到洗禮池旁，看著堂區神父在吉姆頭上倒水，並歡迎詹姆士·馬丁加入基督徒團體。洗禮後，我的耶穌會團體以飲料和點心招待依撒伯爾、柯瑞根和她的家人，慶祝小吉姆的受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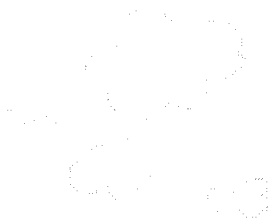
幾週後，另一名烏干達婦女愛琳抱著她的嬰兒來見我說：「這是詹姆士·馬丁。」

我很高興。但是，我精明的烏干達朋友艾麗絲卻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天下午，當我向艾麗絲買了一些手工紮染布料之後，她對我說，我不應該給柯蒂雅孩子那些受洗的衣服。她搖著頭表示事情遠超過我能想像的。

為什麼不應該呢？我一頭霧水。

「修士，」她慢慢的開始，似乎在對一名白癡或一個愚蠢的孩子說話：「假如柯蒂雅和愛琳都把自己的嬰兒取名為詹姆士·馬丁，假如你也給她們兩人錢去買嬰兒的衣服，那麼修士，很快地，你是不是會在奈洛比看見許多名叫詹姆士·馬丁的孩子呢？」



## 馬林地

除了告訴您我們即將上船外，其他沒有什麼向您報告的了。我們最後祈求我們的主基督賜予恩寵，使我們能在永生裡重逢相聚；由於羅馬與印度之間遙遠的距離，以及將要尋獲的豐富收穫，我不知道此生我們是否還有相見的機會……

——聖方濟·薩威致聖依納爵信函

於葡萄牙里斯本

1541年3月18日

在奈洛比工作一年後，我決定要去度假。我與其他三位耶穌會士一起到蒙巴薩（Mombasa）去，這是肯亞面對印度洋的一個港口。我們向一座由義大利孔索拉達神父經營的退省院訂了房，該院的義大利食物被認為是東非最佳的美食。

八小時的旅程雖不舒適，但卻景色宜人。從奈洛比到印度洋岸的蒙巴薩公路，行經薩弗（Tsavo）這片乾燥、平坦大草原的地區，點綴著高大的猴麵包樹和矮小的荊棘灌木叢，還有斑馬、大羚羊、長頸鹿、駝鳥和瞪羚不時出沒其間。天氣極為炎熱。由於大羣的長頸鹿突然越過公路，一不注意便撞上行駛中的車輛，因而使得路況處於危險中。誠如一位肯亞朋友在我出發前告訴我的，假如一輛公車不幸撞上一隻長頸鹿，「長頸鹿

會贏。」

二十世紀初，由於無法解決當地野生動物的問題而停止修建東非鐵路，因此引起國際間的關切。這極不可能卻是真實的故事就成了許多書的主題，最近，查爾斯·米勒（Charles Miller）便是以修建這條東非鐵路為主題撰寫了《瘋狂快車》（*The Lunatic Express*）這本令人難以置信的書。這條鐵路不僅經過這片大草原，還經過東非大裂谷、尼羅河以及數千公里的岩石山脈和燥熱的沙漠。幾百公里的內陸，兩隻巨大的獅子——「薩弗食人魔」——使肯亞人民和由英國雇用修建鐵路的印度工人恐懼不已，這項計畫因而完全停頓。（1997年的電影《暗夜獵殺》（*The Ghost and the Darkness*）便是以這故事為主題而拍攝的。）

幾個月來，這兩隻獅子大多在夜間襲擊工地上的工人，但也常常在白天傷害人。沒有任何辦法能阻擋牠們；設在樹上的守衛被牠們吃掉，用來阻擋獅子穿越的有刺圍籬<sup>16</sup>也不能發揮作用，甚至特別設置的陷阱也毫無用處。有一節火車車廂特別改裝，讓一名神射手坐在一排金屬欄杆後面，他就能射殺任何靠近的獅子。第一天晚上使用這方法時，其中一隻獅子從後面的窗子爬進來把這名神射手拖走，留下他的來福槍和地上長條的血跡。

恐怖事件發生後幾個月，英國皇家部隊的陸軍上校約翰·

---

16. 這種有刺的灌木圍籬，希瓦希里語念作「boma」，也有籬笆之意。馬賽人和其他東非民族用它來圍繞、保護他們的村莊。



派特森（J. H. Patterson）在一次艱鉅的狩獵中捕捉了這兩隻獅子。這英勇事蹟使他為自己的冒險故事取了一個名字——這就是《薩弗的食人魔》（*The Man-Eater of Tsavo*）書名的由來。

我除了在野生動物保護區，坐在自己安全的吉普車內觀看獅子外，我對獅子的經驗僅限於一些故事。一位坦尚尼亞的耶穌會士敘述他睡在尚比亞耶穌會會院的經歷。如同許多其他設在溫帶地區的修會會院，耶穌會的會院四周也有寬闊的草地。有天晚上，這位耶穌會士洗完澡後回到自己房間，在就寢前將爽身粉灑滿全身。第二天早晨，他注意到地上有一雙沾了爽身粉的大獅子腳印，證明獅子進到房間，停在床邊，然後便離去了。

這名耶穌會士冷冷地說：「獅子<sup>17</sup>放過我了。」

我們在奈洛比會院的守衛若瑟，是一名十九歲的馬賽族青年，他告訴我，該族的男孩必須殺死一頭獅子才能成為戰士。他很自豪地說，他已經是戰士了。我問他是如何獵殺獅子的，預料這是一段長長的狩獵描述，包括慣例、計畫及獵殺經過。

但是，若瑟只是蹲下，將緊握的右手舉到肩膀後面，好似手持一支矛一樣。他用史瓦希里語說：「Kama hivi！」（意為「就像這樣」），同時比了一個快速向外推出去的動作，並從牙齒間發出口哨聲。

另一名馬賽族的朋友敘述他幼年時當牧童的經驗。他說，

---

17. 史瓦希里語的「獅子」念作 **simba**。就是迪士尼動畫《獅子王》裡的主角辛巴的名字。

有一天，他疲倦地靠在自己放羊的棍子上，突然注意到羊羣跳到半空中。他發覺情況不尋常，於是走近羊羣，他以為有一隻很大的狗在羊羣中。他用棍子把那隻狗打跑了。我的朋友說：「但是，那不是一隻狗，是一頭**獅子**。」他說，假如當時他年紀大一點，他會對當時的情況了解得更多些。

不久前，緊鄰奈洛比野生動物保護區的耶穌會避靜院，因獅子的出沒而引起一些麻煩。有一天晚餐時，肯亞籍的廚師全身發抖地對大家說：「我聽到獅子的吼聲。」第二天，一位耶穌會士在避靜院的地上看見**獅子**的腳印。來此做避靜者得到警告，不要在黃昏或清晨走出戶外，必須留在室內，因為那是獅子的覓食時間。當我在那裡做避靜時，我遵守這項規定，雖然他們已經在四周加裝了另一道圍籬。這些耶穌會士向我保證那圍籬是「防獅子」的，我注意到，在《薩弗的食人魔》故事中也用了相同的字。



我們在下午三點鐘抵達蒙巴薩避靜院，一位頭頂發亮的胖胖義大利神父帶領我們到房間去。他領我穿過別墅區，來到一間能直接通往海灘的寬大房間。在進門處，有幾隻黃綠色的蜥蜴趴在水泥地的陽台上曬太陽，赤道的太陽使牠們全身反射出白色光芒。印度洋前，棕櫚樹的葉子在溫暖風中搖曳著。遠處的地平線上，灰色的美國軍艦緩緩地駛向索馬利亞海岸。

房間內有一個吊扇，轉動時不斷發出響聲。「神父，非常歡迎您住進別墅區。」我向他道謝，並說明我還不是神父。





「你還不是神父？那麼，請這邊來。」他帶著鼻音說道。他提著我的行李走出房間，我一頭霧水地跟在後面。他領我走進另一間狹小陰暗的房間，只有一個面對停車場的窗子。他指著其他房間說：「其他房間是給神父們住的。」



我來到海邊的另一個原因，是想看看距離蒙巴薩北方幾公里的小鎮馬林地（Malindi）。這裡是喜愛冒險的歐洲旅客，尤其是義大利人嚮往的地方。走進這小鎮看到的是義大利文的房地產廣告，除了海灘和幾家義大利餐廳外，這裡就無值得注意的地方了。然而，在馬林地伸入印度洋的半島上，有一塊圓錐形的石座上豎立了一個金色的十字架，面對印度。石座是當代作品，而十字架則是十五世紀時由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達迦馬（Vasco da Gama）豎立的，以幫助船隻辨認海岸線。

當我們圍繞小鎮四周航行時，首先看見的便是達伽馬的十字架。另一位看見這十字架的耶穌會士是四百五十年前，前往印度的偉大傳教士聖方濟·薩威。他在 1542 年 9 月 20 日寫給羅馬耶穌會弟兄們的信上這樣敘述著：

我們從莫三比克到果亞（Goa），航行了兩個月。經過寧靜的摩爾人（Moor）城市馬林地……死在那裡的基督徒都埋葬在一個大墳墓裡，上面豎立了許多十字架。葡萄牙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豎立了一個美麗的金色十字架。我們的主，天主知道，當我們看見那十字架

時，心中感到何等的安慰，它雖孤獨卻以勝利的姿勢矗立在那裡，我們深知它的力量。

我們來這裡的原因是要到十字架附近的一座小教堂去，方濟·薩威在肯亞短暫停留時曾在這裡舉行過彌撒。這教堂座落在淡藍色的印度洋邊，被棕櫚樹緊緊包圍著。由白色泥灰粉刷的牆構成一座正方形的建築，蓋上高又尖的褐色茅草屋頂，頂上有一個簡單的木質十字架。教堂周圍是墓園，在這些肯亞天主教信友的墳墓中躺著一位英國男爵，他是方濟·薩威的朋友，不幸死於前往馬林地的途中。

我在馬林地埋葬了一位死在船上的友人。當地的摩爾人看著我們基督徒如何埋葬亡者而大受感動。

我們在教堂裡看見的，可能也是聖方濟·薩威當年所看見的——泥土地和一個光禿的石頭祭台。然而，在我們前來參觀的那一天，祭台上放置了一張用玻璃紙包著，並繫上黃絲帶的小祈禱文。在另一角落，有一張聖安東尼抱著嬰孩耶穌的圖片。幾袋水泥和工人丟棄的運動鞋也放在角落裡。

馬林地最傑出的一位摩爾人要我告訴他，在我們所熟悉的教會裡是否還常常祈禱，我們是否以虔誠的心祈禱呢？因為他告訴我，他們已經失掉了許多原有的宗教熱誠，他想知道，是否在基督徒當中也是如此呢？



1991 年是聖依納爵誕生五百年紀念，為慶祝這依納爵年，東非的耶穌會士重新粉刷了這座教堂。一塊新的綠色木頭小牌子上敘述這地點的歷史。一位耶穌會士說明將這牌子設計得毫不起眼，為的是避免冒犯此地大多數的穆斯林居民。這種態度與薩威當時回答摩爾人問題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他在信中寫道：

我告訴他，我們這位在一切創造工程中信實無比的天主不喜歡異教徒，也不俯聽他們的祈求，這便是天主要他們停止祈禱的原因，因為祂不喜愛他們。他對我的回答極不滿意。

但是這塊小牌子確實是有意義的，因為考慮到這裡絕大多數的伊斯蘭教信徒。事實上，當我們到達時，我們受到看管教堂的穆斯林小男孩熱烈歡迎。

我們三人在這幽暗的小教堂裡舉行彌撒：一名為難民工作的美國修士、一名在坦尚尼亞初學院工作的馬爾他神父，一名在奈洛比負責神學院的盧安達神父。看管教堂的男孩用長青樹的樹枝恭敬地掃去祭台的灰塵，然後安靜地遞給我們兩枝洋紅色九重葛來點綴祭台。為要保持祭台布的清潔，我們在滿布灰塵的祭台上先放上報紙，再鋪上祭台布。奈洛比的《國家日報》頭條新聞透過祭台布呈現眼前：「七十歲男子性侵女孩」。教堂外有隻雞在啼叫，我們還可以聽見隨海風飄來的陣陣音樂。

在彌撒中，我想到方濟·薩威。當時他在馬林地的情況又

是如何呢？在一個有飛機、有電話、有傳真的時代裡，我是否還能透過幾個月才能收到的信件，深切體會聖方濟·薩威遠離家鄉的意義並且珍惜它呢？

我如何能了解像聖方濟·薩威這樣的人物呢？以下便是這位單純的人真實的表白：

城中有一位學者，是屬於穆罕默德宗派的摩爾人，他告訴我，假如兩年內穆罕默德不來探訪他們，他就不再相信他或他的宗派了。唯有異教徒和罪人才應該生活在怯懦中。

或許太自大了吧？但是，就是同樣這個人，他不眠不休地為陌生人工作，奉獻自己的生命，將他視為珍寶的好消息帶給他們。也是同樣的這個薩威，當他日後在索科特拉島（Socotra）遇到一羣當地居民與他分享他們僅有的食物時，他深深表達了他的謝意：

他們以滿懷的熱誠和善意，從他們的窮困中，將他們的所有給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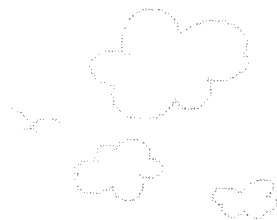
當我站立在聖方濟·薩威的小教堂時，我知道自己對這位十六世紀聖人的心態或許了解有限，至少從二十世紀天主教信仰的觀點是如此。例如，如果薩威今天在肯亞，「要為柯蒂雅的儿子付洗嗎？」的問題是否也讓他傷腦筋呢？在他那個時代，



傳教士普遍的觀念便是為每一個人付洗，然後讓天主去挑選。

然而在這座教堂裡，我意識到，我仍然可以從一個遠離同伴，置身於完全生疏的奇特文化中，帶著強烈的中世紀思想，但仍舊努力在他所謂的「異教徒」中尋找天主的人身上學到一些東西。





## 生命之樹

天主不是選了世俗視為貧窮的人，使他們富於信德，並繼承祂向愛祂的人所預許的國嗎？

——《雅各伯書》二 5

除了官方認養計畫外，烏塔和我還幫助那些因某種原因不能獲得官方支助的難民，而他們卻已經開創了自己的事業了。

許多難民已經利用他們在祖國學習到的傳統技術興辦自己的事業。衣索比亞的男子製作手提包、皮帶和皮製小十字架。烏干達婦女編織放在地上的墊子，也編織草籃子。莫三比克的男子製作黑檀木的雕像。盧安達婦女按照傳統，結婚後六個月留在家中，用西波爾麻編織幾何圖形的籃子。這一切都在家中使用，也當作送給親戚的禮物。高蒂定期將這些產品拿來，它們很快就在美國大使館銷售一空。



阿斯丁（Agostino Alikutepa）是莫三比克的木雕師傅之一。他與另一名年長的莫三比克木雕師匝卡利（Zechariah）一起工作。每個月，他們兩人長途跋涉地來到蒙巴薩購買所需要的昂貴黑檀木。如果可能，他們也會買一種蜂蜜色的黑心黑檀木。

在奈洛比，確實有無數的肯亞和坦尚尼亞人從事雕刻，並



阿斯丁是來自莫三比克的難民，具有高超的雕刻技術，他從另一名年長的莫三比克難民匝卡利學得雕刻技術。阿斯丁的專業對我而言是一種源源不斷的喜悅，也是他信仰的泉源。（照片提供 | Don Doll, S.J.）

承辦興旺的觀光業務。他們的雕刻種類繁多，包括動物、動物的頭、刻有動物頭的湯匙和叉子、馬賽族戰士、非洲人半身像等。甚至品質較差的雕刻作品也都銷售一空。

當我第一次見到阿斯丁時，他背著一個大麻布袋，裡面裝著一些樣品。他看起來和我認識的一些莫三比克人一樣，圓圓的臉上有一對水汪汪的棕色大眼睛。我問他是否製作一些像我在市面上看到的那些雕像。聽到我的話，他很生氣，以堅決的口吻表示，他從不做那些粗俗的雕刻作品。

「匝卡利從小便開始雕刻」他說，「現在他收我作他的學徒。」由袋子裡他拿出不同髮型、光滑的黑檀木半身像；用芬芳的黑檀木雕刻、已磨光如鏡子般的動物；一座大頭的基督像，祂的臉是用粗糙的樹皮製成。這些雕刻作品的品質確實高於市面上出售的商品。我問匝卡利和阿斯丁是否考慮在我們的商店外設工作台，並在這裡雕刻，讓新顧客親眼看見他們的工作，這樣或許有助於他們的生意。為了鼓勵他們，我提供他們新的雕刻工具。我的建議獲得他們的同意。

這方法非常成功。他們兩人在我們前院一棵高大榕樹下擺了工作台，地面上散布著白色、棕色和黑色的木頭刨花，而觀光客卻在工作台前排了長長的隊伍等待著。我通常先為我們的商店購買一些成品，但有時一些觀光客看到一件正在製作過程中的作品就先預購，等到完成後再回來取。他們兩人真的樂翻了。

阿斯丁和匝卡利也在自己家中存放了一些成品，他們不時地會將這些成品帶來我們中心。有一天下午，他們要我來到那棵榕樹下，在一個用麻布袋蓋著、狀似一塊小黑木頭的面前。





他們掀開麻布袋，一尊三英尺高、用黑檀木雕刻、形狀糾纏的作品呈現在我眼前。當我走近仔細觀察時發現，那是一羣手牽手的男男女女，有的在一座花園裡工作，有的餵奶，有的相互親吻，有的跳舞，有的爬在樹上。實在太奇妙了，我從未看過這樣的雕刻作品。

匝卡利解釋說：「這是《生命之樹》。是我們傳統的一部分。」他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來雕刻它。

不幸的是，售價太昂貴。他們開價三萬五千先令，大約美金五百元。我提醒他們，我們的顧客喜歡容易攜帶回國的小件物品，或是可以裝點在奈洛比家中的小裝飾品。像這種大件又昂貴的雕刻是乏人問津的。

「但是這件作品非常美麗，」阿斯丁有自信地說：「當然，一定賣得掉。」

我說我很懷疑。就算能賣掉，我們商店也無法買這樣的作品，因為這超出我們的預算。

阿斯丁回答說，或許你就把它放在店裡，不需付款，假如有人喜歡，他們就買吧！這建議真讓我這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感到慚愧，阿斯丁的商業頭腦確實比我靈活。我告訴他，這主意聽起來不錯。我說，這就是委託代售品。

「你會祈禱它能賣掉，是嗎，修士？」他問道。

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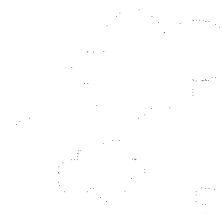
我們一起將那沈重的木雕作品搬進我們店裡。它至少有五十磅重。三名等著要見我的烏干達婦女很快前來欣賞這件作品，並跑去招呼坐在樹墩上的人也來觀看這件雕刻。他們用東非最

普遍的讚嘆方式，即是不斷發出短短的「啊，啊」聲。

五分鐘後，我聽見一輛車開進我們商店外鋪砂石的路上，一名英國觀光客從綠色吉普車上下來，走進商店。我們交談了幾分鐘後，她的目光便落在《生命之樹》上。她說：「好美！」並問它來自何處。我叫阿斯丁進來說明他如何雕刻這件作品，以及作品中人像的意義。她出了四萬五千先令買下這件木雕。

當這名女觀光客的車開走後，阿斯丁在我耳邊說：「啊，修士，你看到了嗎？你的祈禱得到回應了。」





## 安慰

假如一個人放下他不切實際的想法而專注他赤裸的貧窮時，所有的面具都會卸下，真實存在的核心隨之顯露，宗教的本性便呈現出來。在他的存在中，也展現了他與無限超越的天主奧祕緊緊相擁的那種聯繫力量，他對那位絕對者無止境的喜愛擄獲了他，突顯了他的貧窮。

——梅茲（Johannes B. Metz）

《貧窮的靈》（*Poverty of Spirit*）

雙手中心開辦一段時間後，我為自己定了一個每天的作息表。早上六點起床後，感謝射進我房間刺眼的赤道陽光，或感謝那對準時飛過窗外的埃及朱鷺鳥響亮的咕咕叫聲。我翻過身來，打開那台一名健忘的美國客人留下的短波收音機，收聽英國廣播公司的世界新聞。有足夠的熱水時就洗澡，我夠清醒時便祈禱，與我的耶穌會同伴一起吃早餐，瞄一眼《國家日報》，然後開著那輛還可動的吉普車前往康格米的雙手中心。途中看到那些已經步行要來中心找我的難民，我會讓他們搭便車，於是我們就在車上開始談他們的事情。假如我沒有看見他們，他們總是會看到我的。有一天，一名難民突然衝向我的吉普車，我猛烈地踩煞車，急速轉彎，發出尖銳的刺耳聲，為的是想要閃過他。他上車後靠在我的車子裡面說：「修士，你比那些公

車司機還糟。」

我到達雙手中心時，太陽已經高掛在清澈的天空上了，在陰涼的陽台上總有十多名難民等著要見我，大多數是女性，有些在餵孩子，多數背著她們的手工藝品，其他則拿著申請信件，要求工作補助，口中說：「修士，我有困難。」

上午大部分時間用在與難民交談。有些人需要對他們的計畫給予建議，例如：如何使收支平衡、如何與房東及商人交涉、調解紛爭、尋找新市場等，更多的是請求財務支援，以幫助他們度過困難時期。我在一間放著簡單木製椅子和矮桌子的辦公室裡與難民會面，在這裡我們可以自由地談話，有時用英語，有時說史瓦希里語，有時講法語。假如一名難民說我聽不懂的語言，例如阿拉伯語、葡萄牙語或其他語言時，通常會有其他的難民自願充當翻譯。我覺得我們都為共同的益處而合作。

我很快領悟到我花在他們身上的時間，是我能給難民最重要的東西。他們生命中有許多時候是被迫必須等待，等待，無止境的等待——不論在難民營裡，在聯合國辦公室裡，在政府機關的辦公室裡，在監獄裡，在醫院裡。在那些地方，在他們等待多時，最後被叫進去見不同的官員，那些官員便盡快處理這些衣衫襤褸的難民事務。因此，我很高興與他們在一起，仔細聆聽他們心中擔憂的事情。我所能給的不僅是金錢，時間也是我輕易就能給他們的，而時間似乎分文不值。

多數的難民都把他們希望出售的貨品拿來，例如：艾麗絲製作了一個很好的手提袋，不知什麼原因，如果我要兩個，我就得買三個。我們的商店在財務上已經健全，因此我們可以答



應他們的請求。此外，即使我們最後買了太多的商品，而這些錢也是用於善事上的。我們寧願架子上堆滿了籃子，也不願看到一個家庭挨餓。

然而，常常有些情況更糟的難民來見我們，僅僅是要錢。雖然我們工作的目的是幫助難民自食其力，但是還是有許多難民需要立即的幫助，主要是購買食物。通常我建議他們到當地的教堂去請求援助，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在奈洛比各教堂都有為難民提供現款、緊急救助的計畫。但是有些難民就是立刻要拿到錢。有一天，一名蘇丹婦女背著孩子坐在我的辦公室裡，向我討「一點錢」，因為她沒有錢付孩子的學費。肯亞的公立學校是免費的，但是卻為了一些假造的計畫，例如建築基金向學生收高額的學費，而這些建築卻從未具體呈現過。更糟的是，她說她的孩子沒有東西吃。

當我告訴她應該到她所屬的教堂去請求協助時，她就哭了。她說，她連付公車票的錢都沒有。她不停地哭，用她的裙子頻頻拭淚。她重複地說：「哦，修士，」最後，我把我自己的錢給了她。當然，當她出現在陽台時，她的臉會告訴其他難民我給了她所要求的錢（我也發現，他們能從敞開的窗戶聽見我們的談話）。有一名盧安達的難民提醒我，我不應該破壞自己訂立的辦法，他責罵我說：「修士，你不應該給她錢，你應該要她到她所屬的教堂去。」

在與難民面談的空檔時間裡，我帶一些常來的顧客看我們的商品，並解釋耶穌會難民服務的使命。即使是對難民生活最簡短的描述，往往也能讓顧客購買超過他們想要購買的物品。

我並沒有設法喚起人的內疚而鼓勵他們大量購買。有一天，一名美國婦女仔細看著一個用樹皮做的提包，提包上繡了一隻微笑的長頸鹿。

「小孩子可以把它當成書包嗎？」她指著那個粗糙的樹皮包問道。

「當然。」我回答，其實，我從未想過這種可能性。

「你認為它可以防雨嗎？」

「我想可以吧！」我設法想出充分的理由，「我是說，那是樹皮做的，對嗎？樹可以抵抗雨呀！」

她笑著說：「你就是想要以各種說詞來銷售這些物品，是嗎？」

「是啊，」我說：「這些都是很好的提包，而且很堅固……我還想告訴妳其他的事情。製作這些提包的女士正面臨一些困難。不久前她才被趕出家門。」毫不意外的，她買了三個。我能想像，在美國某處，一個小男孩拖著一個用樹皮做的書包去上學。

下午，我去探訪住在貧民區裡的難民。有些難民由於工作的因素無法來雙手中心；我也趁機察看他們，看看他們如何合作，或者我可以提供一些忠告。通常他們要求我調解爭端，或與一名兇狠的房東談判，或檢查一台不能使用的機器。因此，我下午的時間也包括開車穿梭在燥熱的城市裡，發現一名婦女孤零零地坐在賣炸魚與薯條的攤子旁，搖著頭，告訴我生意真不好呀！或者到一名婦女狹小的家裡看看，由於沒有生意，一台嶄新的縫紉機閒置一旁，地上堆滿了布料。有時候，我和他們坐在一起，聽他們訴說自己遭遇的挫折和困難。我能做的便



是專心聆聽，盡我所能給予他們可行的建議。

有時候，他們面臨的貧窮、痛苦和疾病真令我不知所措，層出不窮的問題讓我覺得前途一片黑暗。但是看見一個接一個前來找我的難民，又讓我覺得我可以幫助他們，即使是以一些微不足道的方式。還好，我很快排除我能解決他們一切困難、如同難民的救世主的那種想法。感謝在奈洛比工作的機會，讓我了解這點毫不困難。在其他地區，一個人可能想像自己是萬能的，然而，在奈洛比這裡不可預測和混亂的狀況，會讓我們知道任何全能的觀念都是荒謬可笑的。我想，這種認知使我能放心地從事我的工作。我努力工作，把其他的都交在天主手中。



工作完畢後，我離開這些難民，回到我們的會院，在小教堂中參與彌撒，彌撒後，我們這一羣來自馬爾他、印度、坦尚尼亞、愛爾蘭、比利時、加拿大和美國的會士，約十多人一起喝汽水、吃花生米、喝啤酒。六點整，鈴聲一響，我們一起在起居室做飯前禱告，然後到餐廳進餐，晚餐常常是很簡單的。廚子按每人的飯量準備晚餐，很少有多餘的。

有一天晚上，加里薩教區（Garissa）的主教來拜訪耶穌會省會長，做完飯前禱告後，他們還留在起居室談話，其他的會士都到餐廳進餐，每人拿了燉雞、青豆和馬鈴薯放在自己的盤子裡。半小時後，主教和省會長走進餐廳，只發現以下的食物等著他們：三根青豆和一塊馬鈴薯。沒有人想到要為他們二人預留食物。主教笑著對省會長說：「啊，這便是出名的耶穌會待

客之道！」

按照耶穌會的傳統，晚餐後大家都到小教堂朝拜聖體，並在聖體櫃前做簡單的祈禱。當我來到這會院時，發現他們還進行這過時的傳統，我當下決定不參加。朝拜聖體，將一個人的虔誠只局限在某一件東西上，這讓我覺得很不自在。把天主放在一個小盒子裡，難道不是讓人只在一件東西上才能找到天主嗎？因此，在我來到後的幾週，當其他會士飯後都去小教堂朝拜聖體時，我便留在餐廳清理桌上的盤碗。

幾週後，院長要見我。他溫和地問我，為何晚餐後我不去朝拜聖體？會院中其他神父也質疑為何我不參加朝拜聖體。要求解釋理由使我感到憤怒（難道我的祈禱生活不是我個人的事嗎？）我簡短地回答說，飯後朝拜聖體不是我靈修的一部分。我想就是如此吧。

但是他建議，雖然朝拜聖體不是我靈修的一部分，或許我也可以嘗試一下。他承認這種傳統是過時了，一些年輕的耶穌會士可能不接受，但是，我是否看出這是一種與團體一起祈禱的方式呢？我勉強同意了。

第二天晚餐後我便與其他會士一起走進小教堂。團體中每位弟兄都跪在聖體櫃前安靜地祈禱。我也跪著，覺得此刻的分分秒秒都是「被迫的」，心中仍然憤怒不已。但是，當我注視我周圍十多位跪著的弟兄，以團體的方式靜靜地祈禱時，我感到寧靜與平安。那是深沈的祈禱。之後，我每晚必到。最後，我了解，不是別人把天主裝在盒子裡，而是我拒絕接受即使在我視為落伍的方式上，天主的恩寵也可能來到人身上。





晚餐後，有些神父玩紙牌，有些看報，有些閱讀由訪客帶來的美國或歐洲的雜誌，有些回自己房間祈禱。

之前，柯瑞根和我發現城裡有一家出租影片的商店，我們便為團體辦一個影片欣賞之夜。影片顯然是盜版的，但是下方卻有一排文字：「禁止或轉錄」或「僅供美國影藝學院使用。禁止複製」我們懷疑，是哪一位演員把奧斯卡得獎影片賣到奈洛比來的呢？

奈洛比有兩家國營電視台：KBC 播放廉價的史瓦希里語電視劇和新聞；KTN 播放澳洲的連續劇、肯亞人鬥蟋蟀、重播美國拍攝有關非裔美人的電影。星期五及星期六晚則是「全球體育」時間，星期五晚上由英國體育節目播出在英國舉行的足球賽精彩片段，星期六播出世界比賽精華集。這些節目雖然冗長不堪，但卻是我們團體必看的。

更有趣的是肯亞的商品廣告，像是肥皂和殺蟲劑，就是當地人所稱的「蚊蟲藥」。無論在肯亞或在美國，這類藥品的廣告都對我產生作用。我選擇這種蚊蟲藥並不是因為它那誇大的效果，而是因為它的名字：蚊蟲去死（Doom）。

奈洛比每天的晚間新聞都以同樣的話開始。在 KTN 台是這樣開始的：「今天總統閣下莫伊……」然後是總統一天的行程，例如：他在東非大裂谷為孵卵所舉行啟用儀式；他訪問蒙巴薩一所小學；他在 K 城參加主日禮拜，他在艾多瑞特（Eldoret）向居民講話等。在 KBC 台，你可以聽見同樣的報導，只不過是以史瓦希里語播出罷了。

晚上，我喜歡喝一杯加蜂蜜的熱牛奶。放在餐廳桌上的蜂

蜜罐子裡都是爬進去的死螞蟻。牠們浮在蜂蜜的上面，很難把牠們挑出來。幾次嘗試著挑出這些黏黏的死螞蟻後，我發現用湯匙舀出蜂蜜放進熱牛奶中更有效率，讓螞蟻浮在表面，我只取蜂蜜就好了。這點讓我想起一句有關傳教士生活的古老名言：第一階段，你會把飯和蟲分開，只吃飯。不久，你把飯和蟲一起吃下肚。最後，你分開飯和蟲，只吃蟲。雖然我尚有一段路要走，但是，以一位經驗豐富的傳教士的說法，我已經「不遠了」。

做完簡短的默觀祈禱後（又稱為耶穌會士的省察，即是回顧一天中，我們在何處看到了天主），約十點鐘，我躺在床上看書。常常在入睡前，我會聽見一位年長的印度弟兄在祈禱。他在樓與樓之間的通道上來回走動，他的涼鞋在磨石子地面上拖行；拿著念珠的雙手背在背後，當他走動時，木頭珠子發出輕輕的咯咯聲。



我愈來愈喜愛與難民一起工作，尤其是在康格米。這是我第一次在一個人人都認識我的地方工作（無疑的，我的膚色幫了大忙），至少那些前往雙手中心的難民都認識我。向他們打招呼就是花時間和他們討論他們的生意、健康和家庭，然後便是我的工作、我的健康，還有我遠在美國費城的家人，「請代我們問候你的父母親，修士。」

沿著康格米泥土路兩旁的小販和賣烤玉米與花生的攤販也認識我。我在聖若瑟教堂吃午餐，與那裡的耶穌會士和工作人員建立了友誼。能進入那個團體，尤其是在城中貧窮地區的那



個團體，真的感覺良好。我很高興在那裡，很高興以耶穌會士的身分在那裡。

有時，我無法駕駛我的吉普車，可能是車壞了，或者是把車借給一位沒有車的朋友使用。當我沒有車的時候，我就要步行到設在很遠的山谷裡的公車站牌搭公車。

某一個下午，我步行回家。從山頂上聖若瑟教堂前土黃色的長長小路，可以俯瞰康格米山谷。崎嶇不平的道路從那裡開始往下，穿過樹葉下垂的茂密香蕉樹、高大的榕樹、橘色的百合花、長型的牧草地和玉米田。在通往山谷的路上，我經過一些默默在狹小土地上工作的人，他們都和我打招呼。光鮮多彩的太陽鳥，身上藍綠、紫和靛藍色的豔麗彩色，點綴在高高的草地上。山谷下便是奈洛比河，除了雨季外，它的水只比小溪多一點而已。在河邊洗衣的婦女一面相互談笑逗趣，一面工作。濕濕的衣服掛在布滿灰塵的矮樹上，熾熱的陽光很快就把它們曬乾。

橫跨在河面上的是一座用木棍和樹枝交織在一起而搭建的橋。每逢下雨，這座脆弱的橋立刻被沖走，康格米的居民只好另造一座。我第一次走在這座橋上時，心中覺得很害怕，一名婦女立刻取笑我並且勸告我說：「修士，你很瘦，別擔心<sup>18</sup>！」

過河後，我爬上山丘，稍做休息。站在厚實的土地上，我回頭觀看山頂上的聖若瑟教堂。雖然已經下午四點了，但是太

---

18. 史瓦希里語的「別擔心！」念作Hakuna shida，而shida有「問題、困難」之意。

陽仍然高掛在天空。陽光照射在山谷裡，使紅色的泥土小徑、細小河流、香蕉樹、草地，甚至人都反射出明亮的陽光。突然間，我心中充滿喜悅。我想，我很高興在這裡，也很高興與難民一起工作。這裡就是我應該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我覺得有用，也看到努力的結果。我的喜悅、滿足和內心的平安讓我感到無比的驚奇。



之後，我開始回想是什麼因素使我如此快樂。那天也是很平常的一天，都是一些生活上的問題，除了有幾則難民創業成功的故事外，沒有發生什麼令人興奮的事情。沒有特殊兩難的問題要解決。沒有難民要被遣返。我也沒有收到任何好消息。我的團體也是兩年前同樣的團體。我沒有期盼前往何處或去度假。當天不是什麼禮儀上的大節日，我沒有計畫在當天晚餐時見到什麼人。

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羅耀拉在為靈修輔導者留下的靈修手冊《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中寫道他所謂的「神慰」。他描述神慰是一種精神上的提升，是一種使人得到安慰與喜樂的感覺。關於這種安慰，依納爵在 1541 年寫道：「一切內心歡樂情緒，凡是足以引人嚮慕天上事，力圖救靈……都是神慰。」（神操 316）他更確切地說：「神慰也來自其他與侍奉天主有直接關係的事」（神操 316），是一種出乎意料之外，充滿人心中的感覺，這感覺來去自如，不受人的控制。依納爵由他自己的經驗得知，這種感覺是天主賞給的獨特恩賜。在我的生命中，

曾有幾次這樣的體驗，但是，卻沒有一次像那天站在山丘上那樣強烈的感覺。

過了橋，穿過一些矮小的平房和幾處田地，我走出了康格米而來到瑞里塔（Riruta），兩地的界線也逐漸消失。小徑繼續經過瑞里塔的聖若翰洗者教堂，這裡是日後聖若瑟教堂的發源地。聖若翰洗者教堂看上去更像傳統的歐洲式教堂。正如聖若瑟教堂一樣，這座教堂也附設一所規模很大的學校。當我走近這所學校時，身穿制服的肯亞學生經過我身邊，女生穿著淺藍襯衫和深藍裙子，男生穿著破舊的白上衣和深藍短褲，他們高興地手牽手，赤著腳，走在泥土地上。

公車站就在教堂後面。設在路邊陳舊的金屬候車亭已經變形。候車者坐在任何可坐的東西的上面，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在路旁一株高大的藍花楸樹蔭下等車。公車班次不多，幾乎每班車都擠滿了乘客，一半人在車裡面，一半在外面，都急著要回家。我不喜歡擠在人堆裡，雖然當車子開動時，這些乘客都伸出手要我抓住，好能搭上車。這並不是因為我在意這不舒適的車程，而是我不介意等下一班車。



## 莫琳修女買錯了東西

付款之前，仔細看看貨品。

——《孤星旅遊指南：肯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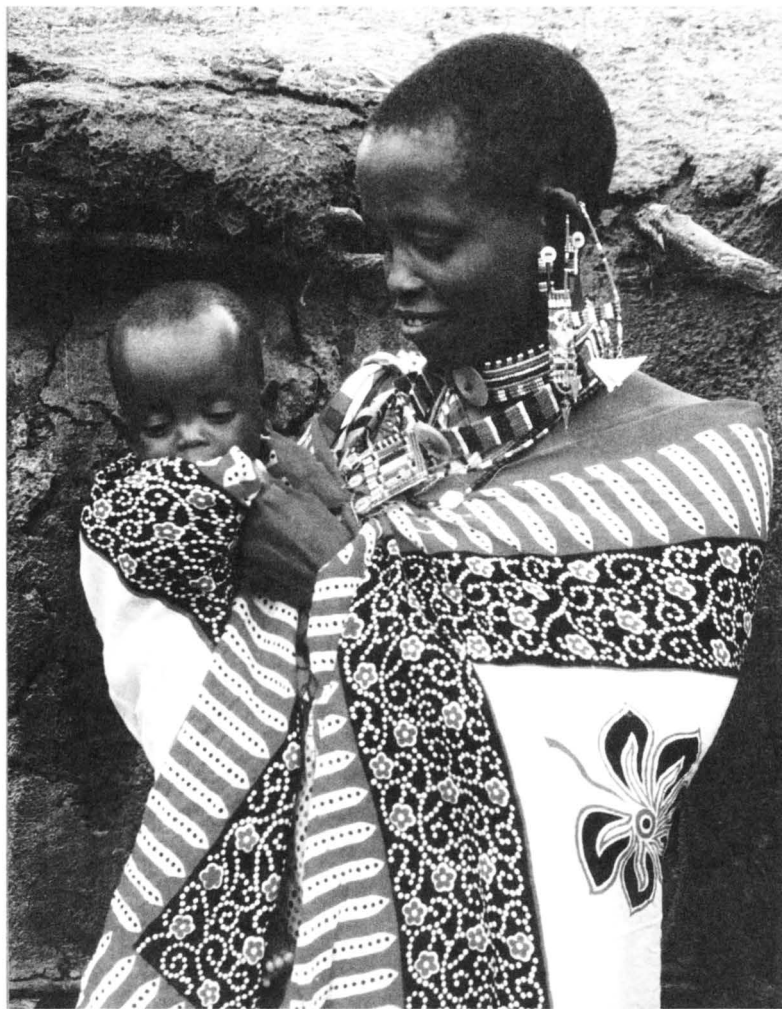
(*Kenya: A Lonely Planet Travel Survival Kit*)

對許多在東非從事救濟工作的人來說，奈洛比是他們度假的地方，當我們沒有水用、電話不通、電力不足、吉普車陷入黏黏的泥土中，或者一名食物中毒者來見我時，我真的很難了解他們的觀念。

這類訪客之一便是莫琳修女（Sister Maureen），許多勇敢的澳洲修女在烏干達北部難民營中與耶穌會難民中心人員一起工作，她是其中一位。她有絕佳的幽默感，對生命總是抱著積極的態度，她在烏干達的工作中，這兩者常常受到考驗。她由奈洛比返回工作地點後不久，她本人、其他兩位修女、與她們一起工作的三位康伯尼傳教會（Comboni）神父，就在烏干達北部他們的會院裡，以捏造的罪名，即是他們煽動性的言論，被蘇丹人民解放軍綁架了。這六位天主教傳教士被指控「散播伊斯蘭教義」。他們被關了一個月後獲釋。

有一個星期，我開車帶著莫琳修女和來自美國波士頓的院長到叢林裡去。

為第一次來到奈洛比的訪客發現叢林如此靠近城市，是一



距離城外幾公里，經過翠綠的恩貢山，許多馬賽族的村落散布在乾燥的平原上。我的朋友馬克·布朗在奈洛比南方的卡賈多區（Kajiado District），住在一個馬賽族的家庭，拍了這張照片。

件令人驚訝的事。向南或東南開車三十分鐘，我們便到達一片乾燥的野地，真像《國家地理雜誌》的畫面躍入眼簾一般：寬廣、黃色的平原上點綴著矮小有刺的草叢；延伸數英里的大草原；禿鷹在空中盤旋；一大羣斑馬和黑斑羚羊躺臥在遠處的地平線上；疣豬家族；成羣嘶吼的狒狒；偶爾出現的長頸鹿。

距離耶穌會會院幾公里外，經過翠綠的恩貢山，我們來到我所謂的「馬賽鄉間」，無疑的，這名稱並不正確，但是，沒有比這更恰當的名字了。從公路上，我們可以看見馬賽族村莊都擠在山谷中，低矮的泥巴茅草屋被有刺的草叢包圍著。雖然東非人民仍然畏懼馬賽族人的武士傳統，但是，基本上他們卻是以牧羊為生的族羣。最年幼的男孩看守綿羊，次年幼的看守山羊，最年長的看守其他牲畜。有一次，我發現一個很年幼的馬賽族男孩穿過平坦的田地，在追一隻綿羊，當他跑動時，他身上的格子披肩<sup>19</sup>不停地飛舞著。我想起《瑪竇福音》中有關善牧的記載，那位好牧人放下其他的羊，而去尋找走失的那一隻。我想，假如天主藉這名馬賽族小男孩堅持跑過大草原追趕一隻羊的實例，來說服我們，那麼，人類也不必擔憂太多了。

我們三人在顛簸的路上愉快地前行。我指著不同的地形、

---

19.許多馬賽族的男人或女人都會穿這種傳統的披肩，希瓦希里語念作「skuka」。

以前，披肩的材質以獸皮為主，有隱藏在大自然、形成一種保護的作用，後來歐洲人到東非從事貿易活動，馬賽人開始喜歡用色彩亮麗的花格子布當披肩，從腰間纏繞至肩膀，成為他們的傳統服飾。一般來說，男人穿亮紅色的披肩，女人穿寶藍色。





巨大的螞蟻冢、各種動物、談談悶熱的天氣等。我們注意到前面有一名賣首飾的馬賽族婦女。她招手要我們停車，我們靠邊停車，車輪捲起一堆紅色灰塵。

這名光頭的馬賽族婦女身穿傳統藍色的披肩，手捧著幾串項鍊，有一大羣蒼蠅圍繞著她，然後也在我們身邊飛來飛去。在她腳邊放著用芬達汽水瓶裝的蜂蜜，破碎的蜂巢漂浮在琥珀色的液體中。

我詢問項鍊的價格。她回答了，我轉動我的眼睛，想想我們雙手中心的價格。她露出稀少的牙齒，笑一笑。

莫琳修女看見這名婦女手臂上掛著的一串項鍊，看起來好像用褐色的葉子編成的，但是，很難辨認。當她和這名婦女討價還價時，我問她：「那是什麼？」她並不知道，但是，她還是繼續在談這筆交易。

「多少錢？」莫琳修女問道。

當修女和我的耶穌會朋友回到車上後，我問這名馬賽族婦女，項鍊是用什麼東西做的。她告訴了我。

當我按下煞車，轉動燙手的鑰匙時，莫琳修女讓我們看她戴在脖子上新買的項鍊。當車子發動時，她觸摸那些褐色的葉片說：「五十先令，不錯吧！」

「是啊，」我笑著說：「一件用乾燥蟑螂翅膀做成的產品。」

她尖叫一聲，扯下項鍊，由車窗丟出去。頓時許多昆蟲的翅膀在空中飛舞，之後，優雅地落在地面上。

當我們開車上路時，這名馬賽族婦女用英語說：「謝謝妳！謝謝妳！」

## 一千個綠色塑膠聖誕杯子

即使你只有一點東西，你也可以與人分享。

——盧千達諺語

烏塔和我共同工作了一年後，突然必須離開肯亞，因為她的丈夫在蒙巴薩開車時被一輛公車撞擊受傷，所以他們必須回德國接受治療。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指派一位最近來到奈洛比的德籍年輕耶穌會士麥可·休福（Michael Schöpf）接替烏塔的工作。我們兩人都很懷念烏塔，因為雙手中心的成功運作，烏塔功不可沒。難民也想念她，每天不停地問道：「烏塔太太呢？」或「烏塔先生呢？」

日子就在美國大使館經常性的義賣和我們在觀光客與修會團體中不斷增加知名度中度過，雙手中心開始有了驚人的業績。上半年我們的營業額超過美金五萬元，這在東非是一個天文數字。當然，我們把收入用來購買更多難民的产品。一些行政費用，以及麥可、我和兩位肯亞助理的薪資是從救濟機構捐給我們的經費中支付。從慈善機構獲得經費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因為東非，尤其是美國涉入其內的索馬利亞危機，經常出現在新聞裡。我們大部分的捐贈是來自天主教福利機構，常常也有來自西歐的半官方機構及日本的捐助。



聖誕晚會前幾小時，我見到一名性情溫順的莫三比克難民湯姆，他是一位手工藝家。如同許多其他難民一樣，在接受我們的幫助之前，他已經開創了自己的小型事業。照片攝於雙手中心陽台上，湯姆（右）展示他用桃花心木雕刻的花紋複雜的椅子。

雙手中心開辦半年後，我們竟然有少許盈餘，這些錢都是善心人士主動捐贈的，因此，麥可和我決定為難民開一次聖誕慶祝會。總之，這些盈餘也是他們的錢，我們商店的目的並不在於營利，而是要幫助難民自己能賺錢。



我們為這次慶祝會向麵包店訂了幾個大蛋糕。由於要有三人以上的員工共同完成我們的訂貨，因而在麵包店裡經常引起爭執，其爭執的內容主要都是關於工資以及誰工作勤勞、誰偷懶這類的問題。此外，更大的困難便是無法獲得足夠的材料：常常買不到麵粉；用來包麵包的塑膠袋突然從店裡的架子上不翼而飛；如果麵粉和其他材料都有了，卻又缺少烤箱用的瓦斯，因為每三個月，當地政府經營的瓦斯公司總有幾天休業。因此麵包店被迫歇業，婦女的收入突然中斷。

調解完他們之間的問題後，麵包店便可以再度營業，把麵包賣給當地的盧安達人，並按照不同修會的訂單送貨：耶穌小姊妹會每週三條；瑪利諾會修女五條；西克馬神學院三十條；各個耶穌會難民服務辦公室十條。所有的麵包都用公車送達。這些白色、黃色或兩種混合的麵包都美味無比。送貨到家要付額外的費用，比送貨到市場貴一些。

我們已經為難民開辦每月一期的「如何經營商店」課程，內容包括會計、行銷和管理。最困難的便是如何按成本來為商品定價。難民為自己商品的定價常常低於他們購買材料的費用，他們從不了解為何他們總是賠錢。在一次課程中，我向麵包店

的女老闆柯卓絲解釋蛋糕的定價需要計算每顆雞蛋、每杯麵粉、每杯糖的價格，如此，她的麵包店才不會賠錢。

上完課之後，柯卓絲決定她的蛋糕售價應該是五百先令，相當美金十元，這是不合理的價格，幾乎相當於兩周的房租。為了不要與她爭論，我繼續訂購她的蛋糕，即使她不是世界上最精確的會計師，但我認為她會善用這些錢的。

十一月底，柯卓絲送給我們辦公室一個蛋糕，她說，她從自己的小日曆上看到，那天是美國人的感恩節，當她把熱熱的蛋糕遞給我時，她說：「所以，我今天也要謝謝你，修士！」



我們在窗戶上貼了要舉行聖誕慶祝會的告示，誠如我們所有的告示一樣，它用了六種文字：英文、史瓦希里文、法文、肯亞文、盧干達文和阿姆哈拉文。我們商店的窗戶很快就成為難民的布告欄。同樣的，我們的陽台也成為他們聚集和交換新聞的地方。每天早晨當我開車進來時，我總是因為看到這些不同種族的難民而感到高興，有些人常常藉由談論自己國家的事，抒發內心的不滿。

有時候只有幾名難民來到雙手中心，例如雨季時，對於那些在陽台上等候的難民，我為他們感到難過。有一天，我在聖若瑟教堂辦公室裡注意到他們出售各種各樣的廉價書籍，我買了一本英文和史瓦希里語對照的聖經，把它放在我們中心的板凳上。第二天，我看見一名烏干達婦女聚精會神地閱讀這本聖經。中心的板凳上常常放滿了各種語言的聖經、聖人故事、史

瓦希里語和法文雜誌、兒童著色本和蠟筆，以及幾本防制愛滋病的手冊。雖然不少耶穌會士提醒我不要把新書放在板凳上，但是，這些書籍仍然原封未動地躺在原處。當我提到這事時，艾麗絲說：「噢，修士，沒有人會偷你的聖經！」

聖誕慶祝會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或許，這也傳得太快了吧！一名難民告訴我說：「城裡所有的難民都要來！」我知道，這可能是誇大其詞，但我開始擔憂，害怕我們預訂的蛋糕不夠。

慶祝會前幾天，一位耶穌會士安吉羅打電話給我。安吉羅是一位精神科醫師，他在凱倫城裡創立一個愛滋病兒童中心，該中心取名「Nyumbani」（史瓦西里語，意為「在家」），這中心距離當地的耶穌會避靜院僅僅幾百公尺之遠。

安吉羅在電話中間我要不要一位捐贈者捐給他的一些東西。我問，是什麼東西？

他吸了一口氣說：「一千個塑膠杯，五百個塑膠盤，五十個方形塑膠罐以及二十個水桶。」

做決定一點都不困難，我立刻回答：「要！」任何難民，尤其是開餐館的衣索比亞家庭非常樂意拿到免費的塑膠盤。五個開髮廊中的任何一個也會高興地用這些水桶裝水。至於那些用來裝汽油和水的方形塑膠罐，也會很快被拿走。因為我知道，沒有一個難民的家裡有自來水。一千個塑膠杯很容易就分送了。在肯亞任何東西都很容易分送出去，因為人們擁有的實在太少了。

我們決定把杯子當作慶祝會的禮物，分送給大家。

那天下午，麥可和我開著吉普車到安吉羅的愛滋病兒童中心。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留著短短白鬍子、光頭的安吉羅跑來

迎接我們。「感謝天主，你們來了。那些討厭的紙箱占去我們太多的空間！」他說。當我們交談時，一些幼小的孩子拉扯著他的腿。

安吉羅領我們到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去，疊了七英尺高的彩色塑膠盤旁放著一大堆綠色塑膠水桶和黑色方形塑膠罐。「那邊是杯子。」他指著放在屋角的那個如同冰箱般的大紙箱。我思索著如何將這些東西裝進我們的吉普車內。

我們把盤子和罐子塞進車子的後座。但是，我們必須為那巨大的紙箱再來一趟。最後我們決定撕開紙箱，把一千個綠色塑膠杯直接倒進車子裡。當我們在崎嶇不平的凱倫路上顛簸前行時，數百個塑膠杯被彈起，飛到我們面前，打到儀表板上，甚至有些還飛出車外。我從後視鏡看見街上的人跑來撿取這些杯子。聖誕快樂！

幾天之後，三名衣索比亞人來找我。他們合開了一家餐館，取名為「藍色尼羅河」（在奈洛比的衣索比亞餐館都以他們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daba）來命名，或稱為「藍色尼羅河」，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支援兩家「藍色尼羅河」餐館）。藍色尼羅河團體高興地拿了六個水桶，還要求多拿幾個。其他難民團體渴望得到剩下的慷慨贈與。

當慶祝會愈來愈近時，難民開始詢問我，他們要穿什麼衣服，他們可以帶多少人來參加慶祝會。我多訂了六個蛋糕，並且考慮是否需要多訂幾箱飲料。一名難民用力點頭說：「是的，我們會非常口渴。」在其他事務上，他們也提出建議。

「修士，你會放音樂嗎？」高蒂有一天問我。我說我沒想

到，她很驚訝地看著我。

「我想，我可以去找一台錄音機來放音樂。」我小聲地說。高蒂報以微笑地贊同。

12月15日，慶祝會當天，天氣晴朗。雖然我們公告慶祝會在下午二點開始，但是，中午就有難民陸續來到。大部分的難民無所事事，何不早點來呢？他們利用中午時間在陽台上看看書，翻閱雜誌，逗孩子玩，編織草籃子和草席，講故事或彼此談笑。

我很快發現，這裡的慶祝會和美國不同，在美國的宴會中，有服務生為賓客服務，而那些賓客可能已經吃過早餐或午餐，麥可和我今天服務的對象，基本上，他們從未飽食過一餐飯。因此，十二個大蛋糕瞬間消失，三十箱飲料轉眼便蒸發了。約二十人一小組的團體在後院席地而坐，聊天，甚至以十多種不同語言歌唱。我想要加入他們，但是，大部分時間我都在不停地打開一瓶一瓶的飲料，用餐巾紙包著一塊一塊的蛋糕遞給他們。

看到難民如此快樂，我心中也非常愉悅。大部分難民很少有機會放鬆自己，他們在奈洛比常常遭到非人的對待，無論是來自鄰近的肯亞人警察、或甚至救濟機構，在那裡他們必須排隊等候數小時。他們的生命中從未有人為他們舉辦過慶祝會。

一個衣索比亞的家庭來到我面前：丈夫吉貝西、妻子和三名子女。吉貝西太太用衣索比亞的白色棉布縫製美麗的襯衫和洋裝，並以五彩的線繡上圖案。她也縫製具有衣索比亞風格、彌撒禮儀中司祭使用的領帶，而精緻的十字架圖案，尤其吸引那些來中心訪問的法國籍神父。吉貝西則用木板和經過特殊處





理過的皮革製作凳子。他說他什麼都會做，並且常常問我，我們中心是否在找尋新產品。有一天，我在鎮上的市場看見一個具有衣索比亞風格的金屬小十字架，它常常被用來當成家中的吊掛物或裝飾品。我問他會不會做這種東西。他說：「是的，修士，我會做！」但是，我欣賞的那個十字架是以錫或銅製成的，我帶著疑惑的口吻問他是否可以找到相同的材料。

「修士，這**很簡單**！」他說。

幾天之後，他拿來一個用空飲料罐當作材料做成的十字架。我不想拒絕他，就買了這十字架，但是，我說我更喜歡他製作的凳子。

他和家人以正式的衣索比亞方式感謝我為他們舉辦的聖誕慶祝會：和我握手時，以左手托住右手的手肘，同時深深鞠躬。他們還用衣索比亞的阿姆哈拉語「Ahmasegenalahu」向我致謝，這是很喜愛的東非文字之一，當一名衣索比亞人摘下帽子時，我使用這個字。說這個字時，要把舌頭捲成像彈珠一樣，很有趣。

「你們離開之前，我要給你們聖誕禮物。」我說。我走進屋內，拖出沉重的紙箱，拿出三個一組的杯子。麥可、維奇妮和我在慶祝會之前花了幾個小時，將每三個杯子綁成一組，每個家庭拿到一組，至少，這是我們所計畫的。在每一個杯子裡面，塞一張印有六種文字的聖誕祝福卡。

當我們發給他們綠色塑膠杯時，他們的眼睛都亮了，在後面的幾名難民也睜大了眼睛。吉貝西和他的家人再度向我鞠躬致謝。

立刻，一羣難民湧向我，問道：「修士，那是什麼東西？」

有些人站起來問：「那是什麼？」「這是什麼？」我必須要向他們說明。

「我們很高興送給你們每家三個塑膠杯當作聖誕禮物。」我說。

在這個極端混亂吵雜的地方，許多難民高舉雙手向我們衝過來。

「等一等！」我大聲喊道：「你們要走時，我們才發給你們。」

「我們要走了。」他們異口同聲說。

於是，我們三人將數十組杯子發到每雙伸出的手裡，令人失望是，我看見有些難民竟然自己從紙箱裡拿杯子。

「每個人都有！」我在一片喧鬧聲、塑膠杯碰觸聲和紙箱撕破聲中大喊道。「等一等，你們都會拿到的！」

但是，無濟於事。眼前，處處都是杯子。我的挫折感油然而生。

「好！」最後，我高聲說道：「大家都坐下，好嗎？」

他們停止喧嘩，眼睛瞪著我。

「請坐下！」

漸漸的，每個人都坐在草地上了，有些人抱著他們的杯子。

我以史瓦希里語對他們說話，但是我愈來愈緊張，最後還是用英文。我說：「看，我們有一千個杯子，我們這裡大約有二百人，所以，有**足夠**的杯子發給你們。請放心，好嗎？」

我繼續說：「現在，我要把杯子發給還沒有拿到的家庭。請問，誰已經拿到了杯子？」

沒有人舉手。



我語氣平和地說：「我知道我們已經發了大約一半的杯子，也就是說，你們大部分的人都已經拿到了杯子。拿到的人請舉手。」

「修士，她有杯子！」一名難民指著別人說。

這實在把我們弄糊塗了。

「拿到杯子的人請舉手。我們還有**許多**杯子。」我說。

一大羣人中間只有幾隻手舉起來。我的挫折感愈來愈大。我聽見自己很自然地脫口而出：「好吧，我可能不知道誰拿了杯子……但是**天主**知道！」

突然間，他們熱烈鼓掌，似乎很高興聽見那句帶點神學意味的話。我不能確定是我最後面對這種場面時無計可施的窘態，或是我的機智讓他們覺得高興，可能兩者都有一點，總之，他們都高聲歡呼。

「對了，修士！」「萬歲，吉姆修士！」「吉姆修士是**對的**！」「天主會找出那些杯子的！」似乎找到了答案一樣，他們全體都高高舉起雙手。

我把剩餘的杯子發給他們，至少還剩下五百個杯子。

每一個人緊緊抓著他們的杯子，高興地走了。「修士，聖誕快樂！」

大家都離開後，麥可和我對這次的慶祝會大笑不已。無庸置疑的，我們應該明白這些難民長年都留在**物資缺乏**的難民營中，他們必須不顧一切地為自己家庭奮力奪得所需的東西。我深知難民營中的狀況，也目睹缺少糧食和生活所需的情形。我完全了解他們的反應；麥可和我都認為，假如我們處於這種困難或極端貧窮的狀況中，我們也會做出同樣的事的。

下一週我們把當天拍的相片沖洗出來。難民很喜歡拍照，因此，我把相片貼在雙手中心的大展覽室裡。其中一張是烏干達難民撒慕爾的相片，他滿臉笑容，手臂環抱著他的三個年幼兒子。他的手裡一共拿著十四個杯子，我真佩服他的厚臉皮。

有一天，撒慕爾來了，指著那張相片說：「修士，你可以把這張相片洗一張給我嗎？」

「撒慕爾，」我嚴肅的說：「你在這張相片上看到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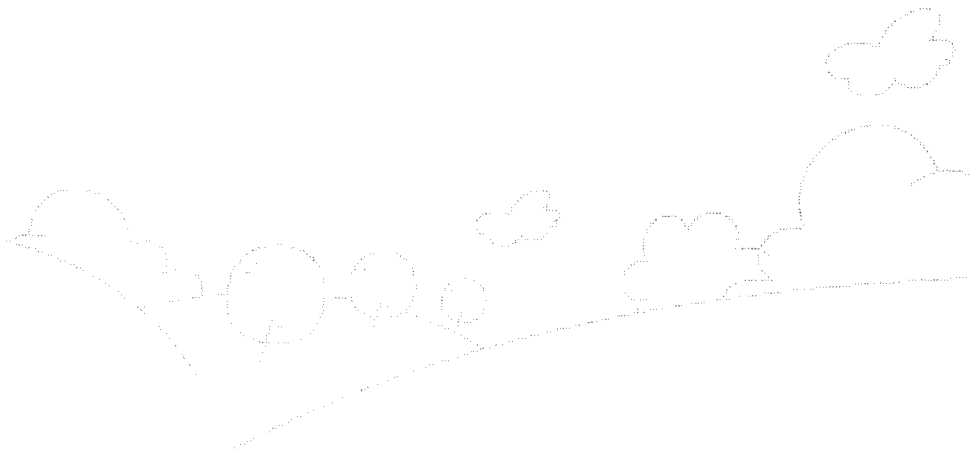
「我在你辦的慶祝會上玩得很開心，修士。」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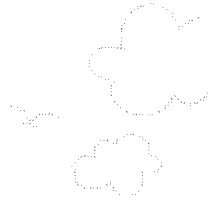
「你也拿了十四個杯子，當天的規定是每個家庭只能有三個。」

「啊，那是我替朋友拿的。」他毫無愧疚地說。



聖誕節過後不久，我拜訪一個難民家庭。在她那僅有一張桌子的狹窄木屋裡，三個綠色的塑膠杯子卻顯著地占有一席之地。這種在家裡不起眼的東西，或者甚至被丟棄的塑膠物品，在這裡卻受到如此的重視，想到這一點，真令人傷感。我很高興我們能將這些塑膠杯子送給他們。她注意到我在看這些杯子，面帶笑容地說：「我真喜歡我的聖誕節杯子。」





## 我們的招牌菜

在所有農產品中，畫眉草穀類（*Eragrostic teff*）是最受到旅客青睞的，並在高原的食物中占有傲人的地位。這種穀類生長在廣大的高海拔地區，對衣索比亞而言，它是極為獨特的，遠超過該國人民對食物的概念，用它來做成獨特、薄的、已發酵的衣索比亞麵包（*enjera*），常常是貴賓桌上的佳餚美饌。

——詹姆士·麥可恩（James McCann）

《民之犁：衣索比亞的農業》，1890-1990

（*People of the Plow: Ethiopian Agriculture*）

開餐館對衣索比亞難民而言是普遍的計畫，我們在奈洛比的偏遠地區協助他們開了三家小型餐館。每家餐館都生意興隆，這還得感謝那些住在奈洛比貧民區裡的數千名衣索比亞難民呢！耶穌會難民中心幫助一名會做衣索比亞麵包的婦女，她用一種類似小米的穀類，加以發酵，烘焙出好像薄鬆餅的鬆軟麵包，這是衣索比亞人的主食。莎拉在她的小屋中工作，從來不缺少顧客。

新開張的一家餐館叫做「阿迪斯阿貝巴」，距離奈洛比的耶穌會會院不遠，由三名衣索比亞兄弟和一名姊妹合開。他們四人經常與房東爭吵不休，並問我是否可以與房東談談。他們

告訴我：「我們猜想她可能吸毒。」我很驚訝地發現她竟然是一名來自北卡羅萊納州（North Carolina）的美國人。她穿著一件粉紅色浴袍站在她的平房門前見我，並且高聲尖叫說她要把「那些該死的衣索比亞人」趕走。她說，他們太吵了。

當我轉述房東對他們的批評時，這三名兄弟翻白眼無奈地說：「是她在吵呀！修士！」對於這點，我毫不懷疑；據我所知，衣索比亞難民極有禮貌，講話總是輕聲細語的。我很難想像這四個人或他們的顧客會大聲喧鬧。

這名房東見過他們的白種保證人之後，勉強同意延續租約，但是要調漲房租。事後，麥可和我受邀與他們一起吃飯。奈洛比的衣索比亞餐館價錢公道，你通常可以享受一頓絕佳的美食，只要你不點羊肉，因為在肯亞，羊肉堅硬難咬，臊味燻人，無法下嚥。

我們到達時，三名兄弟和他們的姊妹在餐館外列隊歡迎我們。他們深深鞠躬，擁抱我們，帶領我們進入餐館，屋內的空氣中飄著紅豆泥的芬芳香氣。他們在矮木頭桌子側面放了兩張小凳子讓我們坐，請我們喝由發酵蜂蜜製成的淡淡蜂蜜酒，然後遞給我們用阿姆哈拉文手寫的菜單，共有七樣主菜。我請他們翻譯給我們聽。

「今天我們的主菜有限，修士。」其中一位兄弟抱歉地說。

「這是羊肉，」他很自然地指著第一種主菜說。

「羊肉，」他指著第二種主菜說。

「羊肉，羊肉，羊肉，羊肉，」他依序念完菜單上的每一種主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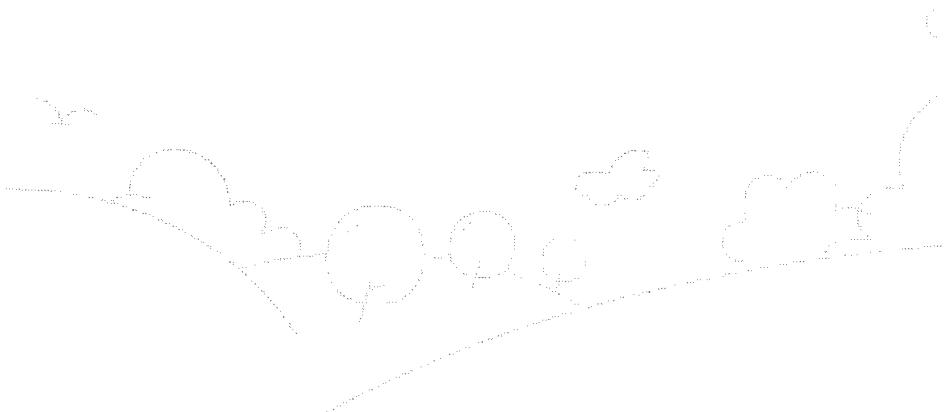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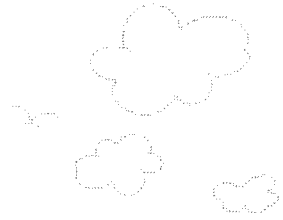
麥可和我對看了一下。還有一樣主菜。

「這是什麼？」

「啊，是我們的招牌菜，修士。」他露出燦爛的笑容說：

「羊腸子！」





## 阿朱馬尼

除非你親眼目睹，並且步行、騎馬或乘坐馬車穿越  
非洲大陸，否則你無法了解它的遼闊。

——艾絲佩絲·赫胥黎 (Elsbeth Huxley)

《錫卡的鳳凰木》

(*The Flame Trees of Thika*)

聖誕慶祝會之後的聖誕節義賣會確實令人欣慰：我們架子上的貨品售出了一半。雙手中心終於在奈洛比名聲大噪，但是也使我們疲憊不已，因為難民聽說我們賣出了許多不同貨品後，他們就知道我們需要買更多的東西放在架子上，所以在以後的幾週內，來到中心的難民人數暴增。有一天，當我們看見有五十名難民來中心後，麥可建議我們應該休假一週，到烏干達北部走走。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的人員在阿朱馬尼鎮 (Adjumani) 附近的難民營中工作，他們不停地邀請我們去探訪他們，但是都未能成行。

短短幾天的休假是很受歡迎的；我們度過一個繁忙又豐收的聖誕季。此外，這將是一個對那些長期住在難民營中的難民進一步了解的好機會。這趟旅程的誘人之處也在於它遙遠的路途。例如，前往康培拉二十六小時的火車車程，聽起來確實頗具冒險性，也是我想像中最長的火車旅程。我察看掛在牆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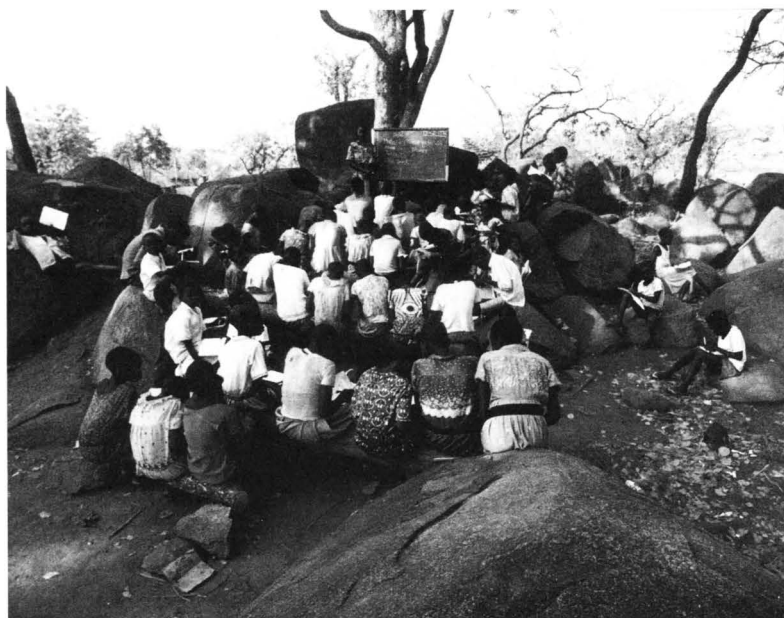




非洲大陸地圖，我們將經過各種不同的奇特地形：東非鐵路經過奈洛比貧民區蜿蜒而行，穿過東非大裂谷，爬過涼爽的高原茶葉種植區，跨越尼羅河，最後來到康培拉。此外，乘火車比搭飛機好，因為在東非，飛機既危險又昂貴。

由於肯亞、烏干達和坦尚尼亞之間緊張的情勢，這條奈洛比-康培拉的鐵路曾經停駛將近二十年。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烏干達前任總統阿敏的阻止。而今阿敏已流亡國外，這個被探險家史坦利爵士（Sir Henry Morton Stanley）稱之為「非洲之珠」的烏干達，已由一位開明的總統穆塞維亞（Yoweri Museveni）所領導，至少他盡力使國家走上安康的道路。幾個月前，《國家日報》報導阿敏目前流亡於沙烏地阿拉伯。報上刊登了他的照片，這位身穿白色長袍，正在祈禱的穆斯林，仍帶有昔日的威嚴。他在報導中說道：「我現在非常虔誠。」但是，不知是阿敏或是東非政客使這條奈洛比-康培拉的鐵路從 1970 年中期開始停駛。然而，目前在肯亞的報紙上卻登著大力宣傳這條路線重新行駛的廣告，因此，現在似乎是前往烏干達的最佳時期。麥可和我很奢侈地買了頭等艙的票，我們可以擁有一間狹小的雙人坐臥兩用房間。

出發的那天早晨，我們在路邊等候開往市中心的公車。超載的公車終於發動了，噴出大量有害人體的柴油廢氣，車上播放著以吉他彈奏的輕快流行音樂。每一輛公車側面都印上自己的名字，許多名字都反映了對美國或非裔美人文化的一知半解。就像我每天開車前往雙手中心的路上，都塞在「麥可·喬登」（Michael Jordan）或「絕地戰警」（Bad Boyz）等這類名字的後



我在阿朱馬尼時看見幾所這樣的戶外學校，他們的老師都由烏干達北部的耶穌會難民服務人員培訓。（照片提供 | Michael Coyne, courtesy JRS）

面。我們出發的那天早晨，搭的是「Two Live Crew」（美國著名的嘻哈歌手）公車。麥可和我擠在提著一隻雞的男子旁邊，我們前面是一名馬賽族的男子，他長長的耳垂纏繞在耳朵的上方。車掌向每人收六先令的車費。

我之前只到過舊的肯亞火車站一次。車站一如殖民時期沒有改變，就如在影片《遠離非洲》一樣，一列精緻的老式火車停在米色柱子的陰影中。

在月台上等車時，麥可和我與手持車票的乘客閒聊。唯有最富裕的肯亞人才有能力搭火車，因此，所有乘客都興奮無比。有人問我們要去哪裡？我回答：「康培拉」，他贊同地說：「很長的路程啊！」

那時，一名令人好奇的年輕人從我們面前走過，看上去似乎是一名歐洲或美國人。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名馬賽族人或武士的樣子：白種人的直頭髮被梳成一排排辮子，單薄白色的肩膀上掛著一塊馬賽族的紅披肩，一根用來打鬥的棍子<sup>20</sup> 鉤在他的皮帶上，腳上穿著用舊輪胎製成的廉價橡膠涼鞋，一切的裝扮就像一名馬賽族男人。我真不知道我的肯亞朋友會說什麼。總之，許多西方傳教士很渴望做到「本地化」，他們以學習當地語言、了解當地風俗習慣、吃當地食物的方式使自己融入當地文化，如此他們更能了解他們所服務的人。這是一個令人景仰

---

20. 是一種長二英尺、打鬥用的圓頭棒，希瓦希里語念作「rungu」，通常用皮繩或環帶綁住，方便攜帶。

的目標，藉此克服西方文化中殖民者的優越感。對這種觀點，我可以安心接受。但是，這些作法是否「太」本地化了呢？

我用史瓦希里語大膽地帶著諷刺的意味說：「看，一名馬賽族人。」

「啊，」其中一人說：「可笑！」其他人則大聲爆笑。關於本地化，我記得曾經有個難民問我：「修士，這些想要成為非洲人的美國人，難道忘記他們自己是誰了嗎？」

停駛了二十年的火車顯得有些陳舊。在處處都是污穢和鏽蝕中可看到重新油漆過的地方，而七〇年代樣式的住宿設備卻嶄新耀眼。在我們狹窄的房間裡，拉下兩個金屬架子便是兩張單人床。塑膠桌面上有一個隱藏式的小水槽，斷斷續續的水由水龍頭裡流出。二等艙裡有一排排舒適的座位，相似美國的通勤火車。最後是多數旅客乘坐的三等艙，那裡放著一排排木頭硬板凳。

火車搖搖晃晃地駛出了奈洛比，古老的蒸氣氣笛聲劃破了清澈炎熱的空氣，由三等艙傳來響亮的歡呼聲：「走，走，走！」

人們把自己懸掛在大窗戶的外面。火車緩緩地在奈洛比市區內繞行，讓我們看見這城市的另一面：辦公大樓污穢的背面，他們的窗戶大開，骯髒的窗簾被風吹起，好似飄揚在空中的舊手帕；鐵軌兩旁盡是殘破瓦礫；大片烏雲聚集天邊，表示會有一場午後陣雨。

幾分鐘後，我們進入奈洛比的貧民區，此區占有該城四分之三的面積。數不清的簡陋木屋用泥土固定著，在我們眼前綿延到奈洛比水庫的周圍，水庫是這城市用水的來源，給水系統



有時會通到奈洛比較為富裕的區域。裊裊白煙由居民烤玉米的地方升起。洗過的衣服晾在房子與房子之間的繩子上。路上隨處都有漫無目的走動的人。三等艙的旅客不停地由車上對著沿途貧民區的居民大呼小叫，也有居民從自己的房屋裡跑出來對著火車喊道：「哈囉，火車！」

我們安頓好房間之後便來一次列車巡禮。走道好似公車一樣，擠滿了人，他們身體都斜靠在窗口外，這是極為危險的，火車的煙囪噴出大量的煤灰，使每件東西上面都蒙上一層黑灰。我注意到，我們兩人是車上唯一的白人。

列車長來收票，向我們說明用餐的時間。三餐用餐地點都在餐車。有人會在用餐前敲響鐘聲，報告用餐時間。一對烏干達夫婦路過我們的房間，問我們是否到過烏干達。這是他們前往坦尚尼亞狩獵旅行的最後一段旅程。他們問我們是否願意和他們一起共進晚餐？一名路過的肯亞男子驚訝地看見兩名白人<sup>21</sup>在車上。他問：你們前往何處？大部分的旅客都是去烏干達拜訪親戚的。

我們眼前突然出現一片廣大的平原，這是由北到南貫穿東非的一條狹長地帶——東非大裂谷。這條狹長地帶是許多人想

---

21. 很難找到「mzungu」這個字的來源，最簡單的定義就是「白人」。有一本英國出版的字典將它定義為「聰明的人」(clever person)，我覺得充其量只有「慷慨」之意，最壞就是「自私自利」的意思而已。有些肯亞人告訴我，這個字是「繞圈子」的意思，它不只是指英國的交通狀況，也指西方人的思考模式。

像中的東非景象：一望無際、平坦的乾燥平原，無數的瞪羚躺臥在遠處。當然，就是這景色吸引了二十世紀初期那些大膽的鐵路旅客來到這裡。誠如查爾斯·米勒在他的作品《瘋狂特快車》中所描述的誘人景物：

為了要飽覽世界上最廣闊的保護區裡的各種動物，不怕那從火車頭煙囪噴出、大量火紅滾燙的煤炭灰餘燼，旅客不顧一切地爬到車廂頂上去……當火車駛過時，最靠近鐵軌的斑馬可能會抬起頭來看一看，卻又立刻低下頭來，若無其事喀吱喀吱地吃草。

服務生來到我們房間門口，問我們想要什麼食物。他的衣服是英國禮服（白色短外套及白色長褲）和非洲服裝的混合體（外套和長褲都很破舊，透過他穿的塑膠涼鞋可以看見一雙骯髒的腳）。

午餐時間到了，麥可和我來到餐車，這時火車正爬上奈洛比北部栽種茶葉的高原地區，火車愈爬愈高，車身左右搖動。火車在蜿蜒的山路上減速慢行。

我們對面坐了一位高貴的肯亞紳士。硬挺的白色桌布上擺著沉重的銀質餐具和有缺口的瓷盤子，所有餐具上都印有「東非鐵路」的標記，日期從殖民時期的年代開始。我們閒話家常了一會兒，就開始討論菜單。有義式番茄白酒燉雞和咖哩雞兩種選擇，再配上肯亞的傳統主食「ugali」<sup>22</sup>和「sukuma」<sup>23</sup>。

「火車上的食物如何？」我試探性地問：「你覺得還可以吃



嗎？」我想，假如在奈洛比都很難找到像樣的食物，那在火車上就……

「其實已經不錯了！」他說。

麥可滿臉疑惑。

「我應該知道的，」這位紳士笑著說：「我是肯亞鐵路局的衛生檢察官。」

這位官員所說確實是對的，因為價格合理。「下次你們可以點咖哩雞，」他邊說邊大口吃他點的餐。「食譜是我太太給他們的。」

奈洛比-康培拉火車每週只有一班，因此，對火車經過的那些小村落而言，我們的來到真是大事一樁，當火車經過時，赤腳的孩子便衝出他們的小屋，用東非的語言對著我們大喊：「Mzungu！Mzungu！Mzungu！」

有關「Mzungu」這字的解釋有許多種。史瓦希里語將這字解釋為交通上的繞道而行。當地原住民發現英國人的新措施並不尋常，因此，他們開始用這字形容他們。（之前，一名奇庫尤族婦女告訴我，從好的一面來講，「繞行」這個字也指西方人的思想模式。）同樣，這個字也描述任何一種西方的語言。有時我聽見農村的肯亞人民用這個字，表示他不會說這些話。

---

22. ugali 是肯亞人的主食，就是把白玉米煮成糊狀，濃稠像蛋糕的樣子，吃起來像義大利式的麥片粥一樣。它通常是熟食，和 sukuma 一起吃。

23. sukuma 是肯亞的國民菜，是用當地的綠色葉菜類，如甘藍菜之類的蔬菜，和切片的番茄和洋蔥一起炒。通常搭配著 ugali 一起吃。

我想，這個特殊的名詞正好回答那些問我「非洲話」是否不易學習的西方人了。

當火車爬上肯亞高原時，氣候也相對涼爽多了；新鮮乾淨的空氣超出我的預期。艾弗林·渥夫在他的著作《遠方的人》中，詳細描述他在 1930 年代時遊歷英屬東非的情形，他寫道：「幾乎每天烈日當空，陽光強烈；與晚上柔和清涼的月亮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一片耀眼翠綠的田野如波浪般地在我們面前展開，無數的採茶人彎著腰在這一望無際的茶園採茶。火車繼續爬向更高處，來到常綠喬木地帶。麥可說這裡很像德國的巴伐利亞（Bavaria），而我想到美國緬因州（Maine）或阿爾崗金印地安人地區（Adirondacks）。

晚餐後我們回到小房間時，發現座位上的白色套子已經換過了。我們準備就寢時，窗外一片漆黑，星星布滿了夜空。

半夜，我們進入烏干達邊境，服務員大喊：「托洛羅！托洛羅！（Tororo）」並把我們搖醒。關於火車進入某國的邊境時，至少在歐洲的經驗是，先將我們的護照交給服務員，當我們在睡夢中時，他已經辦妥了入境手續。然而在東非，所有乘客必須起床，下車，在寒冷的黑夜中排著長長的隊伍。一名繃著臉、睡眼惺忪的烏干達官員在我們護照上蓋了一個淺紫色的三角印章，說：「托洛羅，烏干達。」火車開動了，我們回到床上，在它平穩的晃動中再度入睡。

早晨，我們拉上窗簾，擋住刺眼陽光。我們看著高大的綠色植物在炎熱的微風中搖動，任何方向放眼望去盡是紙莎草花，





其細長的莖在沼澤地搖擺著。火車經過鄉村，成羣的烏干達兒童追趕火車時，阿敏統治時期留下的劫後景象便彰顯無遺了。電線桿——其實就是樹幹——孤零零地豎立在鐵軌兩邊，電線則垂掛在旁邊。東倒西歪的破舊房屋牆上滿是彈孔。這是「非洲之珠」啊！幾小時之內，我們經過了金佳的瀑布，這是尼羅河的發源地，英國探險家理查·伯頓（Richard Francis Burton）和若望·史比克（John Hanning Speke）在 1850 年代時發現了它。

細又高的植物以令人驚奇的姿勢在風中搖曳著。當服務員走過我身邊時說：「這是樹薯，」那是烏干達和肯亞西部的主食，並提著芬達汽水，那是這地區另一種主食。



康培拉比奈洛比還髒，更不是一座國際化的城市。誠如該國其他地區一樣，在阿敏統治及慘烈的內戰時期，這裡受到嚴重的破壞。以石頭蓋成的雄偉火車站布滿了子彈的凹痕，機關槍的掃射使四面牆壁都留下缺口。

三位耶穌會士來車站接我們，然後我們開車穿過塵土飛揚的街道，前往沙勿略會院（Xavier House），在那裡有十五位耶穌會士，他們在康培拉從事不同的福傳工作。有一位耶穌會士是醫生，他在馬克瑞大學（Makerere University）開辦的愛滋病診所服務，並從事病理研究。兩位初學修士在附近一家專門照顧愛滋病患的恩山比亞醫院（Nsambya Hospital）工作。雖然我未曾聽過愛滋病人集體被殺的故事，但是當你看見幾乎每條康培拉的街角都是製作棺材的店面時，必定讓人心生畏懼。幾乎每條街

道的兩邊都堆著簡單的木製棺材，甚至是十口棺材疊在一起。許多烏干達城鎮裡有無數的「愛滋孤兒」，這些孩子的雙親都死於愛滋病。

沙勿略會院與散布在東非各地的修會會院相似，是古老的修道院形式，房間都圍繞著中庭花園，花園裡有棕櫚樹、細長的玫瑰花叢、橘色的天堂鳥、青綠尖形的西波爾麻、蘆薈和九重葛。起居間、餐廳和大的圓形教堂（其祭台是一個巨型的烏干達鼓）讓這個會院完整無缺。在其他具有特色的東西中，他們以小花園中十四種不同的香蕉樹感到自豪，餐廳的草籃子裡常放著各式各樣的香蕉，供大家品嚐。餐廳桌上的陶瓷碗裡則放著大量的白色藥丸，供給團體成員服用，以預防瘧疾。

在康培拉旅遊已經過了一半，麥可和我決定要到火車站去買回程車票。有一個寫著「售票處」的房間，裡面空空的，只有一張寬大的擱板桌，桌上仰臥著一名身穿棉質大花洋裝的婦女，在上午時分呼呼大睡。

「對不起，」我說。

她抬起頭來說：「什麼事？」

「我們想要買下星期回去的票，」麥可滿懷希望地說。

「那是不可能的，」她一面坐起來，一面說。她揉揉眼睛，整理一下自己的衣服說：「我們要到下週二才賣。」

「開車前一天嗎？」

「是的，我們必須確定火車已經由奈洛比開出後才能賣票。」  
我們想了想，問道：「賣不賣預售票？」

一張餐巾紙被風吹過滿地灰塵的地板，飄落在她腳邊，她



拾起它來，然後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了她。她便把我的名字寫在那張餐巾紙上。

「你打算哪天要離開這裡？」

「嗯……讓我想想。」我看見牆上掛著一個印有前國家元首阿敏相片的月曆，我無法算出確定的日期。今天是星期二嗎？不是十五號嗎？為什麼十五號是星期三呢？最後我注意到原來那是 1975 年的月曆，它對我毫無幫助。所以我只說下星期二。

她記下日期，然後把那張骯髒的餐巾紙放進抽屜裡。她自信地說：「好，你已經訂位了。」說完便爬上桌子，翻過身繼續睡覺。

第二天我們準備搭機飛往烏干達最北部的阿朱馬尼。我們將搭乘由新教路德會專為傳教士、紅十字會人員、在這國家服務的聯合國工作人員所開辦的「航空宣教使團」（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通勤班機。人人都知道，搭乘這種小型的專屬班機是在烏干達境內往來各處的唯一方式。在那涼爽的早晨，我們乘坐小型公車前往飛行員的住處，他是英國皇家空軍的退役軍人，然後開往安特比機場（Entebbe Airport）。

我對能從安特比機場起飛真是興奮至極。在 1970 年代中期，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這裡劫持以色列班機失敗，而遭到以色列特種部隊突襲，成功救出所有人質。就算我已經忘記這事件，但肯亞電視台幾乎每個月都播放一次影片《突襲安特比》（*Raid on Entebbe*）呢！我向四周瞄了一眼，看看是否還留下當年的飛機，但是，我很快就把這個想法拋在腦後了。畢竟那是發生在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我們距離機場不遠時，令我們好奇的是看見一個漆著深綠色的高圍籬，使人看不見裡面有什麼東西。我由圍籬的縫隙中偷瞄到一架生鏽的飛機，孤零零地停在跑道上。當我們經過時，飛行員說：「啊，那是當年以色列留下來的飛機。」

飛機果然在這裡，就在舊航站旁，和電影中的一模一樣，機身上處處是彈孔；航站屋頂的坍塌處已經長出高高的棕櫚樹。「劫機事件後，他們無法將飛機移走，拆除航站又太昂貴，因此，他們就在旁邊修建另一個航站。」他指著那棟新而小的建築物說。

「什麼劫機事件？」麥可問道。

「哦，拜託，」我頗感驚訝地回答：「突襲安特比！」很明顯的，德國電視台不像美國或肯亞電視台那樣常常重播這影片。

當然，在安特比機場不檢查行李。我們下車直接走向飛機。唯一必經的程序是站在一個一般浴室用的小型塑膠磅秤上量我們的體重，以確定我們是否太重。對像我一樣厭惡搭飛機的人而言，這種簡陋的程序，實在無法帶給人信心。這架飛機的外觀也不起眼，只有狹小的五個座位，與停在跑道上的衣索比亞噴射客機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你很輕，」我們的機師說：「你可以坐在後面。」

我爬進小小的機艙，裡面看起來似乎更小、更簡陋，雖然如此，卻有毯子、地圖、罐頭食品、瓶裝水、急救包。機師遞給我一個保麗龍製成的野餐用小冰箱。

「這是什麼？」我問。

「血，」他說：「我們帶一些血給在薩伊（Zaire）的紅十字



會。」

我們要去薩伊嗎？

幾分鐘之內，麥可、我、一名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一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醫生、一名烏干達政府代表，全部擠進這架通勤小飛機，機師帶領我們做簡短的祈禱：「天主，請保佑我們一路平安，並順利抵達目的地，然後開始我們的工作，不要如同上次一樣，讓燃料箱掉落。阿們。」我希望天主一路看顧我們，尤其要看守燃料箱。飛機引擎發動了，其響聲真是震耳欲聾，飛機開始在跑道上晃動前行，讓我想起我的吉普車。突然間，飛機搖搖晃晃地飛起來了，越過一架衣索比亞航空的噴射客機、新航廈和已經損壞的以色列噴射機上方。往正下方觀看時，出現在眼前的是舊航廈當年被槍彈破壞的屋頂。

幾分鐘內，我們飛越了烏干達原始森林。「那就是蘆維洛三角洲（Luwero Triangle）！」機師指著那地區大聲喊說。在奈洛比的烏干達難民常常提到這地方。曾經約有一百萬巴干達族人居住在那塊地區，到了 1980 年代初期，他們被捲入內戰中。從 1981 年起，前後有五年，烏干達軍隊封鎖這地區，摧毀村莊，屠殺二十五萬人，其餘的人被驅趕到叢林裡或送到集中營。而眼前我們能看到的只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我們飛機的小片灰色陰影罷了。

雖然亞伯特湖（Lake Albert）的景色極為壯觀，但是我卻專注在我們的降落。此刻，我們的飛機發出咯咯喳喳的響聲。

越過薩伊（現在是剛果民主共和國）邊界便是第一個降落點，此處，我們卸下裝有血的小冰箱。「這裡便是降落跑道。」

機師高聲喊道。

在哪裡？我往下看，但是什麼也沒有。地面愈來愈近，飛機砰然一聲的落地，所謂跑道，便是我們降落的地方。背包、盒子、地圖都飛到空中。小冰箱裡裝的血流出來沾在我手上，只差沒有濺到天花板上。有一個人由叢林裡衝向飛機。機師說：「把血給我！」機師連引擎都沒有關，只將小冰箱交給那人，我們再度起飛。

不久，我們又飛過更多的森林、小塊農田和起伏的山丘。我們向著雲層飛去。機師大聲說：「我們正繞著雲層飛行！」此時，機身猛烈的搖動，空的飲料瓶在機艙裡滾來滾去。

經過一小時平穩的飛行後，我們到達阿朱馬尼。由於這鎮上沒有雷達設施，我們便在小鎮的上空盤旋，好讓我的朋友知道我們已經來到了。在遠遠的下方，我看見人們由屋裡跑出來，向著空中揮手，然後爬進了多用途越野車。我們的飛機緩緩降落在岩石地上。從乾枯的黃色草原吹來一陣極為乾燥的熱風。機師自言自語地說：「不錯，不錯！」

「我們為何繞著雲層飛行？」我試探性地問他。

「沒有雷達。誰知道雲裡有什麼呢？」他笑著回答：「鳥、飛機……任何東西都可能。」他心不在焉地說著，並且開始檢查他的飛機。

幾分鐘後，我們的朋友開著越野車來到。那位大膽的澳洲修女莫琳從車上跳下來，大聲說：「啊，真好，你們到了！一趟很辛苦的旅程，是不是？」

不久，我們抵達阿朱馬尼，它就如同我所見過的肯亞小城



鎮一樣，是一個很小的村莊。大片水泥建築物，鐵皮屋頂的商店，穿著破舊衣服的居民，在骯髒的街道上到處閒逛。

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靠近小鎮中心，四周築有矮圍籬。院子中間有一棟水泥小屋，其周圍有蘇丹式的茅草房。工作團隊修建了另一棟小屋當作辦公室，並裝設一台發電機，以供給一台舊電腦和一台短波收音機的電力，這兩項設備使他們能與康培拉的耶穌會團體聯絡。

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團體，由耶穌會神父、修士（澳洲、美國、衣索比亞）、修女（兩位澳洲籍、一位美國籍）、一位美國教區神父、一位德籍平信徒組成，他們住在一起，一同進餐，共同為在數公里外的蘇丹難民營中上千名的難民服務。這真是一個創新的修會團體生活。有些歐洲的耶穌會會院對女性仍然設有禁區。東非耶穌會士在這方面居於領導地位，令我引以為傲。

事實上，這個團隊是在一個相當危險的環境中工作和生活。南方的軍人組織——蘇丹人民解放軍，至少分裂為三派，彼此互相攻擊。更糟的是，烏干達叛亂組織及土匪，有些效忠在康培拉的總統，有些效忠當地的派系領袖，有些不與任何陣營結盟，自成一個派系，他們經常搶奪、毆打和殺戮當地的烏干達人民、蘇丹難民及救濟工作人員。我第一天晚上，在一個點著煤油燈的帳棚裡和兩位修女進餐時，她們告訴我，在我們來到的前一週，有三位難民服務中心的同仁遭到伏擊。

這位澳洲籍的瑪格麗特修女與阿朱馬尼地區難民工作的督導——澳洲籍的耶穌會士賽索神父，一起送食物到一處難民營去，同行的還有一位年輕的坦尚尼亞耶穌會士凱西。他們的越

野車中還載著幾大袋的麥子和麵粉。當他們三人正在高低不平的烏干達路上行駛時，突然一名手持來福槍的年輕男子從路旁跳到他們的越野車前，要他們停車。但他們知道，即使停車也不表示他們的安全能獲得保障。

瑪格麗特修女先減速，但是，當他們漸漸靠近那年輕人時，她便猛踩油門快速前進。

當他們的車疾駛而過時，這名搶匪便對著車子開槍。瑪格麗特修女說：「他年紀很小，甚至還握不住機關槍。」子彈射到了車子。在對方開火時，他們的越野車撞上一個大土堆，將他們三人拋到空中。他們急速離去，唯有賽索神父碰傷了手臂。

那天晚上他們回到中心，替神父包紮傷口後，他們檢查受損的越野車，發現子彈打在座位後面的麵粉袋上。最初，他們無法了解彈孔為何留在他們曾經坐過的座位上，假如這樣，子彈就會穿透他們的身體呀？最後，他們恍然大悟，當子彈射中車子的那一剎那，正是車子撞上土堆，他們被彈起來的那一刻，子彈從他們身體下面飛過，穿過座位，落在麵粉袋裡。他們三人相信那是奇蹟，或許，那確實是奇蹟。



阿朱馬尼的主建築要比外圍的茅屋舒適，但是卻沒水沒電。對這裡的團體而言，這似乎不造成任何困難。他們用炭爐煮飯，一天的工作隨日落而結束。另一方面，取水則是一件困難的事。他們每天開車到村子的泉水旁，用水桶及方形水罐裝水。飲用水必須經過過濾和煮沸，剩餘的水用來盥洗及洗衣服。房子裡



有廁所，那是在阿敏統治時代前，當這裡還有自來水時所遺留下來的。目前，要用水桶裝水沖馬桶。然而，大部分時間你都得用戶外廁所，就是在地上挖個洞，四周圍上木板的一間小屋而已。我想，用水的狀況，就需要時間來適應吧！

幾個月前，我和一位中心的工作人員一起到奈洛比北面五十公里的納庫魯鎮，探訪幾位與基督兄弟會（Christian Brothers）的修士共同在一所技術學校服務的志工。他們也必須將水煮沸過濾後才可飲用，那種複雜的過程讓人在浪費一滴水之前，必須三思。這是住在奈洛比的好處，至少有清潔的飲用水。另一方面，在我來到東非的第一個十月裡，某天的報紙上登載一則啟示，向讀者說明，過去三個月裡，城裡的用水都未經處理。換言之，我們已經飲用了受病菌污染，直接由奈洛比湖引來的水，而當地人民也在湖邊排便和洗衣服呢！

一位與我同住的耶穌會士做了一種實驗，他把一杯奈洛比的自來水放在窗台上，觀察在杯子裡生長的各種生物。的確，許多來到奈洛比的訪客都是因為飲用水而生病。但是，值得感謝的是，由於長時間在此地居住，使我們產生了抵抗力。然而，在奈洛比以外的其他東非地區，將水煮沸並過濾，確實是必要的。

要在阿朱馬尼這樣的地方生活，的確困難重重。除了用水和用電帶來的考驗外，還有悶熱的天氣和空氣中的塵埃。在奈洛比城裡，你的長褲和鞋子二十四小時都滿布紅土；雨季裡，要把黏在運動鞋或橡膠靴上的泥巴刮下來，真是一件困難的事。在阿朱馬尼便是灰塵，那是一種漂浮在空氣中的細微棕色塵埃，它們會飛進你的眼睛、鼻子和口裡。後來，我花了數週的時間

才清除衣物中的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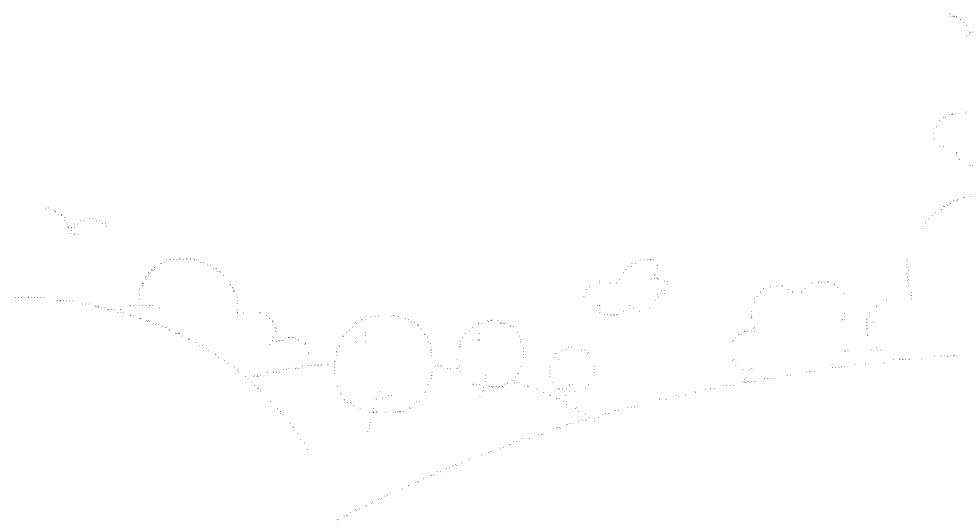
第一天晚上，我睡在一間茅草屋裡。「睡」或許不是正確的用字，更確切的說是在破舊的蚊帳裡「度過了」第一個晚上，我聽見發出嗡嗡聲的巨大飛蟲圍繞茅草屋飛翔，大聲地衝撞蚊帳並盡可能想要咬我。之前，我在蒙巴薩發現，蚊帳只能擋較大的蟲子，卻使悶熱的夜晚更令人難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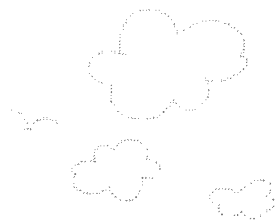
第二天，麥可和我去探訪這裡的難民營，數以千計的南蘇丹難民，在烈日下，擠在滿布灰塵的藍色聯合國帳棚裡。第一眼看見這難民營，令人驚訝無比，在這塊乾燥的平原上，放眼望去整個城鎮都是難民營，從我們面前向外延伸，唯有朦朧的黃色灰塵和細細的白色炊煙遮蔽了眼前的景象。瑪格麗特修女領著我們在帳棚間穿梭，我們慢慢走，沿途和他們打招呼。這裡的難民營看來很像奈洛比的貧民區，不同的是，這裡的難民營沒有多少活動。難民似乎都在等待，懶散的氣氛瀰漫整個營區。

如同阿朱馬尼居民的生活一樣，這一週我們便在緩慢及不慌不忙的生活步調中度過。有一天早晨，我們拜訪一所由耶穌會難民中心辦的學校，數百名蘇丹學童安靜地坐在樹下的板凳上。另外一天，我們在黃昏時來到尼羅河邊，看見婦用瓦罐汲水，而不見身影的狒狒則在漸漸退去的暮色中嘶喊。主日，也是我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賽索神父在一棵大樹下，為幾名難民舉行感恩祭。一陣涼風吹來，吹起了枯樹葉，也捲起了一堆灰塵。他們簡單地為別人代禱了三十分鐘，他們的祈禱內容有：我為已故的父親祈禱，我為重病的母親祈禱，我祈求能找到我失蹤的孩子……



我們在星期一離開，搭小飛機到康培拉，從那裡搭開往奈洛比的火車，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終究為我們預留了回程車票。





## 快一點，快一點， 意思是沒有祝福

格言是一面鏡子，一個團體可以在它裡面看見自己；格言是一個舞台，可以向別人展現自己。

——派翠克·卡里隆 (Patrick A. Kalilombe)

節錄自《非洲的故事神學》

(*Towards an African Narrative Theology*)

肯亞的每日問候語是「Jambo」，意思是「哈囉」，但是，它還有其他含意，即是史瓦希里語「麻煩、困難、問題」的意思。因此，有人用「Jambo」一字問候你，也可以表示「你有困難嗎？」通常以同樣這個字「Jambo」回答對方就可以了，但有時候會用「Nyingi」（許多）回答，表示「我有許多困難」的意思。

shida 或 matata 二字也有困難的意思。美國迪士尼影片《獅子王》的影迷會很高興知道，片中的 hakuna matata 意思是「不要擔心」，這是一種普遍的用法。其實，在肯亞有許多表達困難或擔憂的字，它們都是用來描述這裡的生活情況，誠如古老的格言所說，在愛斯基摩的語言中有一百個形容「白雪」的字。東非，這個人類的搖籃，有時似乎也是「麻煩」與「混亂」的搖籃。

當然，這裡更大的困難是貧窮、疾病、無家可歸、飢餓、暴力、政治動盪，這些也是難民每天面臨的困難問題（此外，



還有來自當地警察和居民的性騷擾)。但是，如同在任何一個被腐敗和殖民主義政府所控制的小國家一樣，一般百姓談話的主題常常是：車子不能發動、電燈不亮、窗子無法關閉、公車停駛、公務機關停班、工人停工等等。

在肯亞的史瓦希里語中有一個既普遍、用途又廣的字，便是「抱歉」(pole)，它幾乎可用於所有的情況，從踩到某人的腳趾、打破一個杯子，到嚴重的事物，如失業、重病、親人去世等。有趣的是，pole pole 兩個字則表示「慢，慢下來」。每當我問難民他們生意的經營狀況時，他們的回答都不外乎：「我們慢慢地經營。」有一條正在進行整修工程的道路上豎立一個告示牌，請行經這段道路的車輛注意慢行，牌子上寫著「Pole Pole」。道路工程進行幾個月後，告示牌斷成兩半，只留下一半，只有一個「Pole」字，變成了「抱歉」。

事實上，這種混亂的狀況，造成駐外工作人員常用的一句話：「非洲又贏了」(Africa Wins Again)。當你假設能按照計畫，準時或依你所想的完成某項工作時，你就會用這句話。例如，你計畫早起，早一點到達辦公室開始工作，但是，家裡的水塔前一晚卻沒有蓄滿水，早晨無自來水可用。你花了半小時用桶子接水洗澡，雖然你比平常還晚，但當你到辦公室時，你的朋友還是會說：「非洲又贏了。」

「啊，不會吧！」是維奇妮常用的一句話。當一件突發事件打亂我的時間表時，她的反應便是「啊，不會吧！」有一天早晨，維奇妮和我打開雙手中心的門，一條細細的水流從門下流出。我們走進商店，看見拼花地板上有一些髒水。「啊，不

會吧！」她說道。原來，為了讓水塔蓄滿水，前一天她轉開水龍頭，但卻忘了關起來，晚上水塔蓄滿了水，水池也滿了，然後流到地板上。我們放在地上的商品，像墊子、籃子和地毯全都泡壞了。

搬進雙手中心不久，我請一名當地的工人<sup>24</sup>在我們屋子的後門裝上一扇鐵門。在康格米鎮盜賊極為普遍，我們不僅要擔心難民的物品，還要看管我們的電腦和現金，凡是來到商店的人都會看見這些東西。有一天下午，我探訪一名難民後返回中心，遇到這名正在後陽台收拾工具的工人，維奇妮清掃掉落在地上的碎石片，因為工人在房子的牆上鑽了幾個很深的洞，這名工人興高采烈地說：「完工了！」

那扇鐵門看起來歪歪的。當他形容欄杆有多牢固時，我試著去開那扇鐵門，它是向內開的，而屋子的大門卻是向外開的，這表示大門是無法使用的。當維吉莉亞看見我打開鐵門撞上原有的大門時，她說：「啊，不會吧！」

「你認為怎樣？」我問這名工人，「現在沒有人出得去了。」

「是的，修士，」他回答說：「也沒有人進得來了。」

弔詭的是，這些生活上的小小困難讓我們從更人性面去看生命，並且更容易接受生活中的事實。人人都預料到事情常不如所願，因此，當事情發生時，人們都不會大驚小怪。我的吉普車常常規律性的拋錨、過熱以及爆胎，使我經常不預期地去

---

24. 這裡是指什麼都會的雜務工，希瓦希里語念作「fundi」。



修車廠，因而延遲我在雙手中心的約會，而難民總是說：「沒關係<sup>25</sup>，修士！」

就這樣，我學到，假如我必須要等一小時、兩小時，甚至一天或兩天，我也不會讓自己心神不安，因為，我知道總是會有理由的，最後，難民也會告訴我：「慢慢來，慢慢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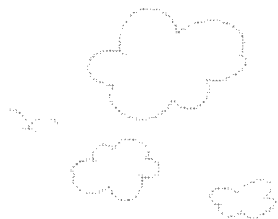
我終於漸漸明白難民的說法可能是正確的。為何要擔憂遲到的人呢？事情最後總會完成的。著急什麼呢？或者誠如維奇妮常常提醒我的：「快一點<sup>26</sup>，快一點，意思是沒有祝福<sup>27</sup>。」

---

25. *hakuna* 是「沒有」的意思，如 *hakuna shida* 或 *hakuna matata*，就是「沒有問題」或「沒關係」。

26. 史瓦希里語「*haraka*」的意思是快一點，若兩個字連在一起 *haraka haraka*，就是「非常快」的意思。

27. 史瓦希里語「*baraka*」有祝福之意。



## 一點錢

生命的成果大部分取決於我們對自己言論的存疑能力，和對自己工作價值的質問能力。完全相信自我評估的人，注定貧乏。

——多默·牟敦（Thomas Merton）

《默觀的新苗》

（*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

我來到肯亞第二年的一月，已對這裡的生活感到熟悉自在了。我喜歡雙手中心的工作。我認識了數百名的難民，他們的子女、配偶、鄰居和他們所關心的事。對這裡的耶穌會團體，我覺得如同自己的家。我也很幸運認識住在凱倫鎮附近的一個愛爾蘭家庭，他們常常邀請可瑞根、麥可和我到他們家作客。在他們舒適的家裡，與狄克遜夫婦共度的時刻，真好像是我們這些在貧民區工作者的加油站。而在愈來愈常舉行的奈洛比園遊會上，狄克遜太太有時也協助雙手中心的攤位。

另一位新朋友是耶穌會會院的接待員基蒂女士（Kieti），她成為我生活在肯亞社會裡最佳的嚮導。假如有一種特殊的文化差異或東非的傳統讓我不知所措時，生於奈洛比的基蒂女士總是願意提供答案，例如：如何適當地與人握手，如何正確購買肯亞食物，如何區別不同的種族，以及如何應付任何語言上的





挑戰（她教我幾句隨時可用的奇庫尤問候語），所有這一切都落在基蒂周密思慮的範圍內。在我剛來肯亞時，她也幫助我如何使用「我可以進來嗎？（Hodi？）」「請進（Karibu!）」這類禮貌性的用語。

基蒂也是第一位邀請我到她家用餐的肯亞人。她花了一整天時間準備我的造訪；晚餐包括ugali、肯亞國民菜（甘藍菜加肉末、番茄、洋蔥）、燉牛肉、沙拉（一堆淋上美乃滋醬的紅蘿蔔絲）和薄餅。在用餐時，她告訴我，這種薄餅是肯亞的特色食物，通常在聖誕節才吃得到。當我說真不可思議，這種類似印度薄餅的食物竟然成為肯亞的美食時，她臉上出現驚愕的表情，並且強調，這是肯亞特有的食物。身為她的座上賓，我覺得此刻展現自己的男士風度或許更適宜，便決定讓她贏得這場辯論。

我也找到了一位在修會生活中的「靈修輔導」，即是一位我能與他談談我的靈修生活，尤其是我祈禱生活的人。他是喬治·杜瑞神父（George Drury），在凱倫鎮避靜院服務的美籍耶穌會士。這座以史瓦希里語「光」命名的避靜院，座落在《遠離非洲》作者凱倫·白烈森的土地上。事實上，這座避靜院是由白烈森家族後代擴建的，因為原有的房屋太小。

避靜院建在恩貢山下，占地遼闊，由後院望出去，可以看見我認為東非最美麗的風景。前院有個宏偉的花園，花園裡有天堂鳥、粉紅色天竺葵、梔子花、芙蓉花叢、串錢柳，棕櫚樹以及高大的松樹。遠處高高的桉樹似乎為淡藍色的山丘加上框架，它的香氣瀰漫於空中。豔麗的太陽鳥與蕉鵲相互吟唱，蜂

鳥不時在陽光照射下的花園裡飛來飛去。每兩週我到避靜院與杜瑞神父晤談，接受輔導，這位慈祥、來自美國新英格蘭州的神父對我靈修生活的影響，就如同那穿過花園、從山上吹來的陣陣輕風。

從我來到肯亞面臨最困難的一件事之後，我便非常感謝狄克遜夫婦、基蒂、杜瑞神父、我的耶穌會團體和其他外國朋友的支持。事件的核心人物是班吉明·穆嘎伯（Benjamin Mugabo）。



在一個全國人民皆痛苦不堪的國家裡，這名盧安達青年班吉明是我所認識難民中最悲慘的一人。他常常生病，因此，很難斷定他的年齡，或許二十歲，也可能三十歲。他骨瘦如柴，活像一具骷髏，一對棕色大眼睛總是充滿淚液和血絲。每次我們見面時，他都穿著同一件衣服，我漸漸意識到，那也是他唯一的一件衣服——破舊的白襯衫，骯髒的藍色短褲，用黃色膠布包裹的薄底涼鞋。

當我還在路易絲修女的辦公室工作時，班吉明便開始來找我，他以含糊的聲音對我說：「修士，我今天有點不舒服。」然後向我要錢到當地的衛生所去看病。他說，他有胃潰瘍，很疼痛，而藥又昂貴。有了錢，醫生才會開處方，然後，他還問是否可以要一點錢買食物呢？「一點錢，」他說。

他說他沒有家，幾年前在盧安達時，他們全族遭到屠殺。以他的年齡推算，這可能是真的，但是，卻很難證實。班吉明未婚，獨自住在鎮上的一間小木屋內。我注意到，當他來雙手



中心時，有些盧安達難民躲著他。與那些辛勤工作的難民相比，他顯得有點羞澀。

當他聽說我們要協助難民開創事業時，他立刻提出申請。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他似乎沒有任何技能、做生意的經驗或手工藝的才能。雖然如此，他定期呈上一些計畫案，諸如開旅館、飯店、木工場、機械工廠、印刷廠等，他以顫抖的手將這一切計畫案寫在一張骯髒、皺巴巴的紙上。每次，我們必須退回他的申請，因為他在這些方面都沒有實際的經驗。每次，他都低著頭提出相同的問題：「那麼，我能做什麼呢？」

當我們搬到康格米鎮開辦雙手中心後不久，班吉明又出現了，並且要我給他一點錢。他聽說我們出售難民的手工藝品，他便帶來他的作品，顯然的，這些東西是他過去不曾做過的。例如，有些難民以香蕉葉製作精美的小卡片，用纖細的乾黃褐色樹葉拼出非洲婦女的圖像、聖家圖像及各種動物圖像。那一天，班吉明帶來三張卡片，那是用砍來的香蕉樹葉隨意地以大塊白膠黏在紙上做成的。為他的作品，我付給了他幾塊先令，但是當他問我是否還想多訂一些時，我必須說不。

不久，班吉明便每天出現在雙手中心來向我要錢。通常我會自掏腰包給他一點錢。很明顯的，除了這裡，他無處可去。

我漸漸明白，以廉價雇用他，或許是一個解決他困難較為簡單的方法，但是，雇用他做什麼工作呢？我們已經從當地雇用了一名既勤勞又優雅大方的年輕女性維奇妮負責清掃工作，和另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盧安達難民瑪麗擔任銷售員。在烏塔去德國前，她已經雇用了一名衣索比亞男子比瑞擔任園丁。但

是，由於比瑞年事已高，只能做些不費力的小事。其實，他大部分時間都在陽台上抽煙，與其他難民聊天。或許班吉明可以擔任助理園丁，為花草樹木澆水，照顧房屋四周的花園，做一些比瑞常常無法做的勞力工作。當我向班吉明提出這計畫時，他哭著對我說：「是的，是的，我可以做，修士。」

然而班吉明的困難真是層出不窮。他第一天來上工時，我要他拔除小花園裡的野草。我建議他穿高筒橡膠靴，如同肯亞人雨季時在農田裡工作時所穿的那種靴子。他兩眼看著地面說：「好，修士，但是我沒有這種靴子。」其實，他只有一雙破舊的涼鞋。因此，我們為他買了一雙橡膠靴。為了要保護在烈日<sup>28</sup>下工作的他，我們也為他買了一頂帽子。

大約在我們雇用班吉明的同時，恰巧有另一名以販售植物為生的蘇丹難民以利亞來拜訪我們。以利亞每週騎著他那輛破舊的自行車來到中心，給我們看他那張已經翻爛的表單，上面列有販售的各種植物名稱及價格，例如，天堂鳥：250先令；天竺葵：50先令；鳶尾花：100先令；九重葛：100先令。

我對班吉明感到抱歉，即使我們不需要更多的植物，但是我每週都會向以利亞購買幾樣。在幾天內，他總會騎著自行車回來，帶給我們幾種用舊報紙包著的小棵植物或樹苗。有一天，當艾麗絲看見他又帶來一些植物時說道：「哈，他可能從某人

---

28. 希瓦希里語「kali」有粗暴、兇猛、猛烈之意，可用在人、動物、大自然等各種事物，像「烈日」就是「jua kali」。



的花園裡偷來這些植物哦！」無論如何，以利亞的植物給了班吉明一些事做。感謝班吉明、以利亞和雨水，在幾個月內，雙手中心四周的花園開滿了各種不同的花。一位英國籍的業餘女性園藝家宣稱，我們的鳶尾花是她見過最美麗的花。

班吉明與瑪麗、維奇妮、比瑞一起在雙手中心吃午餐。提供四人午餐是很便宜的，每天只需要幾先令，而維奇妮又是一名機靈、有經驗的廚子。雖然四人的背景各不相同，但是他們卻形成了一個緊密的小團體。

除了這些不固定的栽種工作外，班吉明還做些其他的小事。當我們要求他清掃或修理某些東西時，他便以疲倦或身體不適作為藉口予以推辭。他以就醫為理由而溜走，幾天都不來工作。當他回來時，全身都是酒氣。其他盧安達難民開始向我談論他說：「他酗酒。」或者，對盧安達難民而言更糟的是：「他懶惰。」

雇用班吉明幾個月後，我們放在展示間、上鎖抽屜裡的錢盒子不翼而飛。盒子裡大約有五千先令（約合美金一百元）。第二天早晨，我們發現展示間的門仍然鎖著，沒有被打開的痕跡。也沒有明顯的證據顯示是我們雇用的員工中任何一人偷了這盒子。但是，一定是他們其中一人所為，不可能有其他人拿了這盒子。只有麥可和我有這裡的鑰匙。班吉明、瑪麗、維奇妮和比瑞立刻相互對罵，指責對方偷了錢。

麥可和我非常氣憤。我們覺得受騙了。我們不僅雇用了他們四人，而且還提供餐食，送給他們衣服，借給他們金錢，當他們遇到麻煩時照顧他們。我們覺得他們是我們的朋友。現在他們之中有人偷了我們的錢，更確切地說，是偷了難民的錢，

因為這些錢是屬於難民的。我決定要查明這件事，認為這錢盒子應該就在附近。麥可和我開車到他們四人的家中去尋找這盒子。

這真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甚至在敘述這件事的時候，我仍然感到深深的不安。或許我有權可以做這樣的調查，因為很明顯的，是他們中間的一人偷了錢盒子，那麼，我應該到偷錢的人家中去尋找，而不應該也搜查其他三人的住處。對他們而言，這是極大的屈辱，當我搜查他們住的小屋時，我感到極為慚愧。我們在他們家中什麼也沒找到。那麼，現在該怎麼辦呢？

一位長時間住在肯亞的美國人告誡我說：「全部解雇，那是唯一的公平方法。這樣，大家就知道你不允許偷竊行為，否則，難民和肯亞人都會想要占你的便宜。將他們全部解雇。」他一再重複，怕我遺漏了重點。「那是這裡的作法。」甚至連難民都勸我將他們解雇，許多聽見偷竊事件的人都贊同這樣做。一位愛爾蘭司鐸也同意，他直接說：「全部解雇。」

這是一件痛苦的決定，而在當時似乎是唯一的處理方法。開除其中的一人，未免太獨斷了。我個人懷疑班吉明，但是麥可卻懷疑比瑞。最後，我們決定將他們全部解雇。無疑的，這是我過去或者我在肯亞服務期間所做的最困難的決定了。

我召集他們，並告訴他們我們的決定。維奇妮和瑪麗立刻哭了，用袖子擦眼淚，班吉明和比瑞則低著頭。宣布完我們的決定後，我走進廁所，關上門，獨自啜泣。

幾週後，我仍然心神不安，我漸漸明白，我們做了一件錯誤的事。處罰他們四人或許是一種讓其他難民和住在康格米的居民知道我們處理這事件的訊息，但是，卻也極不公平。此外，



開除某人便是要他去過貧窮的日子；對他而言，就業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之後，我們雇用了一名肯亞婦女派翠莎，她是一名用心工作的女士。

麥可和我意識到將他們全部解雇是一次極大錯誤的決定。儘管如此，班吉明和比瑞兩人都是很糟糕的工人。我們覺得現在是調查整個事件的最佳時機，查明將他們全部解雇是否處理得公平。

我們與他們個別談話。這真是一種痛苦的過程，當然，他們承受的折磨比麥可和我更大。維奇妮哭著懇求我們再雇用她，並為自己的無辜辯護，因為她是單獨一人工作。瑪麗比較自我壓抑，並自認這是在她值班時所發生的竊案，身為銷售員，她有責任看管這個錢盒子。比瑞沒有自我辯護，在整個談話過程中，他一直保持緘默。最後，由於沒有對維奇妮不利的證據，我們決定請她回來擔任原有的工作。班吉明和比瑞本來的工作就不多，我們就不再雇用他們。瑪麗坦承自己應該為錢盒子被偷的事負責，因此我們不予雇用。

但是，我**仍然**感到內疚。我知道自己已經盡力說明處理這件事的原則，我也知道這對他們起不了作用。班吉明、比瑞和瑪麗將陷入極度窮困中。為了要減輕我的內疚並為他們提供謀生的方法，我幫助瑪麗開始一項新的事業，這也是當初她來我們中心時想要做的事：開一家美髮店。對這安排，她感到高興，並且心中對我們不再懷有怨恨。「看好錢盒子是我的責任，修士，」她難過地說。至於比瑞，我們盡快為他向聯合國辦理移民挪威的手續，其過程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了。

班吉明被解雇數週後又開始來到中心。每天他都哭著說：「讓我回來吧！」關於這點，我知道，即使我讓他回來，他仍然是一名不擅於工作的人。雖然我沒有證據，但是，我還是懷疑他就是偷錢的人。

那麼，我能做什麼呢？每星期我仍然給他「一點錢」，並針對他的困難輔導他。因而他又回到他原先的狀況中，病痛、窮困、失業、極為孤獨。



在肯亞，對許多問題似乎都沒有正確的答案。或者，無論何時似乎有了正確答案時，我們的內心還是感到不安。

我對自己當初所做的決定深感羞愧的原因，是因為我反省在我與他們的許多關係上，我常常都是占有優勢的。我的權力（最明顯的便是雇用與解雇之權都操在我手中）與班吉明的毫無權力形成強烈對比。即使班吉明因偷竊而有罪惡感，我也沒有給他為自己解釋的機會。我運用權力的方法也是錯誤的——先把他解雇，然後去搜查他的住處。當時我已有感覺，然而憤怒卻阻止我去面對它。

這事件甚至使我對班吉明、肯亞人民以及難民的態度常常是不確定的，一些駐外工作人員總是責怪我繼續不斷給班吉明錢，並且堅稱長此以往只會助長他的依賴性。但是，若不給他錢，便會讓他陷入更深的悲慘狀況之中。他沒有謀生技術，也找不到工作。在這裡沒有「安全網」，沒有社會福利，沒有醫療制度。窮人只能自求多福。我覺得我需要原諒自己，並做些





補贖。因此在缺乏明確的答案和受到互相矛盾的忠告困擾下，我依靠自己的直覺，並在其中找到最合乎基督信仰的答案。為了不要長期陷入周而復始的仇恨與報復之中，一種我在盧安達、索馬利亞、肯亞所見到的，一再重複上演的全面不幸事件，我認為寬恕與和好要比懲罰性的「正義」更有意義。

這一類沒有正確答案、卻又令人感到十分痛苦的事件，使我愈來愈依靠祈禱，那是我疑問的回應。



身為一名耶穌會士，多年來每天都有規律性的祈禱習慣。修會要求尚在培育中的會士盡力做到——每天除彌撒外，還要做一小時的祈禱。即使我無法在一天的時間中擠出一小時來祈禱，每天晚上，我也會按照聖依納爵制訂的回顧及**反省**一天生活的簡短祈禱方式做祈禱。這種**省察式**的祈禱分為五步驟。首先，你祈求天主與你在一起。然後，為今天發生的一切美好事物感謝天主，例如：與一位朋友交談，一名難民事業成功，嚐一口芒果，走過梔子花叢聞到它的醉人香氣，看見高掛天空的太陽等。第三，回顧一天的生活，在哪些事情上，你看到天主在工作，在哪些事情上，你可能看不見天主在工作（我將這部分視為一部電影）。第四，當你意識到遠離天主的恩寵時，祈求天主讓我看到自己的罪。最後，為明天的恩寵祈求天主的幫助。這種**省察式**的祈禱極有效地讓我覺察到天主的臨在，假如我不作反省，我就容易忽略這一點。例如，解雇雙手中心工作人員的這件事，最後就是在祈禱中，我發覺自己心神不安，更

重要的是察覺自己犯了錯誤。

當我在肯亞一天天生活下去後，我發現我的祈禱非常清楚但卻又不知不覺地改變了。剛來時，我的祈禱集中在我的孤獨、想念朋友和家人上。然後便是想要在祈禱中分辨我是否要離開這裡。之後，我迷上了「歸心祈禱」，這是一種受到禪學和其他東方傳統影響的祈禱方法，即是集中心神，藉著規律的呼吸，向天主打開心房。

有時，我的祈禱幾乎都以我的工作為主。漸漸的，難民的臉孔成為我祈禱的焦點，我請問天主如何將難民服務做得盡善盡美，還有如何答覆他們的需求。然而，這並不保證我所做的都是正確無誤的。





## 我遇到老媽媽<sup>29</sup>

他不明白，為何為了要閃避一隻死狗而急轉彎，我很愛這裡嗎？是否因為在這裡的人沒有時間為裝自己？……在這裡，你可以幾乎如同天主一樣愛他們，最糟的是：你不喜愛裝腔作勢、華麗衣服和虛情假意。

——格雷安·葛林

《事物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

我們另一位年輕的美籍耶穌會士柯瑞根負責一項「醫療協助計畫」，目的是為在奈洛比的難民提供免費的健保服務。難民可以到任何一個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或附近的天主教堂，向工作人員取得一張紙條，上面有這名難民的姓名和聯合國簽發難民證的號碼。難民拿著這紙條到診所去看病或取藥，診所將核對難民證的號碼，若正確無誤，他便可以享受醫療服務。之後，那張紙條寄給耶穌會難民中心，中心就會把醫療費付給診所。這是一種極佳的制度，無需直接將錢交給難民卻為他們提供了健保服務。醫療協助計畫似乎非常嚴密，杜絕任何可能出現的欺騙行為。然而，我們低估了難民的足智多謀。

---

29. 「Mama」這個詞不只是對某人母親的稱呼，也泛指成年女人。Jombo Mama!是非常有禮貌的問候語。



我與這名烏干達難民希悉（Sisi）的關係，最初真是令人發狂，最後終於發展為彼此尊重並建立友誼的關係。此張照片攝於希悉參加製作籃子的課堂上。



希悉是一名壯碩的女子，大約五英尺十英寸高，她的頭髮由前額向後高高地梳起。她說，雖然她有一個烏干達的名字，但是她卻是來自盧安達。她定期來到雙手中心，帶來五顏六色的草編籃子，這些手工製品很快便銷售一空。

希悉編織籃子的速度極快，我開始懷疑，就如一些其他難民所說，這些籃子是否是由別處買來，而非她親手編織的。我覺得這是合理的懷疑。然而，對於難民的指控，我總是採取保留態度。有一天，一名為我們縫製衣服的盧安達難民瑪利亞，指控另一名拿給我們蠟染畫的盧安達難民約瑟，說他偷取別人的作品，並簽上自己的名字。她直率地說：「他是賊！」我告訴她，我會查明這件事。

我同瑪利亞走到陽台，當她走過約瑟身邊時，約瑟瞪她一眼，然後與我一起走進辦公室。

「啊，修士，你知道嗎，」他陰險地說：「這個女人是騙子！她的衣服是從市場買來的。」



另一名認為我標準不高的婦女是老媽媽（Mama Mzee）。這個綽號的意思是「年長婦人」，但是在肯亞，「mama」和「mzee」這兩個字都有非常尊榮的意思。老媽媽是一名身材矮小的蘇丹婦人，黑皮膚。她和希悉一樣都能編織各式各樣美麗的籃子，不同的是，她編織的是蘇丹樣式，即是在染成紅色、綠色、黑色的乾草中配上褐色乾草。她編織的籃子精細美麗，因此，我們要求她為其他女性難民開一家草籃編織工廠。她先為難民免

費上一週的課，我們則慷慨地付給她授課鐘點費一週五百先令。我們貼出廣告，並花了數千元先令為她購買所需的材料：草、小刀、染料、煮染料的鍋子、生火用的木柴，這一切都存放在我們的浴室裡。

有二十名婦女參加這編織課程，她們坐在後院一棵高大的酪梨樹下上課。我們提供簡單的午餐——ugali，它是肯亞的主食，用白玉米糊做成，形狀像蛋糕，再配上一道切碎的青菜與番茄、洋蔥一起炒熟，這種搭配可以解決營養不良的問題。

令我驚訝的是，上了一星期的課後，這些婦女只完成了一小圈。「這些學生很笨，」老媽媽悲哀地說道：「她們還需要再上一週的課。」

我無法想像編織一個籃子要花這麼久的時間。但是，我對編織籃子又知道多少呢？因此，我付給她第一週的鐘點費，並請她下週再來。第二週，這些婦女坐在大樹下邊聊天邊編織。這次她們僅僅完成一半。「她們動作很慢，修士。」老媽媽搖著頭說。但是我很快發現，老媽媽的計畫便是設法要她們盡可能慢慢進行。領三週的鐘點費總比一週好得多。

「老媽媽，再一週，就這樣決定了。無論她們是否完成，這是最後一週上課。」我說。

她想一想，表示同意。

她們果然在下一週如期完成她們的籃子，為她們的滿滿收穫感謝我，並告訴我，她們多麼喜愛這些課程。然後，她們設法要將這些籃子賣給我。我向她們說明，我已經先為她們付了材料費，要我購買她們的產品是不合理的要求。最後，我們的

解決辦法是我付給她們工資。

自從我嚴肅宣布我的決定後（讓我想起分送聖誕杯子的那件事），老媽媽似乎更喜歡我。她成為雙手中心的常客，即使沒有貨品賣給我們，也幾乎每天來到中心。最後，她自願擔任辨識難民的責任，她告訴我誰會欺騙、誰是誠實的。她整天安靜地坐在陽台上，雙手抱在胸前，觀察來到我們商店的難民。雖然我從不認為她對真實性的判斷會比我正確，但是，我喜歡她的出現，也感謝她自由地提出的直率忠告。有一天她對我說：「你在美國有你的媽媽，但是在非洲我就是你的媽媽。」



希悉，這名老媽媽曾經提醒我要注意的難民，似乎總是在生病，她不斷地要我開醫療單，我也樂意幫助她。我注意到，她也要求我為她的孩子開醫療單，因此我要在單子上寫上希悉和她孩子的名字，及她聯合國難民證的號碼。

有一天，在聖若瑟教堂開設診所的瑪德琳修女路過這裡，她問我是否認識希悉，我說：「是的，我認識。」

修女一邊嘆氣，一遍用手指整理自己灰色的頭髮。

修女說，她發現希悉利用醫療單欺騙他們。修女從其他難民那裡發現，希悉要求我們為她和她孩子開醫療單，但是，她帶到診所的孩子並非她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肯亞當地的婦女為了要請她把她們的孩子帶到診所看病，而付給她五十先令。這是一種很巧妙的計謀：希悉的難民證號碼與醫療單上的號碼總是相符，因而忽略了孩子的難民證號碼。「因此，修士，

從現在起，我們也要查孩子的難民證號碼。」修女說。

但是，我們如何面對希悉呢？柯瑞根和我決定最好的策略便是明確告訴她別人對她的指控。為了要避開其他的難民，我們在柯瑞根的辦公室約見希悉。當我提出一些事實時，她便嚎啕大哭並怒吼道：「不，不，吉姆修士，我不會對你說謊的。你是我的兄弟。我當然不會欺騙你的呀！」

或許，有關她的故事我們所知道的並非正確，但是，我們不僅要處罰她利用我們的醫療系統，也要讓其他難民知道，我們不能容忍欺騙的行為。我禁止希悉來雙手中心。當然，我知道這對她將是一項重大打擊。她要到何處去銷售她的籃子呢？她甚至更大聲地狂吼著：「啊！修士，可憐可憐我吧！」

往後的幾週，希悉每天都來我們中心，但是我不要見她。她站在我們辦公室外哭泣，為自己的無辜抗議，請求其他難民支持她。我知道我應該堅持自己的決定，不准許她回來。（另一名難民服務中心的員工告訴我：「那是讓她知道你這次是認真的唯一方法。」）然而，有時我也心軟，又開始同情她了。為了她小小的不法行為，她吃盡了苦，總之，這些決定是要幫助她日後能以更好的方式養活自己和她的孩子。

兩個月後，我告訴希悉她可以回來了。我猜想她已經得到一些教訓了。我能確定的一件事：其他難民已經發現希悉過去所採用的方式，也知道不能如法炮製了。類似這事件的一段小插曲便是：一名年輕的蘇丹男子請求我為他開醫療單，他痛苦的說，因為他的陰莖上長了膿瘡。「修士，請看！」他一邊說，一邊很快解開皮帶脫下褲子。



當然，這絕不會是我想看的事，「好，好，我相信你，」我大聲喊道並遮住眼睛。

「不，修士，我定要**你看**！」他說：「你必須看，這樣你才知道我沒有欺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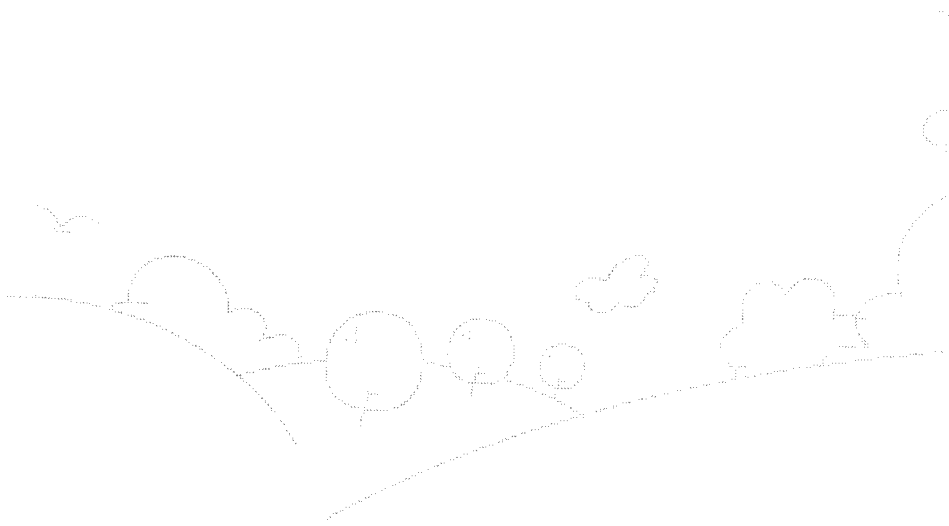
目的已經達到，或許方法過於強勢了一些。無論如何，這也是和好的時候了。總之，難民已經遭到足夠的拒絕了。當我告訴希悉她可以來中心見我時，她哭了。此後，她從未要求我為她開醫療單。我們恢復了過去的友誼，我買了幾打她編織的籃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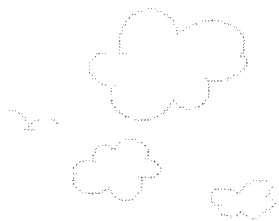
老媽媽不喜歡我的作法，這不僅違反她的忠告——她曾說的：「永不雇用她！」——也影響她的籃子交易。

我提醒她，她所做的交易紀錄也不完全是公正的。

「老媽媽，妳教的那些課程一定要上三週嗎？」

她很驚訝地大聲喊道：「吉姆修士，老媽媽**從來不會**欺騙自己的孩子呀！」





## 雨季

整個國家似乎陷入永不停止的綿綿細雨中。那些日子裡，太陽不會來向人們說早安，也不來對我們道晚安。若沒有手錶，你就猜不出時間。

——恩古吉·提安哥 (Ngugi wa Thiong'o)

《一粒麥子》 (*A Grain of Wheat*)

肯亞一年中有兩次雨季，一長一短。長雨季在四月，短雨季在十一月前後。在兩次雨季之間，奈洛比的氣候是極為宜人的、乾燥、晴朗的天空、涼爽的清風，白天氣溫為攝氏十七度，日落後為十五度。

奈洛比位於赤道上，太陽直射。海拔五千英尺的高度使這城市極為舒適，但是也使這裡的瘧疾危害肯亞其他地區。一位英國高級官員告訴我一則老掉牙的笑話：東非對英國殖民者最具吸引力的三寶便是：高度、酒和婚外情 (Altitude, Alcohol, Adultery)。

雨季來臨時，早晨的天空一片灰暗。整天厚厚的雲層布滿天空，午後會有一陣豪雨。雨有時常常下一整天，市區的泥土路變成無法行走的泥巴河流，堵塞的陰溝冒出大片紅色的泡沫。

在肯亞我們不穿雨衣，而穿一種舒適的特製衣服。通往雙手中心的途中有一段斜坡路，我必須小心駕駛我的吉普車。在



這條路上，我能看到美麗的恩貢山，有時是淺灰色，有時是清澈的淡綠色，有時是天藍色。前額帶著皮革裝飾品的肯亞婦女，背著沉重的木柴，彎著腰，痛苦而緩慢地爬著陡斜的山坡。馬拉松迷和奧運迷所熟悉的肯亞長跑者，每天早晨都赤著腳，奮力地山丘上跑上跑下。吉普車爬不上山坡時，常常是這些奧運選手幫助我把車子推上山坡。道路兩旁是茂密的粗枝大葉植物。雨季時，當地居民便摘下樹葉當成帽子戴在頭上，變成最實用的雨具。有些人在黑色油膩的垃圾袋上剪三個洞，穿在身上當成雨衣。但是當他們穿著這樣的雨衣擠在公車裡，就會使車內臭味難聞。

雨季之後，奈洛比轉眼成為一片花海，繁花似錦，樹木蒼翠。路旁高大的藍花楹上開滿了大朵的紫花，誇張地展示其鮮豔美麗。綠葉尚未展開之前的幾個星期，那些紫色花朵以它豔麗的色彩，在枝頭獨領風騷。

然而，我在肯亞服務的那兩年，全國都遭受乾旱之苦。對於居住在歐洲或美國城市的居民而言，這種乾旱僅僅造成生活上的不便，但是對肯亞人民卻是一種災難，有時還造成極大的痛苦。全國居民，尤其是北部的居民會面臨因脫水而死亡的危險。奈洛比的報紙每天報導不斷攀升的死亡人數。因此，雨季是極受歡迎的，尤其是奈洛比市郊的農田和鄉間的茶園。

對已經生活在困苦邊緣的農民而言，乾旱便是無收成，無收成便是無收入，無收入便是飢餓。那些以畜牧為生的人，在旱季很難找到當作飼料的草。有一天，一名難民來到我的辦公室對我說：「修士，麻煩大了<sup>30</sup>！」

我以為他在說：「有羊。」但是，我想我一定聽錯了。

他不斷地自言自語並指著前院，我走到陽台，看見一名很瘦的馬賽族男孩和大約二十隻羊在我們狹小的草坪上吃草。這名男孩哀傷地說，在旱季裡，羊兒無處可去呀！好，就讓牠們吃吧！

---

30. kuna 是「有」的意思，和 hakuna（沒有）意思相反。如果說 kuna shida，就是「有問題」的意思。



## 若望·穆他伯加和他的牛

歎息成了我的食物，不停哀歎有如流水。

——《約伯傳》三 24

雙手中心除了幫助一些製作手工藝品和具有能力開創小型事業的難民外，也出售那些條件不符而得不到耶穌會難民服務協助的難民所製作的物品。我們只負責協助被聯合國認可的難民，而有許多難民是我們無法幫助的，但是他們也需要金錢上的援助。為了要幫助這些難民，我們就買賣他們的手工藝品，為他們提供一個銷售他們商品的市場。

例如，一名盧安達難民迪達斯不僅會縫製繡花的洋裝和襯衫，也能以油畫畫出盧安達風格的聖母像。在盧安達，圖西族被滅種屠殺的消息傳出後幾週，他告訴我，他有一幅特別的畫要送給我。他說：「這是盧安達聖母。」這張以藍色為底的聖母有一對杏眼，身穿簡單的襯衫，頭上繫著方巾，背後背著用布包著正在哭泣的嬰孩耶穌。

同樣的，一名戴眼鏡、身材高大的烏干達男子馬克，曾在康培拉學過藝術的他畫了一幅《最後晚餐》。在他的畫裡，耶穌和宗徒都以身材修長和姿態優雅的非洲人呈現，他們穿著烏干達袍子，坐在放滿東非食物的桌子前。在我們店裡，他的畫作很受到修會團體的喜愛，銷路極好。我們將他畫完的油畫買

來後，送到城裡一間手工藝店去裱框，那是由一名樂觀的義大利人辛先生和他沉默寡言的妻子所開的。辛先生很喜歡馬克的畫，他為自己的商店訂購一些，如此又為馬克打開其他的市場。我們和辛先生的顧客都來向馬克訂畫，他因此而高興無比。

有一名來自馬爾他島（Malese）的觀光客非常喜歡馬克的作品，他訂了一幅大尺寸的《最後晚餐》。他在電話中告訴我畫的尺寸。馬克花了三週完成這幅畫作。

當馬克完成這幅作品後，我通知這名觀光客來取畫，他說他即將離開此地，太忙而無暇來取畫，問我是否可以送到他住的旅館去。

我開車到他住的旅館去，他與幾位朋友在停車場等我。顯然的，他們即將前往機場。我們互相問候之後，我便打開這幅油畫，很自豪地展示馬克的作品。

「黑人！」他以輕蔑的口氣說。

「當然是黑人啊！」我說。

「那我不要買了，我以為是白人。」

我問他為何不買，他說，他以為畫中人物應該是白人。他在我們中心看到馬克所有的畫作，其中人物都是非洲人。

「當然因為我是白人呀！」他生氣地回答。「告訴他，再畫一幅。你郵寄給我。」他轉向他的朋友，準備出發。

「且慢，」我說。我提醒他，因為馬克是以特有的風格來畫最後晚餐，若一羣穿著非洲服裝的白人圍繞桌子而坐，這是很可笑的畫面。我知道假如我把這幅畫退還給馬克，一定會傷害他的自尊心。當我想到馬克為這幅畫所投入的時間，而這真



是一幅好作品，我鼓起勇氣堅持我的立場。此外，我一路開車穿過康格米鎮來到他住的旅館，他也應該付給我全程的路費。他以馬爾他語和他的朋友低聲咕嚕幾句，把錢付給了我。



我們的商店能幫助許多難民自立，像高蒂、迪達斯、馬克、艾麗絲、阿斯丁等，並且還獲得一些利潤。但是，由於有時這些難民面臨一些無法克服的困難，例如：疾病、飢餓、警察騷擾，因而使得半數的計畫都落空。雖然如此，捐款給我們的美國和歐洲機構仍然認為我們的成就是令人敬佩的。他們在我們每年簡短的工作報告中，不僅讀到像阿斯丁、馬克等人成功的故事，也得知悲慘的事件，如某人的姊妹被殺，這些報導都說明了每一名難民所面臨的困難。當我完全明白他們困難的深重時，即便是我也常感到不知所措。

若望·穆他伯加（John Mutaburunga）是一名來自盧安達，從事畜牧業的中年男子。無論何時，他來到我們辦公室時都穿著一件破舊的燈芯絨外套，戴著一頂沾滿了紅土的舊呢帽，其實，在奈洛比任何東西上都覆蓋一層這樣的紅土。他請我們幫他買幾頭牛，因為有一位朋友給了他一塊位於市區外的土地，讓他在那裡養牛。這聽來真是令人驚訝，雖然在這裡牛很便宜，但牧場卻難找，因此，我們給了他一些資金購買四頭牛、飼料和幾件工具。

幾個月以來，我都沒有若望的消息。有一天，他面帶倦容地來到我的辦公室。他說牛的狀況很差，「牠們很渴。」已經

死了兩頭，他問我是否願意去看一看？

第二天下午，我開車到奈洛比市區外幾公里的納庫魯鎮和他見面。該地區的居民都是從事畜牧的馬賽族人，他們身穿紅色格子衣服，肩膀上扛著長長的趕牲口用的棍子，在塵土飛揚的街上走來走去。若望在一間小銀行前向我招手。

他爬上我的吉普車，我們越過綠色的恩貢山，到達高原的另一邊，相形之下，那邊的景緻就顯得乾燥和灰塵處處。雖然奈洛比常常是涼爽和微風輕吹的天氣，然而一旦你大膽地走出奈洛比，你就會感受到一位朋友所說的「非洲熱」，是一種你能想像的非洲燥熱。當我們由山區往下開時，一眼望去便是一片平原，那裡有乾枯的草地、矮灌木、有刺的樹。遠遠躺臥著黑斑羚羊，禿鷹在晴朗的空中盤旋。滿懷希望的馬賽族婦女站在路邊兜售裝在汽水瓶裡的蜂蜜。有深深車輪痕跡的泥巴路使得我這輛堅固耐用的吉普車也寸步難行。

我們下車，觀看四周的地理狀況。遠處有一片矮小的白色小屋，「我住在那裡，」若望指著那邊說道。雖然已經是接近傍晚的時刻，但仍然悶熱，我問他，他如何能在這裡養牛呢？他說，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地方，而且是他的馬賽族友人免費讓他用這塊地來飼養他的牲口。每天他牽著驢子到鎮上裝兩桶水。我們開車花了一小時才來到這裡，尚未到達他的家，那麼，他每天牽著驢子來回一趟又要花多久時間呢？

「三小時，修士。但是，假如我有一輛卡車就會快多了。」

期望他在這裡養牛，真是痴人作夢。這裡既無水也無草。就在成羣的蒼蠅圍繞我們飛舞時，我們設法解決他的困難：他





能把牛遷往別處嗎？不行，因為在任何地方飼養牲口都必須付費。或許，他可以賣牛奶賺一點錢。他耐心地解釋說，辦不到，因為牛沒有水喝就沒有奶。那麼，他的鄰居如何飼養牲口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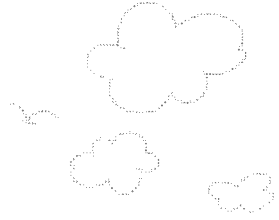
「他們是馬賽族人。他們定期遷移。但是我的家人不知道如何這樣過活，修士。」

我們沉默地站在烈日下，觀看這片荒涼的景物。若望無錢購買返回盧安達的公車票，在這種情況下，誰會選擇回國呢？他的族人大部分都已經死了，他的妻子最近死於愛滋病，留下三名子女。他沒有錢，他的本領便是養牛。因此，他請求我們買牛給他。他唯一能養牛的地方便是這位慷慨的馬賽族朋友給他的這塊空地。這是他目前生命中明確的方向，並且也勤勞工作，但是，卻遇到惡劣的天然環境和災難。這是在奈洛比大部分難民的命運。

我清楚看到，他注定會失敗。當我知道我無法幫助他時，一股深刻又難以言喻的哀傷在心中翻滾。當我告訴他，我們經費有限，無法為他購買一輛卡車時，他哭了。或許，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在牛全部死去前將牠們都賣掉。「那麼，以後我要做什麼呢？修士！」

我說，我不知道。

而我現在還是不知道。



## 風之家

在這一個處於羣山間腐蝕的洞裏，  
青草在黯淡的月光下歌唱。  
越過倒塌的墳墓，來到小教堂四周。  
有一座空蕩蕩的小教堂，只有風之家。

——艾略特 (T. S. Eliot)

《荒原》 (*The Waste Land*)

從一開始，我服務的最大難民團體便是盧安達難民。1960年代到1970年代之間，該國境內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不斷爆發種族戰爭，導致許多難民湧來奈洛比，兩個種族之間的衝突時而減緩，但是從未完全停止。

盧安達難民在所有難民中所占的優勢，使我的團體中有些會士感到驚奇。這是合理的，因為盧安達難民來到肯亞的時間最長，是奈洛比最穩定的難民。我在肯亞服務期間新遷入的難民，例如索馬利亞難民，首先需要尋找可獲得協助的社會服務資源，然後才會定居下來。

稍早，我對一位朋友提到這現象，他天真地問我：「他們為何還在這裡？回盧安達有何不好？」1994年4月，他就有了答案。

最初，真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所有的消息都是片段不完



整的。過去幾個月，除了奈洛比報紙有報導盧安達和蒲隆地兩國爆發大屠殺的傳言外，沒有任何一處報導這類消息。暴亂開始時，奈洛比的《國家日報》表示，這僅是來自盧安達首都的謠言罷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也不易獲得正確的消息，只能倚賴來自盧安達首都吉佳利（Kigali）的電話報導，和湧入奈洛比的外交官與外國人士的敘述。這一切都讓人有一種奇怪的印象——這兩個小國之間的戰事似乎比慘絕人寰的滅種殺戮來得更重要。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曾播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畫面：一名看來富有的美國女士牽著自己的小狗，走出降落在奈洛比機場的通勤直昇機。

最後，來自肯亞國內的消息開始四處流傳。難民和死亡者不斷增加，報紙每天更新人數。十萬人死亡，二十萬難民逃亡。三十萬人死亡，三十萬難民無家可歸。

終於，我們發現，最壞、最令人無法相信的消息卻是最正確的消息：八十萬人死亡，一百萬難民住在沒有食物僅有少量用水的難民營中。霍亂開始在營中蔓延。曾有五千名躲在某處教堂中的難民全部被殺。鄰居彼此敵對。首都幾乎成為空城。盧安達境內的河流堆滿了屍體，甚至有些已經漂流到維多利亞湖中。報上登出令人怵目驚心的浮腫屍體的照片。

許多在奈洛比的盧安達難民開始慢慢存一點錢，等候時機好轉後重返家園。缺乏家人的消息以及報紙上刊登的恐怖照片，都令他們難以忍受。

在奈洛比的盧安達難民之間的變動立刻受到注意。他們仍然每天來到我們中心，因為他們還是需要食物。現在，他們唯

一的話題是：「你有我們國家的消息嗎？」

大部分奈洛比城中的盧安達難民都是圖西族，即是在大屠殺中犧牲者的親戚。他們當然沒有管道與家人聯絡，他們如同其他人一樣，等候進一步的消息。諷刺的是，外交人員紛紛由那裡逃出，而住在奈洛比的盧安達難民竟然想要回去，設法找尋親人的下落。漸漸的，我注意到，一些經常來雙手中心的難民已經不見了。一名婦女對我說：「我來道別，我要回去尋找我的親戚。」另一名婦女哀傷地說：「我老公已經回去打仗了。」也有人說：「我要到坦尚尼亞接受盧安達愛國陣線的訓練。」

幾週內，數百名盧安達難民出現在奈洛比，其中許多人因懼怕大屠殺而先逃出，幾個月來他們都聽見胡圖族透過廣播鼓勵族人殺害鄰居圖西族人。他們與親戚、朋友、在街上遇見的盧安達人，以及其他難民一同住在貧民區內。

奈洛比耶穌會士熟知的三位盧安達耶穌會士，在首都的避靜院中被人以彎刀砍死。兇手以種族來區分耶穌會士和參加避靜的人，後者大部分是神父和修女，兇手屠殺其中的圖西族人。共有十七人被殺，有人說，他們是第一批在盧安達遭受屠殺的人。奈洛比神學院院長奧思定神父，是一位說話輕聲細語的盧安達人，我曾與他一起度過假，他也在屠殺事件發生的同一週失去了大部分的親人。他在耶穌會的小教堂裡，站在一個大十字架前為自己的國家奉獻彌撒。幾個月後，他卸下神學院院長的職務，回到自己的國家，代替被殺的耶穌會弟兄，從事帶領避靜的工作。

非洲傳教會的成員艾爾沃德·修特（Aylward Shorter）在他的



著作《基督教和非洲人的幻覺》（*Christianity and the African Imagination*）中，敘述一位大約六十歲胡圖族修女菲麗西的故事。菲麗西修女是聖皮爾中心（Centre Saint Pierre）的主任，在滅種屠殺期間，菲麗西和其他修女收容了圖西族的難民。當她的兄弟，一名陸軍上校勸她快離開此地，以免被殺時，她在信上寫道：

最親愛的兄弟：

感謝你想要幫助我，我寧願死，也不會丟下我收容的四十三名難民。請為我們祈禱，使我們能來到天主面前。為我向年邁的母親和哥哥道別。當我來到天主面前時，我要為你祈禱。保重。謝謝你想到我。假如天主來救我們，誠如我們所願，那麼，我們明天就會見面。

你的姊妹 菲麗西

菲麗西和修女們繼續收留許多難民，並幫助他們越過邊境。4月21日民兵來到聖皮爾中心，把其餘的圖西族難民、菲麗西修女和其他修女運往一個已經挖掘好的巨大墳墓前。他們槍殺了二十多名難民和六位修女，把菲麗西修女留在最後。她對他們說：「你們已經殺了我全部的姊妹，我沒有理由留下來。」

但是，每一則被殺的神父或修女的故事都引起一些謠言，其中少數幾則已獲得證實，像是有些盧安達的神父和修女自己本身便是劊子手，或者是滅種殺戮的共犯。多次我們注意到，盧安達是非洲最多天主教徒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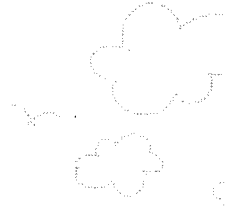
有一天，我在機場遇到一位在盧安達一處小堂區服務了二

十四年的比利時神父。我們坐在一張木頭板凳上，數十名頭戴藍綠色鋼盔的聯合國部隊在我們四周走動。在大屠殺期間，他被比利時軍隊神祕地帶離他服務的村莊。

他告訴我，在他的堂區，一名小型基督徒團體的平信徒領袖，也是負責向其他人講授基督信仰的福傳員，竟帶領屠殺他自己村莊人民的人。他有效地主導了屠殺行動，因為，拜他在團體中擔任領袖職務之賜，他知道誰是胡圖族，誰是圖西族（通常一般人不易區分），他帶著其他的胡圖族人用彎刀砍死堂區中非該族的信友。我的神父朋友說：「我一直認為這個人是我們村莊中最好的信徒。」他閉上嘴，哀傷地注視著圍繞我們的那些藍綠色鋼盔。

「我的生命，」他低聲地說：「真是白白的浪費時間。」





## 柯比納·蘇克

我們知道，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他的人獲得益處。

——《羅馬書》八 28

雖然我們只看到幾名來自非洲以外地區的難民，但是，有一天早晨，當一名來自利比亞的難民柯比納·蘇克（Kabina Sockor）出現在我們中心的陽台上時，我並不感到驚訝。偶爾來到的難民，提到一些令人驚奇的評語，使我意識到雙手中心在奈洛比已經遠近馳名。透過各種消息的傳遞使別人知道我們所做的工作。有一天，我向路易絲修女提及這事，她笑著說：「我告訴你，修士，奈洛比有十萬名難民，現在他們都知道你身在何處。」

柯比納是一名年輕男子，我們第一次會面時，他穿著骯髒的圓領衫，褪色的灰短褲，薄底的涼鞋。如他所述，他的故事也令人難以相信。他不像一名被肯亞警察抓住的烏干達難民，他的故事是其他難民無法證實的。柯比納遞給我一張有陳舊摺痕的紙，是一篇詳細敘述他故事的文章，在他逃亡之後，這篇文章曾刊登在利比亞的雜誌上。

柯比納的哥哥曾是利比亞政府官員，因此，他被歸屬為某個政黨。在一次政治對抗中，他的哥哥被對立的政黨人員綁架。對方在柯比納面前活埋了他的哥哥和同黨成員。他們對他說：

「我們也會這樣處置你，除非你逃走。」

於是，柯比納決定逃跑。就如所有的難民一樣，他拋下了親人、朋友、工作和家庭，先逃到邊境科特迪瓦（Côte d'Ivoire），取得聯合國難民的身分。但是，在那裡與一些利比亞難民同住了幾個月後，他聽到利比亞士兵在尋找他的傳言。很明顯的，國內政治鬥爭並未止息，他仍處於危險中。他的朋友勸他逃得愈遠愈好。於是他沿路搭乘不同的卡車，逃到數千里外的薩伊（今剛果）去。難民搭乘卡車是極為普遍的，在非洲，除了步行外，搭乘卡車是穿越非洲大陸少有的既可靠又廉價的旅行方式之一。最後他到達烏干達的康培拉。但是，那裡沒有他的同胞，他感到寂寞又痛苦。

當他在靠近邊境的科特迪瓦時，他發現那裡的聯合國機構無法幫助他到其他國家去。為了阻止難民尋求更好的待遇而由一國流浪到另一國，聯合國頒發的難民證僅限於獲得第一個國家的政治庇護。這種身分證明文件在任何其他國家是無效的。

最後，柯比納得知從他居住的康培拉常有卡車開往奈洛比。事實上，這就是愛滋病毒傳到東非的主要途徑之一——這些卡車司機將病毒由烏干達傳到其他地區。由於柯比納在利比亞時為自己的生命擔心害怕，在科特迪瓦時又很焦慮，在康培拉所受的待遇也令他感到失望，因而決定來到奈洛比，他聽說這裡有許多利比亞難民，在這裡也能遠離利比亞和殺他兄長的兇手。

但是，柯比納在奈洛比的情況卻更慘。事實上，在這裡很少有來自利比亞的難民，他無法在肯亞獲得合法的難民身分，又身無分文。他已經淪為乞丐並到了在垃圾箱裡尋找食物的地





步了。

柯比納敘述完自己的故事後，以充滿血絲的眼睛看著我，問道：「這裡可以幫助人創業嗎？」

他把手伸進自己骯髒的短褲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相片。相片中的他躺在水泥地上，穿著一條橘綠兩色的短褲。「我會縫製這種褲子，修士，」他說：「我什麼都會做。我可以有一台縫紉機嗎？」

不幸的是，耶穌會難民服務的規章禁止我們幫助沒有獲得聯合國難民證的難民。這是一條好規定，它讓我們確定，我們所幫助的對象是真正的難民。雖然這種規定有時阻擋我們幫助一名有需要的真正難民。

然而，按照我的信仰，總會有一些巧合或天主特殊照顧的例子出現，藉此，我們能幫助柯比納。

目前，雙手中心已經成為情報交換處和難民聚集的地方。他們在外牆上貼著彼此的信箋，坐在陽台上的板凳聽取最新消息。由於害怕被搶，以及在他們狹窄的屋子裡缺少收藏空間，有些難民也要求我們儲藏他們的東西，包括：布料、衣服、雕刻木料、編織籃子的草。

有一天，一名靠裁縫為生的盧安達難民安達娜帶著她的縫紉機、很重的桌子等來到我們中心。起先，我以為她的機器故障了，其實，並不是。

當她看見我時，她伸出手說：「修士，我的屋子被燒光了，三名小偷拿走我所有的東西，只留下這台機器！」當其他坐在板凳上的難民聽她敘述自己的遭遇時，安達娜哭了。她奮力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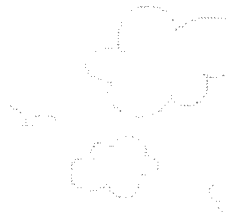
著笨重的縫紉機，穿過泥濘的田野，走了約五公里的路來到我們中心，「修士，我可以把這台機器放在這裡，直到我找到新的住處嗎？」

這是一項簡單的請求。我們把這台笨重的機器拖進屋內，她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並告訴我，她感到放心，因為這台機器已經放在安全的地方了。我同意把機器放在這裡，直到她找到新居，或者，她覺得還是不安全，也可以將機器在這裡放久一點。「或許有人需要它。」安達娜臨走時說：「他們也可以使用。」

現在有人需要這台機器了。由於我們不能直接協助柯比納，所以我問他，是否願意用安達娜的縫紉機為我們縫製一些帽子。我們有許多色彩鮮豔的蠟染布料，這是我們最暢銷的商品之一，是出自於兩名效率極高的盧安達婦女之手。我帶柯比納到中心的大展示間，一起挑選了一些適合的布料。我們合力把安達娜的縫紉機由放置幾堆黑檀木及三大包乾草的浴室中拖出來，其實，現在這間浴室更像一間儲藏室。

柯比納將縫紉機放在我們後院的酪梨樹下，開始工作。幾小時後，他拿給我三頂縫製得極好的帽子，我付給他二百先令，這是幾週以來他的第一筆收入。

此後，柯比納每天都來中心，挑選布料，用安達娜的縫紉機縫製不同的衣物。幾週之後，他用賺得的錢租下一間小平房。幾個月以後，他買了一台縫紉機，開始為鄰居縫製簡單的衣服。



## 我的弟兄

假如你總是以相同的方式，無論多麼真實、多麼美麗的方式來勾勒天主的形象，那你將無法得到祂已經準備要賜給你的新方式。

——華雷仕 (Carlos Valles, S. J.)

《天主的素描》 (*Sketches of God*)

我與耶穌會上司們共同決定的兩年服務期已滿，因此我回國的時間已經到了。雖然我熱愛這份工作（家父的中風此刻也已經痊癒），但是，我的承諾已經完成，我覺得此時正是離開的時候了。

雖然從開始我便告訴難民我將在這裡為他們工作兩年，但是，我還是想要給他們時間習慣這件事。他們的生活充滿了離別、曇花一現的友誼和無常的世事。因此，在我離開前幾個月，我以英文、史瓦希里文、法文、衣索比亞文、盧安達文、肯亞文寫了公告貼在雙手中心的窗子上，說明我離開的原因是要繼續進修，為在美國晉鐸作準備，並向他們保證，我會繼續支持耶穌會難民服務工作及他們的事業。

貼在窗子上的公告有時也會引來難民的善意祝福和熱誠的關懷。有些人寫卡片給我，有些人送禮物，其他的人把他們的孩子和父母帶來向我道別，並請我祝福他們。所有這一切都出

乎我的意料之外，讓我深受感動。我的耶穌會夥伴也策畫在中心的後院為我舉辦一個類似我們聖誕慶祝會的歡送會。

「會送杯子嗎，修士？」有人問道。



即將離開這裡，也提醒我要與瑪麗、班吉明這兩名被我和麥可解雇的工作人員和好。第三名被解雇的衣索比亞難民比瑞目前已成功地定居在挪威。時間一天天過去，我對自己做的一些決定的後悔感覺也與日俱增。因此，有一天，我和瑪麗坐在一起，坦白地告訴她，對於那件使她傷心的事我感到抱歉。瑪麗邊聽邊點頭，我還沒有說完時，她便打斷我的話說：「你沒有選擇，修士。」她表示，她不再難過，並且對我們的新計畫表示感激和支持。我與班吉明的會面讓我覺得更難受，因為他依然窮困，仍在尋找工作。我告訴他我感到抱歉，我真心希望他的情況能好轉，我也不斷地為他祈禱。這些話可能對他無濟於事，但是，我希望他看到一直以來我都試著幫助他，但是，夠了嗎？



公告貼出不久，有一天，麥可告訴我柯比納在陽台上等著想要見我。

當他進到我與難民會面的小辦公室時，他臉上滿是淚水。我很驚訝，不僅是因為非洲男人極少在公開場合哭泣，而且因著他的艱苦命運，使我期盼他是一名堅強的男子漢，怎麼竟然



流淚了呢？於是我把門關上。

他坐下來，用袖子擦乾眼淚，我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你要走了。」他說。

他的話讓我覺得他擔心在我離開後，這裡的情況將會如何呢？因此，我立刻向他保證，並提醒他麥可修士還留在這裡工作，雙手中心也會繼續幫助他的。

他低下頭說：「不，修士，你不了解。」

我再度向他保證說：「你知道，雖然你的生活很困難，但是，這裡的人會照顧你的。你來自遙遠的地方，現在你有一間平房，還有你自己的裁縫工作。你沒有理由認為未來一切對你是不利的。」

「你還是不了解，修士。」他說。他的頭更低了，並且閉上眼睛。眼淚滴在他的外套上。

柯比納伸出手抓住我的手臂。我們並肩坐在一張有椅墊的木頭椅子上。他將那張沾滿淚水的臉轉向我說：

「你是我的弟兄。」

我了解了，我真的了解他的意思了。我聽過耶穌在福音中說我們大家都是弟兄和姊妹，我們都是基督奧體的一部分，以及無人是一座孤島等這類的話，但是，之前我從未真正了解其中的含意。現在我了解我是柯比納的弟兄，他也是我的弟兄，我有責任幫助他，並成為他的朋友。藉由我們的相處以及我們彼此的關懷，我們成為真正的弟兄。此刻，淚水充滿了我的眼睛。

「是的，我是你的弟兄，你也是我的弟兄。」最後，我說道。



## 「修士，你什麼時候回來？」

當我站著觀看他們時，一個曾經抓住我的念頭又回到我腦海中。不是我遠走高飛，我沒有權力離開非洲，而是這個國家如同退去的潮水般，慢慢地，沉重地遠離了我。

——艾塞克·丹妮笙  
《遠離非洲》

4月15日，當烈日在肯亞湛藍的天空明亮地照射大地時，我的歡送會開始了。麥可與雙手中心的工作人員及助理共同籌備這次的歡送會。烏塔最近與她先生從德國回來，當天一早便同路易絲修女、聖若瑟教堂的神父及工作人員一起來，此外還有瑪德琳修女、白衣修女、我所屬團體的耶穌會士以及我的美國朋友。

許多難民帶著他們親手製作的禮物前來參加我的歡送會。當然，這些都是我已經看過一百遍的東西，例如：地毯、籃子、木頭動物、襯衫、衣服、蠟染布等，有一名烏干達婦女以扭轉編織法編織了一塊桌布和餐巾送給我，她說這件禮物代表美國和非洲，「你的兩個家，修士。」她在桌布長的一邊繡上氣球，短的一邊則繡上一名騎在馬背上、頭上插著羽毛的美國人，對她而言，這便代表非洲和美國。



雙手中心的入口處，攝於我即將結束在此服務之前的某個涼爽、多雲的上午。合影者為路過此地拜訪我們的一位初學修女拉瑞多（左）、派翠莎（左上）、我的工作夥伴麥可·休福（右後站立者）、維吉妮（右蹲者）和我自己（中蹲者）。

老媽媽送給我一個紅綠兩色的籃子。她慎重地說：「你非洲的母親送給你美國的母親。」

我們有來自烘焙屋的蛋糕、芬達汽水以及由「藍色尼羅河」餐廳烹調的衣索比亞食物。由於這是在東非，因此許多難民極為正式地站起來一個接一個的演講、歌唱，歌唱、演講，數十名盧安達婦女穿著正式的服裝，站在草地上唱著她們所稱的特殊〈告別曲〉。一想到最近在盧安達發生的滅種屠殺，這首歌聽起來格外令人心酸不已；我想，他們比我清楚，究竟有多少次他們沒有機會向自己的同胞告別。

最後，我以英語和史瓦希里語致詞，感謝他們每一個人，讓他們知道我不會忘記他們。突然間，天色昏暗並且開始下雨，每一個人都相信這確實是一種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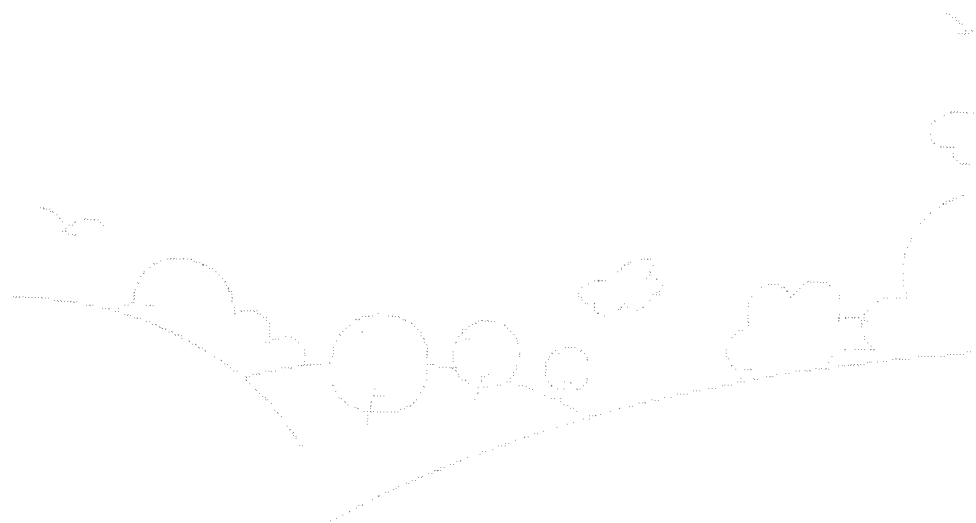
當大家漸漸離去時，我有一種哀傷的感覺。我聽見一遍又一遍用烏干達語、盧安達語、衣索比亞語、蘇丹語、莫三比克語和肯亞語問我：「修士，你什麼時候回來？」我很難告訴他們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但是我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高蒂要我承諾一定要回來；艾麗絲說她會不斷地為我祈禱；柯比納向我要了耶穌會院長的名字，並要寫信給他，以確保我能回來。他們擁抱我，向我鞠躬，或行屈膝禮，與我握手，最後他們抱著芬達汽水瓶，拿著用餐巾紙包著的幾塊蛋糕，消失在雨滴中，回到他們在奈洛比貧民區裡的家去了。

我收起他們致贈的禮物，放進我的吉普車裡，此時，湛藍的天空中出現一道彩虹，我把它視為一種記號。我無法確定，或許那是天主的盟約並許諾祂將照顧難民，或者，那只是表示





天主對他們和對我的愛。當然，我意識到，在結束我在肯亞的時光時，這樣的結束可能聽起來似乎過於完美，而令人覺得離事實真相太遠，但是，誠如難民以毫不懷疑的語氣所說的：「是的，修士，我無法編造這一切。」





## 芥菜子

對外僑不要苛待和壓迫，因為你們在埃及也曾僑居過。

——《出谷紀》二十二 20

我回到美國幾週後，發生在盧安達殘酷的種族殺戮新聞開始成為媒體的焦點。每天都有新圖片，新的殘殺報導，以及更多來自世界的救助呼籲。有一天，在一段有關住在薩伊邊境難民營的圖西族難民影片中，我瞥見一個身上裹著毯子的瘦弱盧安達男孩，那是一種用五顏六色壓縮的纖維所製成，在奈洛比隨處可買到的廉價毯子。當我在奈洛比時，我的床上便鋪著這種毯子。那是一個奇特的時刻，我立刻感覺自己痛苦地與這男孩分離，但卻又深深地連結在一起。



現在，在我離開肯亞幾年後，我仍然與難民見面，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我不再發現幾十名難民在肯亞某個涼爽的早晨等著想要見我，我不再開著我那輛老爺吉普車去做家庭訪視，他們也不再會站在塵土飛揚的路邊要我停車。如今我在書信來往中，在祈禱和記憶中與他們會面。

令我驚訝的是，有些難民仍與我保持密切的聯繫。艾麗絲



努力經營她在恩甘多區的裁縫店，雖然生意不如她的期望。阿斯丁的木雕作品仍然深受雙手中心顧客的喜愛，他告訴我，最近他賣了三件《生命之樹》的作品。另一名從事蠟染的婦女伊迪絲在信上告訴我，她的生意狀況和她設法回盧安達探訪親人所面臨的困難。史佩西的生活仍然困難重重，並且還掛念著她已逝姊妹的孩子。

班吉明每個月寫信來請我給他「一點錢」。他還在生病，深受胃潰瘍之苦，盡力到各處找工作。他的生活極為困難。老媽媽說她仍與生活奮戰，她的籃子銷售情況不如她的期望，問我是否能助她一臂之力呢？伊麗莎白已經搬到坦尚尼亞去了，愛琳告訴我她那兩個都叫吉姆的孩子情況，他們成長得很快。他們的信裡都有一張有折痕的照片，也要求我回寄一張我的照片給他們，並詢問我何時回去看他們。

他們的信是請別人代筆，寫在一張皺皺、有條紋的紙上，都以相同的問候語開始：「親愛的吉姆修士，我以耶穌基督之名問候你……」我的回信中，也寫了一些當我和他們談話時所說的那番鼓勵的話，有時候，我也在信中附上美金十元或二十元的紙鈔，我知道，他們或許收得到也可能收不到這些錢。

少數難民已經遷移他處，或者，誠如東非人所說的「轉移」到其他地方，為了要尋找更好的環境。柯比納帶著自己賺來的錢搬到坦尚尼亞去了，並在那裡開了一家裁縫店。瑪麗回到盧安達與家人團聚。事實上，許多盧安達難民仍不停地設法回國找尋自己的家人。有人告訴我，高蒂已經回去幾個月了，但是並沒有找到她的親人。

有些難民也遭遇悲慘的命運。例如一名婦女被肯亞警察關進監獄，遭到刑求。幾名我曾經與他們一起工作過的難民不幸去世。那名在樹皮製成的布料上繡花，還給我們彩色皮製包包、充滿活力的烏干達婦女瑪麗，在我離開後一年，死於愛滋病。這些消息都是我由一位正巧經過奈洛比的耶穌會士帶回來的信件中得知的。

但我與大多數的難民都失去了聯絡。因為有些人不會寫字，有些人沒有錢購買信紙或付不起郵費。當然，大部分的難民都忙於找尋工作，設法保持健康，確定自己有錢付房租以及照顧孩子的溫飽。有些難民無法聯絡，是因為他們住在沒有門牌號碼的貧民區，而他們又無能力租一個信箱。許多我每週都見到的難民，他們的生活和親人都是我熟悉的，但是，我知道日後我永遠不會再見到他們，或者收到他們的來信了。



過去一些我不了解的事，現在我明白了。我了解我自己的掙扎，例如：我短期的病痛、我擔心我的父母、我在工作上的挫折等，這些都讓我敞開我的心，使我能與難民有更深一層的溝通交往。我想，假如我覺得自己可以完全掌控一切，我可能無法如此深刻地體驗到難民對我的愛，也不能如此全心地愛他們。我認為，在我的軟弱中，我更有能力視他們為兄弟姊妹、為朋友，一如聖保祿所說：「在軟弱中，我更堅強。」或許，這就是他的意思吧！

另外也很清楚的一點是，難民教導我如何以一種新的方式



愛別人。修道生活中的挑戰之一，至少對我是一種挑戰，便是要學習「貞潔」是什麼。我想，我來到肯亞後，才了解它的真正意義，當我花時間與柯比納、高蒂、艾麗絲，甚至班吉明這些人相處時，我方才明白，以純潔的心愛他們，多麼令人感到滿足呀！那就是全心愛許多人，以自由的精神接受他們回報的愛。仔細想一想，其實那是任何一種生活都要面臨的挑戰，無論是修道生活或不是修道生活。

我也知道，我們仍然聯繫在一起，藉著那些流逝的時光。我知道，假如我心繫千里之外的難民朋友，我也與那裏在毯子裡、未曾見過面的男孩聯繫在一起。假如真是如此，我就與世界上的每一名難民在心靈上連結在一起。這就是我現在明白了的事。

但是我仍然有不知道的事。我不知道我該如何答覆班吉明。記得有一次我和若望·穆他伯加，這名養牛失敗的難民站在烈日下觀看他的牛羣時，他問道：「我現在該怎麼辦呢？」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他。我不知道為何這些辛苦工作又遭受種種痛苦的窮人所得到的回報，常常都是更多的困難和更深的痛苦？

雖然如此，我也明白，在肯亞服務期間所面對這些痛苦的經驗中，我遇見了天主。面對難民所遇到的痛苦，我看見了一種有價值、美好的東西，那就是「希望」。希望使他們的工作有意義、有價值，我相信，誠如他們所說的，這希望使他們能「慢慢的」有些發展。這就是當我在東非服務時，由他們傳遞給我的希望。我知道，這希望的來源和基礎便是天主。

耶穌曾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子，當它種在泥土裡時是所有

種子中最小的，但當它長大後卻成為灌木中最高大的，並且成為一棵樹，天空的鳥兒飛到它的枝頭上築巢。難民的希望可能如同芥菜子般的微小，甚至蒙上滅種屠殺、貧窮以及絕望的灰塵，但我知道此刻正是冬眠時期，一旦雨水降下，它們便會抽出新生命的嫩芽。

我曾經為他們服務過的難民至今仍伴隨著我。當我閉上眼睛祈禱時，我會想起他們，我聽見他們的聲音，我看見他們的臉孔，我想到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喜樂，我記得他們所懷抱的希望。我心中充滿了感謝。





## 嶄新的一頁：二十年後

我結束難民服務將近二十個寒暑了。但是，在某種意義下，我與他們相處的時間從未結束。我在奈洛比服務的男男女女改變了我的生命。他們改變了我對貧窮、對人性以及對天主的看法。然而更多的改變卻在日後。

自從這本書出版後，我的生命有了許多的改變，誠如任何一個人在二十年裡的改變一樣。有些改變，例如：繼續接受耶穌會的培育、晉鐸、從事寫作等，這些我已經寫在後來出版的書裡了。

你可能已經知道在東非發生許多變化。與其評論當地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你們可以隨時讀到這類的報導，還不如讓我告訴你們那裡的最新消息。自從這本書出版後，許多讀者寫信給我，特別問到我在奈洛比所認識的朋友的近況。我依序報導他們的後續情況。

那位令人敬畏，以獎學金幫助許多難民兒童的道明會路易絲修女，曾在幾年前來過紐約。她透過一位朋友與我聯絡，她住在位於曼哈頓的道明會教堂客房裡，並為她的難民工作募款，我很高興能與她相聚幾小時。

姑且不論時光的流逝，路易絲修女一如往常，活力充沛，滿懷希望。令人毫不意外的是，她來到美國的目的是幫助幾名蘇丹難民辦理定居在紐約州北部一個小鎮的手續。她說：「啊，

我必須來！不然有誰能幫助他們呢？」那天下午，我們在教堂的客房裡，有了一次笑聲不斷的長時間相聚。

我問了修女一個多年前我就想要提出的問題。我說：「修女，妳如何能做所有的事呢？在這麼多麻煩的事務中，妳如何還能保持愉快的精神呢？」我離開奈洛比不久，路易絲修女在一次搶劫中受了傷。盜匪夜間進入她的住處搶劫，並打斷她的手臂。如今在我面前的她遠離家鄉數千里，疲憊不堪，並且還努力抵抗紐約的寒冷，但在那條藍色頭巾下的熟悉臉孔，露出的笑容依然燦爛如往昔。

「啊，」她毫不猶疑地說：「別人的祈禱。」

我們談話將近結束時，她出其不意地問道：「我們以後還有見面的機會嗎？」我知道她問話中的含意，但是，我不能讓這思想進入我的腦海中。她已年近八十，而誰能知道我還有機會回到奈洛比呢？當我們擁抱道別時，我知道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的告別。我意識到自己多麼幸運，能在此生遇到許多的聖人。當我要關上客房的門時，她用了我已經很久不再聽到的稱呼，即是在我晉鐸前別人對我的尊稱，對我說：「再見，吉姆修士。」

令我難過的是，一些與我相處多時，我了解他們的生活、他們的面容，對我而言如同親人一般的朋友，像高蒂、艾麗絲、羅絲、瑪麗、伊莉莎白、若望等，如今卻已多年音訊杳然。有時候，我與十多位朋友保持聯繫，他們寫信告訴我有關他們的家庭，他們的困難，他們的成功——尤其是在謀生計畫上的成功。他們的信裡也報導了許多消息，例如：我們的家被盜賊闖



入；那台勝家牌縫紉機仍然好用；我的孩子都健康，感謝天主等。我在回信裡常寫一些鼓勵的話，以及寄一點我由耶穌會有限的預算中節省下來的金錢。

有些難民是忠實的通信者，像若望和克莉絲汀，這兩位曾為雙手中心以香蕉樹葉製作美麗卡片的難民，他們仍然寫給我有關他們家庭的感人信件。老媽媽和她的家人也定期與我聯絡。

在奈洛比工作的耶穌會士告訴我，有些難民已經返回自己的國家去了（盧安達的種族屠殺平息，並且雙方達成和解後，許多該國的難民便紛紛返回自己的家園），有些難民生了病，有些仍在肯亞首都勉強餬口度日。有些一直生活在貧民區的難民，似乎已經去世了。不知道朋友的生或死，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為那些已經死亡的不知名者祈禱，希望有朝一日我們能在天堂相遇。

自從我回到美國後，一直與班吉明保持聯絡，他的情況始終處於困難中。本書完稿後幾年，他回到盧安達，設法在自己家鄉謀生，但他的健康狀況使他難以工作。幾年前，一位研究盧安達政治的教授朋友，在一次前往班吉明家鄉的行程中，奇妙地找到了他，並且給了他「一點錢」，為表達感激，班吉明送給他一小張自己的相片。他那種直接聯絡的方式含有一種期待。

難民的來信漸漸減少，我並不感到意外。他們目前的貧窮狀況使他們買不起信紙或郵票。因此，無論何時只要有難民與我聯絡，我都會喜出望外。其實，直到目前為止，僅僅一名難民在信中要了我的手機號碼，我就給了他；我現在也用「我們以耶穌基督之名問候你」這句話，作為我寫給他們每封信的問

候語。

與我們一起工作過的那位慈善的肯亞婦女維奇妮，多年來定期與我保持聯繫。她結婚了，並且與丈夫移居到挪威及其他地方。有一段時期，我常收到她的信，告訴我有關她的丈夫、孩子和他們在北歐四國的生活狀況。但突然間卻音訊全無。有一天，我收到她丈夫的短箋，告訴我維奇妮死於肝病。這令人震驚的消息使我想起，這些曾經人生活在貧窮環境中，即使日後移居到較為富裕的地區，但早年不良的健康狀況對他們往後的生活仍然影響很深。她的丈夫寄給我的殯葬祈禱卡上有這樣一句話：「感謝妳將美麗帶給了世界。」

我很容易與許多耶穌會士以及來自美國的平信徒志工保持聯絡。曾經與我一起在雙手中心合作過的德籍耶穌會士麥可已經完成了耶穌會的培育，並在德國從事人權工作。幾年前，我在紐約見到他，共處了幾個小時，回憶我們在肯亞並肩工作的那段時光。曾在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工作的另一位年輕耶穌會士柯瑞根，已經離開修會，目前住在俄亥俄州。我們談到其他幾位友善的美籍志工，有些已經結婚或與父母同住（其中一位名叫凱文的志工曾經主導瑪利諾會平信徒福傳工作）。無論何時，當我們談話時，我們都用已經生疏了的史瓦希里語。烏塔已經失去聯絡了，我真想知道她身在何處。她是一位絕佳的合作者，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好的一位。

雙手中心仍然有穩固的發展。結合商店與辦公室的中心在奈洛比多次搬遷，如今已經不設在靠近耶穌會教堂附近的平房內了，但仍然為難民提供一個賓至如歸的聚會場所，販賣他們



製作的產品，繼續得到東非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的支助。現在，由不同國籍耶穌會士組成的難民服務機構仍在全球從事難民服務。在過去數百年中，耶穌會難民服務是我們修會最值得驕傲的一項服務。

或許最令人驚訝的是有關莫三比克木雕家阿斯丁的故事。不久前，一位女作家凱瑟琳·法紗尼（Cathleen Falsani）告訴我，她計畫前往肯亞。誠如我向每一位告訴我將要到奈洛比或附近地區的人所請求的，我也請求她去拜訪雙手中心，轉達我的問候，並蒐集任何有關難民的消息。另外，我贈送她本書的第一版。她在自己的著作《放膽犯罪》（*Sin Boldly*）中寫道：

當我們瀏覽放在雙手中心架子上的紡織品、畫作、非洲風景和神像時，我買了一組用香蕉葉製作的當地作品，店員問我們是否願意見正在工作的幾位藝術家。她告訴我們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在不遠處的房屋裡雕刻。

「他的名字叫阿斯丁。」她說。

這名字真是如雷貫耳。阿斯丁！吉姆在他那本動人的書中曾敘述了阿斯丁的故事。他發現這名由莫三比克逃到肯亞的難民，在奈洛比市區一座辦公大樓外面，以玫瑰木從事雕刻。

我衝出去朝著店員指的那棟房屋跑去，阿斯丁就在那裡雕刻。我轉向屋角，看，他就在那裡，在一個當作工作枱的粗大樹樁上，放著一塊黑檀木，阿斯丁彎著腰在那裡工作。他就像吉姆書中形容的樣子，一名蓄著鬍

子的男士，一對水汪汪的眼睛，充滿活力地帶著安靜的力量，像一位活聖人。

當我自我介紹並告訴他我帶來吉姆的問候時，他露出笑容說：「請轉告吉姆神父，幾年前他創立這個雙手中心，真是太好了。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子女，有些已經上學了，他們能夠念書就是因為這個。」

他說的「這個」便是指他剛完成的這件雕刻，那時，他正要用一支精細長柄刷子為木雕塗上顏色。

我生命中做過幾件有意義的事就是在雙手中心的工作。那確實是我做過的最好工作，在那裡，我的能力得以完全發揮，誠如一句古老名言所說：「天主用曲線畫出直線。」有時候我想，有一天當我到了天堂，天主問我，我這一輩子做過什麼時，我將回答說：「雙手中心」或者更簡單地說：「我曾經為難民工作。」



前文中我已經提過難民改變了我，他們改變了我對貧窮的看法。長時間與窮人生活後重返美國，的確有一種令人震驚的經驗。在回國後的前幾個月裡，我常常想：「我們怎能生活得如此富裕，而生活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窮人卻只有一點點東西呢？」在前往非洲之前，我聽過一些返國的傳教士走進堆滿各種商品的超級市場時，突然哭了出來的故事。雖然這事沒有發生在我身上，但類似的經驗，足以提醒我，大多數生活在西方



的我們擁有了太多的東西。那些時刻總像一桶澆在我臉上的冷水，讓我清楚意識到我享有的特權。

返回美國後，我對自己承諾永遠不要忘記開發中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我要永遠懷有感恩的心。但我坦承有時我也失掉了我的立場。我漸漸陷於自我滿足和自我放鬆之中。有時候，我沒有為自己擁有的一切心存感謝。生活在西方的我們雖然擁有許多，但常常不如那些擁有不多的人那樣滿懷感激之情。

難民改變我對人性的觀點。長久以來我接受基督信仰的教導，即是全人類都是兄弟姊妹，但是直到我在奈洛比與那些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時，我才開始了解那教導中蘊含的美好真理。假如我能成為難民的朋友並全心愛他們，如此，全人類才是真正的兄弟姊妹。從最初在他們中間感到不自在，懷疑自己是否能與這些遭遇過許多苦難的人交談，到視他們為親密朋友，感到自在地與他們在一起，與他們一起歡笑，看見他們如何幫助我取笑自己，這是一種奇妙的轉變，是何等偉大的恩寵呀！

難民也改變我對天主的看法。那些在物質生活上匱乏，但在精神上富裕的人讓我明白，其實接近天主不需要靠外在的東西。信仰不需要舒適的物質條件，也不需要財富。那些處於財富與天主之間的窮人提醒我，要除掉任何阻擋我接近天主的東西。看到那些在自己的貧困中仍然慷慨對待他人的人——本書中已舉出許多例子——讓我想起耶穌在《馬爾谷福音》中所說的那位窮寡婦的故事，並了解「從自己的匱乏中投下全部生活

費」的真正意義。

難民也使我心碎。與這些生活中充滿了難以想像的痛苦的男女難民相處，讓我心中滿懷悲戚之情。但是，他們以另一種方式打開了我的心，他們幫助我以新的方式從不同的人接受來自天主的愛，這也是我未曾期望過的。

他們以這種方式教導我，天主的愛可以來自任何人，甚至來自與我的生活方式全然不同的人。或許，尤其是來自他們。

改變我的是每一個個別的難民。就整體而言，羣體對我的影響不如個別的難民。我的意思是：我並不將他們視為無組織的社會羣眾，一種政治經濟的概念，或甚至一種神學的範疇。我把他們視為個別的人。因此，當我想起他們時，我不是想到「難民們」，而是視他們為我個別的朋友而想念他們，書中有時用「難民們」是為方便寫作的緣故。我的那些男女朋友們幫助我了解愛與被愛的意義。

我每天都想到他們。我的房間裡處處都是我在奈洛比工作時他們送給我的禮物，有婦女團體縫製的毯子，伊利莎白編織的彩色草席，阿斯丁的雕刻，一名難民畫在樹皮上的畫作，和馬克畫的聖母像。誠如《聖詠》一三七篇所寫的：「我若不懷念你，就願我的舌頭緊緊貼在我的上顎。」我很高興寫了這本我最喜愛的書，其實是基於自私的理由，因為它幫助我記得他們。



當我回想我在肯亞日子，似乎是一個不同的人在那裡工作（我相信當你回顧自己的生命時，你會有同樣的反應）。年齡

是原因之一，但是，也有其他不同的因素。當時我是年輕資淺的耶穌會士，對天主的奇妙作為感到驚訝無比，每天與窮人有較深的接觸。令人深感悲傷的是，我目前擔任的編輯工作使我沒有多少機會與窮人接觸，對我而言，這真是一大損失。但是，對一名耶穌會士來說，任何事都可能發生，或許明天我就被派回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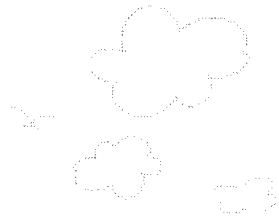
即使我重回東非，我知道人事都已全非了。不少在東非工作的耶穌會士告訴我，奈洛比已非昔日的面貌了，更擁擠，更多暴力事件，更開發了（甚至連貧民區也不例外）。假如我回去，很可能看不到相同的事物，甚至也找不到我昔日大部分的難民朋友了。

所以本書中描繪的奈洛比已不復存在，但在某種意義上它依然活在我的心中。在那裡，我可以與朋友在一起，走在雙手中心的房間裡，穿梭在康格米鎮塵土飛揚的巷道中，踏在奈洛比市中心人聲鼎沸的街道上，感受烈日曬在我的肩膀，聞著東非特有的香氣，聽著天主子民的聲音。

我常在記憶中回到那裡。它帶給我希望，它向我述說許多令人難忘的人物給予我的友誼。它讓我想起愛。

耶穌會士 詹姆士·馬丁

2011年1月 於紐約市



## 致謝

在非洲的人學到彼此服務。他們的生活建立在相互信任地給予和回饋的基礎上。在任何人煙稀少的國度，「愛你的近人」不是虔誠的誠命，而是生存的法則。假如你看到某人陷入困境，就停下來伸出援手，下次，可能是他對你伸出援手。

——白芮兒·瑪克罕（Beryl Markham）

《夜航西飛》（*West with the Night*）

本書除了敘述不同人物的故事外，我在東非的工作能如此有趣，也有賴許多好朋友的協助。奈洛比羅耀拉會院的弟兄們，從我到達肯亞的那天早晨起就讓我覺得備受歡迎，兩位院長喬納森（Jonathan Haschka）和維克多（Victor Jaaccarni）總是了解我的需要（喬納森院長冒著生命危險教我開車）。我的神師喬治·杜瑞給予我的幫助是無法衡量的，他在肯亞的避靜院為從事繁忙工作的我提供歇息之處。在凱倫鎮聖若瑟堂區的顧睨和狄烏迪第（Deusdedit Byabarilo）兩位神父，以及他們的團體每天都協助雙手中心的運作，使我們能保持健康，面對各種不同的困難。感謝兩位耶穌會士托尼（Tony DeSouza）和吉姆（Jim Mattaliano）以及聖家大殿團體的熱誠款待。

狄克遜夫婦和他們的家庭多次迎接我到他們家中，享受愛





爾蘭式的待客之道。一位住在凱倫鎮的肯亞朋友基蒂邀請我到她家作客，使我知道肯亞的待客方式。同樣的，如果我忘記美國人如何招待客人，鮑曼家庭（Baumann family）和貝爾滋（Belczes）友人會提醒我。感謝我的父母、姊妹和她的夫婿，在我遠離家鄉的這兩年與我保持聯絡，以及寄來那些經過海關查驗方能到達我手中的包裹和禮物。

感謝耶穌會難民服務羅馬總指導雷珀神父（Mark Raper）和我在波士頓團體的院長拉封丹神父（Jim Lafontaine），對我在奈洛比工作的支持。



關於手稿部分，兩位耶穌會朋友史帝芬（Steve Katsouros）和馬特（Matt Cassidy）閱讀過初稿後，提出有幫助的建議並做修正。很幸運的有兩位非洲政治專家格雷格（Greg White）與提米（Tim Longman）也閱讀了我的初稿，他們專注在書中有關歷史部分的正確性。提米是盧安達和蒲隆地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專家，他對我在討論盧安達情況及在奈洛比盧安達難民的困境時幫助極大。另一位迦納神學家凱斯里（Casely Essamuah）讀完我的初稿後，對書中的觀點提出了非洲人的看法。一位坦尚尼亞籍的神父胡伯特（Huberti Akhweso）改正了書中許多史瓦希里語的錯誤。

兩位昔日在東非的工作伙伴吉姆·柯瑞根和曼迪修女（Sister Maddly Tiberii, S. S. J.）看過初稿，確定我的記憶正確無誤。兩位在奈洛比服務的瑪利諾會平信徒志工看過最後的修訂稿，指出需要修正的地方。其中一位還在奈洛比服務的志工凱文，寫下

他在肯亞觀察到的愛滋病現象，在討論這個主題時，他的評論具有珍貴的價值。兩位瑪利諾會神父確認我採用的史瓦希里諺語是正確的。另外，我也要感謝艾爾沃德·修特神父准許我引用他的著作《基督教和非洲人的幻覺》中的話。

謝謝傑米（Jeremy Langford）始終如一的熱誠、支持和對原稿寶貴的建議。謝謝艾瑞卡（Eric Major）、瓊安（Joan Golan）、瑪利亞（Mara Naselli）對本書整體架構的修改。任教於美國麻州耶穌會西頓神學院的梅格修女（Meg Guider, O. S. F.）鼓勵我對書中敘述的一些事件作更深的反省，尤其是我與難民的關係。她精確的建議和明智的洞察對本書幫助極大。耶穌會士羅斯（Ross Pribyl）閱讀初稿後，逐頁為本書編寫詳細的註解。我的姊妹卡洛琳是本書意外的絕佳編輯。謝謝兩位為初稿打字的耶穌會士巴布（Bob Schlichtig）和奈德（Ned Mattmoe）。

我向為本書寫序言的羅伯·可倫，准許我使用他們生動照片的麥可·可倫（Michael Coyne）及耶穌會士唐（Don Doll），致上最高的謝意。供職於羅馬耶穌會難民服務中心的麥可·馬林斯（Michael Mullins），也從他的檔案中找尋適合用於本書的一些在東非從事難民服務的耶穌會士照片。

最後，難民朋友對我的慷慨實非言語所能表達的。能與他們一起工作真令人覺得備感榮幸，也是一種恩寵。這是一本屬於他們的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雙手編織愛——東非難民的生命故事 / 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著 ; 譚壁輝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啓文化, 2013.05  
面 ; 公分  
譯自 : This Our Exile : A Spiritual Journey with the Refugees of East Africa  
ISBN 978-957-546-756-2(平裝)  
1. 馬丁(Martin, James, S.J.) 2.天主教 3.靈修  
244.93 102007671

# 雙手編織愛

東非難民的生命故事

2013年05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詹姆士·馬丁(James Martin, S.J.)  
譯者：譚壁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戶名：光啓文化事業)  
發行人：胡國楨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中茂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26巷17弄5號3樓  
電話：(02)2225 2627  
定價：280元

光啓書號 208078

ISBN 978-957-546-756-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在東非肯亞的首都奈洛比，有一個展示和販售東非手工藝品的「雙手中心」，在這裡，你可以聽到來自烏干達、盧安達、索馬利亞、坦尚尼亞、莫三比克等東非各國難民的故事，他們手牽手一起工作，用愛編織出他們的生命……

本書是作者馬丁神父描繪自己年輕時，為東非各國難民服務兩年的深刻經驗。他以輕鬆幽默的筆調述說難民的求生之道和生活智慧，一篇篇真實的故事讓人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在為難民安排工作、幫助他們謀生、成立雙手中心的過程中，他眼見難民的生活不斷在痛苦與貧困中度過，卻依然相信有一位美善的天主愛他們，只要事情稍有轉機，「天主真是太棒了！」的感恩讚美就脫口而出，這樣的生命態度徹底改變了他對天主、貧窮、人性、痛苦、生命中的無奈與挫折、福音的教導、愛與被愛的看法，並真實經驗到聖經上所說的：「如今存在的有信望愛，其中最大的是愛。」

此外，馬丁神父也扮演導遊的角色，在字裡行間帶我們搭乘火車，穿過東非大裂谷、爬上肯亞高原、跨越尼羅河，欣賞東非的美麗景觀。書中還穿插一些鮮為人知的東非各族風俗習慣、歷史文化、食物特色及語言等等，有趣極了！

或許，本書所描繪的人物與景觀已不復存在，但透過書中的故事，你會發現生命中不論遭遇多大的困難與痛苦，天主的愛永遠不改變。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756-2  
00280



9 789575 467562

光啟書號208078 定價：280元